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知識、疆界與想像：

中晚唐「南方」地記研究

Knowledge, Border and Imagination :

The study of Local Chronicles of South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陳柏言

Po-Yen Chen

指導教授：康韻梅 博士

Advisor : Yun-Mei Kang,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July, 2017

【摘要】



唐代士人與文人的南向移動，一方面帶來了文化的傳播，另一方面，亦塑造著其遷居之所的文學地理。過往學界對於唐代「南方」書寫的研究，大多聚焦於貶謫或宦遊士人的創作，探析其文學作品在不同於中原的異地所展示出的空間構設與流寓心境。本文肯認文士的詩文書寫，對於理解唐代「南方」是一支重要的線索，卻也反思其權威與經典性，是否掩蓋了其他觀看「南方」的方式？本文主要選擇段公路《北戶錄》、樊綽《蠻書》與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三部「南方」地記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試圖探勘這一批歷來或被忽略，或被單純視為地志史料的著作。一方面，是為了補足學界對於唐代「南方」書寫研究的不足之處，並試圖另闢蹊徑，展開新的研究向度。另一方面，則是持續思索身處於「華夏邊緣」的書寫者，如何觀看、描述乃至於建構其眼前的「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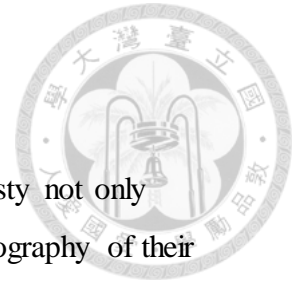
經過本文的研究，唐代「南方」地記顯然不只是「如實」、「客觀」的記述，而更必須關注寫作主體對地方的認知與想像。進一步說，這些「南方」地記絕不只是地方的文獻史料，而更透顯著人們對於華夷的辯證，地方的理解，乃至於自我的定位。從段公路《北戶錄》的個案，我們看見了「北戶」視野下，嶺南的奇花異草、怪禽異獸，如何被收納進文獻和歷史記憶的編碼，成為可供理解、掌握的「國境之南」。而樊綽在南詔叛亂、甚至交趾城破的時代背景中，為其未曾涉足的雲南寫下《蠻書》。樊綽一再回返失去的「故地」，召喚馬援、諸葛亮等大漢英雄，使此書便不只是山川城邑的紀錄，更是一部帶有戰爭陰影和悼念意味的劫餘之書。而《桂林風土記》則展示了西南邊陲的不同面目。莫休符通過桂林詩跡、史跡與神跡的銘刻，不只鋪排了桂林的山水勝景，更勾連出一幅文人視野下的園林圖像。綜而言之，這些遠離中心的異地書寫，不只讓我們重新發現未曾注目的「他者」，更可藉此回頭審視並辯證中心的內涵。於此意義上，「地記」的知識建構，固然有其地理史料價值，然更重要的是，其直接展示了唐人對於南方的觀

看角度與認知框架。

關鍵字：南方書寫、地記、文化地理



【英文摘要】



The scholar-officials and literati immigrating south in Tang Dynasty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culture, but also mapped the literary geography of their settlement region in southern China.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es in the literature of southern China in Tang Dynasty has mainly focuses on the works of relegated officials or the officials far away from home. These researches explore how the space was presented and mental state was depicted in a non-Central Plain region in the literature.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notion that those poetic writing of the literati was an important clue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southern China in Tang dynasty. This study, however, also examines its authoritativeness and canonicity, considering whether it excludes the other ways to perceive the “South”? Three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in the mid-and late Tang period – *Beihulu* by Duan Gonglu, *Manshu* (literally means “Barbarous Document”) by Fan Chuo, and *Guilin fengtuji* (“Land and people of Guilin”) by Mo Xiufu – a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for this study. The study looks into the three books which have long been neglected or simply considered to be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local gazetteers. The purpose is to complement the deficiency of the researches in the literature of southern China in Tang Dynasty and try to create a new dimension of research perception. One the other hand, it also explores how those writers on the edge of “Hua-Xia” – the territory of Han Chinese culture – perceive, depict, and even construct the “South” in their sight.

This study has indicated that the texts of the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for “South” in Tang Dynasty were not merely objective observations but the authors’ recogni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he local. To be more specific, these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for “South” were not jus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y also showed the dialectics of Hua–Yi distinction (Sino–barbarian dichotom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 and people’s self-positioning. In Duan Gonglu’s *Behulu*, we can see how those unusual, exotic and precious plants and animals in Lingnan region were recorded in the literature, being decoded and interpreted comprehensively as the elements of the “Territory of South” in the memory of history under the sight of “Beihu”. And Fan Duo even finished *Manshu* for Yunnan, which he had never been to,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war

between Tang and Nan Zhao. He traced back to the “old land” they’d lost, summoning the heroes of Han, such as Ma Yuan and Zhuge Liang, in his writing. The book, consequently, was just not a local gazetteer for geographical record but one in mourning the victims under the shadow of war. And “Guilin fengtu ji” presented another aspects of the border area of southwestern China.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cord of the heritage of poems, history and gods, Mo Xiufu not only presented the astonishing natural scenery of Guelin, but also portrayed the image of Chinese garden from literati’s vision. To sum up, these writings for non-central plain areas of China in Tang Dynasty made us not only rediscover “the others” that we’ve overlooked, but also examine and argue the essence of “the center”. In this sense, these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and their knowledge construction, no doubt, has value as geographical documents.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however, is that these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exhibit how “the South” was like under the Tang people’s perception and cognitive frames.

Keywords: writing for the south,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cultural geography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文獻回顧與評述.....	6
一、漢唐「地記」的定義與體例.....	6
二、「南方」研究與地理書寫研究評述.....	11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20
一、研究方法.....	20
二、章節安排及內容.....	22
第二章、段公路《北戶錄》中的嶺南圖像.....	25
第一節、前言.....	25
第二節、家學與南遊：《北戶錄》的成書淵源與體例考略.....	27
一、家學、南方與《西陽雜俎》.....	27
二、南遊與行記.....	36
第三節、注視南方：親驗與操作.....	40
第四節、注釋南方：引證與記憶.....	46
第五節、餘論.....	54
第三章、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蠻書》中的西南敘事.....	57
第一節、前言.....	57
第二節、戰爭與「蠻」的命名：從《蠻書》的書名爭議談起.....	61
第三節、異物與邊城：《蠻書》中的風物知識形塑.....	68
第四節、歷史記憶與帝國想像：銅柱、石碑與誓文.....	76
第五節、小結.....	88
附錄、南詔與諸地關係圖.....	90
第四章、信是南方最勝遊：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中的詩跡、史跡與神跡.....	91
第一節、前言.....	91
第二節、「補闕」與「錄見聞」：《桂林風土記》之體例考略.....	94
第三節、地景、文士與詩跡.....	101
第四節、史跡、神跡與文明之地.....	111
第五節、建構「桂林」：《桂林風土記》及其餘響.....	117
第六節、小結.....	125
附錄一、《桂林風土記》所錄詩作.....	127
附錄二、《桂林風土記》載述文士.....	130
第五章、結論.....	133
徵引書目.....	138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唐代的政教中心位處關隴地區，許多驛道與運河皆以長安為中心向外連接。因此，唐代文學對於關隴，乃至於「北方」的書寫（包括河隴、幽薊、關中、河南等），較其他各個地域，顯然更為全面而深入。即使是較邊緣的地區，北方的敘寫也遠較南方詳細。¹然而，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起兵范陽，隔年便攻陷潼關，進佔長安，玄宗失措奔逃。安史亂事後雖平定，卻使得關隴地區飽受摧殘，而唐代政治中心與藩鎮、邊防的關係，更加劍拔弩張。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大量人口開始向南移動，使嶺南、黔中、江西等地區人口大增，並促進南方城市與經濟的興起與發展。²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晚唐時期，大量出現的「南方」地記作品便頗堪玩味。誠如向達所云：「漢唐之間世亂最亟，而地志之作，亦復稱盛。」³向達將「世亂」與地志的興盛連結起來，頗有洞識。換言之，南方地記的出現，一方面反映出唐人往南方移動的軌跡，另一方面更凸顯人們亟需且積極建構一套關於「南方」的知識體系。⁴檢視《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著錄，屬於「南方」地記的，就有房千里《南方異物志》與《投荒雜錄》、孟瑄《嶺南異物志》與《南海異事》、劉恂《嶺表錄異》、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段公路《北戶錄》、尉遲樞《南楚新

¹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28-42。

²見周振鶴：〈唐代安史之亂和北方人民的南遷〉，《中華文史論叢》第二、三期合刊。另見鄭學稼：《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而顧立誠《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北向南的移民及其影響》，則點出了「北方動盪」還包括黃河水患、旱災、蝗害等天災引起人禍，而又以山東地區（華北東部）最為嚴重，最終催促了王仙芝、秦宗權、朱全忠等流寇，乃至於黃巢「攻剽州縣，橫行山東」的狀況。顧立誠：《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北向南的移民及其影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頁7-28。

³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563-564。

⁴相關討論見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頁373-496。

聞》、林譚《閩中記》、達奚通《海南諸蕃行記》、樊綽《蠻書》、袁滋《雲南記》、竇滂《雲南別錄》等多種，⁵遠較其他地方豐富。可惜的是，這些「南方」地記大多佚失。今日較完整保存的，僅得見劉恂《嶺表錄異》、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段公路《北戶錄》、尉遲樞《南楚新聞》、樊綽《蠻書》等數種。除了莫休符《桂林風土志》描寫桂林、《蠻書》書寫雲南，其餘作品如段公路《北戶錄》、劉恂《嶺表錄異》則是聚焦於嶺南的書寫。據此，本文所言「南方」，若以廣義來說，即是唐人概念中，相對於「北方」中土的「南方」；然若窄義一點來看，筆者所指稱的「南方」，是由這些「南方」地記著作所勾勒、形構出來的「國境之南」。也就是說，一方面是實存於現實的「南方」，另一方面，則是存在於文本之中，被描述、想像甚至是建構出來的「南方」。這兩者大抵有別，卻又同時關聯與糾纏，此間就涉及了「現實」與「文本」的種種辯證關係。

這一批大量湧現的「南方」地記，往往被視為史學、地理學或民族學的史料。舉例來說，在辛德勇的《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中，就將這些地記放在「唐代的地理學」中討論，以之佐證唐代「邊疆及域外地理知識的擴展」。⁶李斌城主編《唐代文化》也概述了《北戶錄》、《桂林風土記》、《嶺表錄異》等「南方」地記的文獻價值，指出這些著作是「記述邊疆地理知識的重要著述」。⁷而吳永章的《中國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題解》，則從民族史研究的角度出發，強調「南方」地記著作對於風土民情之記載。⁸在這些研究中，南方地記「要是史料上的運用，因此大多是泛泛之論，成為了研究主題的背景或陪襯。

對於這樣的研究態勢，胡曉真新近出版的《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給予我們深刻的省思與啟發。她指出，「西南」一直是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經典題目，

⁵參見宋·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509。

⁶辛德勇：《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86-289。

⁷李斌城主編《唐代文化（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見第七章〈唐代的地理學〉，頁1666。

⁸吳永章：《中國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題解》（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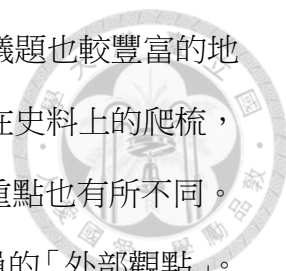
卻是文學研究的新課題。那並非文本匱乏或議題薄弱，而是人們的視野往往受限於習而未察的「中心」觀點。因此，她以「西南敘事」為題（而不選擇相對自明的「西南書寫」），正是要強調不同文本在呈現西南時所蘊含的高度敘事性，亦即觀點、記憶與構造。此間涉及的不只是「邊緣」與「中央」的辯證張力，更牽涉著時代、地理、政策、民族、性別等等脈絡化的思考。⁹胡曉真的著作，雖以「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為主題，卻與本文研究對象「南方」地記有著承衍與對話的關係。「南方」地記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地的風土史料客觀記述，然若深入探勘，會發現其中隱晦而豐富的作者意圖與文化脈絡。

緣此，本文以唐代「南方」地記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兩個動機。首先，是補足學界對於「南方」文學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中國文學史中，我們對於「南方」的印象，大多來自流寓文人的作品，而主要的文體即是詩歌與散文。以唐代而言，提及「南方」我們立刻會想起的，就是韓愈與柳宗元；他們因為宦宦生涯的浮沉，分別被貶謫至南方，而在當地創作了不少作品。韓柳作品中，對於「南方」的書寫固然有其代表性，也已有非常豐富的研究成果，¹⁰然也令我們反思其中的經典性與權威性。除了從大文豪、大詩人的角度，我們是否有不同觀看「南方」的視角？我們是否有詩歌、散文以外的文本對象？在此，「地記」就顯露其價值。相較於詩歌或散文，地記著作承接了前代地理書，乃至於「博物志」、「風土記」、「耆舊傳」的書寫體例，強調地方文化的保存與風土知識的建構等等。通過「地記」著作，我們當可更全面的掌握唐人對於「南方」的理解與想像。

其次，本文希望通過細讀的方式，去考察並抉發往往被視為地理或民族史料的文獻，所具有的敘事意涵與文化脈絡。本文選擇以段公路《北戶錄》、樊綽《蠻書》、莫休符《桂林風土記》為研究案例，主要有三點原因。其一是文本的完整

⁹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頁1-33。

¹⁰著眼與韓柳於南方貶謫時期的學術著作頗多，專書撮舉如張清華等主編：《韓愈與嶺南文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龔玉蘭著：《貶謫時期的柳宗元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等。



度與豐富性。這三部著作是今所能見，保存相對完整，而涉及議題也較豐富的地記作品。其二，這三部作品受到的學界關注極少，往往只停料在史料上的爬梳，或者文本體例的基本引介。其三，這三部作品書寫面向與關注重點也有所不同。段公路《北戶錄》和樊綽《蠻書》，分別來自南來文人和外派官員的「外部觀點」。也就是，作者往往會基於「南北」的空間差異，通過「蠻夷之辨」的視角，將南方風土塑造為異樣的蠻族／蠻荒世界。而《桂林風土記》則不同，作者莫休符就是土生土長的南人，通過「內部觀點」，他所塑造的南方，則是被文明覆蓋，充滿詩跡、史跡與神跡的文化樂土。通過這樣的內外辯證，更能揭示出，所謂的地記並非只是客觀的紀錄，往往更夾帶著著作者的建構意圖與目光。

綜而言之，本文以知識、疆界與南方想像為思考進路，以求更寬闊的視野、更全面性的掌握唐人眼中的「南方」。必須特別強調的是，這三個關鍵詞並非獨立存在，而往往是相互指涉與混融的。只是基於討論的需要，筆者必須在此先將其分析出來，以便說明與探討。首先，本文將探討這批南方地記中，「知識」的向度。這三部作品作為「地記」，其內容固然包括對於南方風物、山川、水文、城市、習俗、人物等等的記載。此看似「南方」史料與知識的羅列，其實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背後展示出來的世界觀與認知框架。例如在《北戶錄》中，筆者將著重於探討作者段公路如何承繼其叔段成式《西陽雜俎》的博物家學，將「經驗」、「見聞」化為可被廣泛理解的「知識」。而《蠻書》中，本文則特別點出樊綽對於馬援銅柱、諸葛石碑等歷史遺跡的重現（甚至重構），透顯出南詔叛亂時代背景下，「戰爭」的陰影。而《桂林風土記》對於當地「詩跡」的特別凸顯，則展示出一派文人的園林風景。

其次，筆者以「疆界」為思考進路，不只是點出其中作為區隔或間隙的「界線」（包括空間上的南北差距、文化上的蠻夷之辨等等），更要強調「疆界」所夾帶的政治意義，以及位處國境邊陲、「華夏邊緣」曖昧的身分流動關係。

最後，則以「想像」作為整體性的關照。對於傳統士人來說，「南方」雖然

仍在國境之內，其疏遠、陌生卻好比異國。若是流寓或遷徙，借用高嘉謙的話，「那已是絕域，流放生命的終點。」¹¹因此，南方想像涉及的，不只是個人的身世浮沉，更關乎整個文化傳統的塑造下，「南方」所被奇觀化、異質化、陌生化的境況。從「北戶」、「蠻書」的命名，就能指出其中的獵奇好異的蠻夷之辨與官方視野，而《桂林風土記》卻彷彿將中土的「園林」移植到了西南，成為一文人化、案頭化的山水景觀。深入考察這些南方地記，會發現其所開展的「南方想像」皆不相同，卻有著一個共同的指向：對於「南方之為何物」的思考、探索與建構，而那正也是本文的核心關懷所在。

¹¹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年），頁58。

第二節、文獻回顧與評述

一、漢唐「地記」的定義與體例



人們用以指稱地理文獻的詞彙繁多，也並無明確的定義，諸如方志、地志、地記、地方志、風土記、地理書等等，使用上往往令人困惑。主要是古人之書寫，往往有其主觀意見，故對於文體詞彙的使用上，各有持見。本文採用「地記」一詞，主要是參考倉修良的研究。倉修良力圖辨證「方志」的起源來自於兩漢「地記」，並駁斥其他學者主張的《禹貢》、《山海經》、《周官》、古代諸國國史等說法。他強調，「地記」的產生，與人物傳記的發展有關。「地記」最初是以「風俗傳」的名義出現，而後又因應魏晉時期門第和郡望制度，發展出地方「耆舊傳」、「耆老傳」等。也就是說，「地記」與一般地理書，乃至於隋唐「圖經」的差別，在於其對地方人物、文化和歷史的重視。南朝時，任昉曾將所見之志書，與陸澄《地理書》匯為一編，得二百五十二卷，命名《地記》。《地記》所蒐羅的著作，並不全然是「地記」，然而「地記」之名及其大致的體例，有了較明確的定位。「地記」之名較「方志」為早，兩者基本上是相近的文獻，然而後者在體例上，相較下更為完備充足。到了唐代，地理著作以官方修製的「圖經」為主流，然「地記」並未消失，仍似「私史」般補充著地方的文化軼事。¹²本論文以「地記」稱呼這批唐代的地理著作，主要欲標舉者有三。首先是其較一般的「地理書」，多了一層歷史、時間的關注向度。其次則是隱伏於主流「圖經」之外，「補闕」的史傳（野史）精神。最後則是體例上未及「方志」完熟、仍在發展中的動能。¹³

¹²見倉修良：《倉修良探方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主要見〈論方志的起源〉、〈再論方志的起源〉、〈地紀與圖經〉等章節，頁16-104。

¹³陳凱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方文獻，無論是地記、風土記、人物傳、譜牒等，都屬於「方志」的前身，是一種「準方志」。見陳凱：〈舊方志文獻分類芻議〉，《廣西地方志》第四期（2010年），頁24-26。事實上，唐代的地方文獻在體例上雖相對完足，然與宋代的方志相比，仍差距甚遠。

「地記」固然有其書寫內容的慣例與特徵，然要為之「定義」，仍難免有所缺漏。借用近代學者李傳軍對於「風土記」的定義，即是：



我國漢唐時期的風土記既不同於我國古代以記載人物傳記、政治事件為主的正史，也不同於專記地理沿革和州郡設置的方志筆乘，具有鮮明的文獻特點。和流傳至今的一般古代方志不同，中國古代風土記並不是單純的地理書，它們還包含著歷史、物產、傳說、神話、歌謠等資料。可以說，在一定的地理空間敘述中，特別注重人的活動和人類文化的影響。¹⁴

李傳軍以「風土記」名之，主要是為了與其研究的主要對象，即晉人周處的《風土記》有所掛連。「風土記」的內容包羅甚廣，然若簡而言之，就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間敘述中，特別注重人的活動和人類文化的影響」的地理書寫。其所謂「風土記」，與本文所稱「地記」並無甚大差別，只是研究範疇和關注重點有些不同。例如，本文所研究的《桂林風土記》名「風土記」固無不可，然《蠻書》和《北戶錄》若稱「風土記」顯然有些扞格。因此，本為採用「地記」，是取較廣義處著眼。

要考察漢唐地記有哪一些著作，目前最完整亦較權威的鈔本，當屬清人王謨編纂的《漢唐地理書鈔》。然由於其輯錄之著作，往往因為年代久遠，而造成內文的不完整，甚至只留存目。本文並無意對其所述之著作，皆加以著墨，只能從大處著眼，提出以下幾點觀察：

一、本文所論「地記」書寫的體例，並不包含全國性或普世性的志寫。後者包括在《漢唐地理書鈔》中收錄的《河圖》、《括地圖》、《地鏡圖》、摯虞《畿服經》、樂資《九州志》、黃恭《十四州記》等。

¹⁴李傳軍：《漢唐風土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頁49。

二、《漢唐地理書鈔》所收錄「地記」的內容，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類。一是「一地之記」，其包羅較廣，記述之事也較雜。撮舉如盛弘之《荊州記》¹⁵、楊曄《徐州記》、裴淵《廣州記》、劉欣期《交州記》等等。另一則是「一地」之特定類別之記，諸如「一地之山水記」、「一地之風土記」、「一地之歲時記」、「一地之異物記」、「一地之耆舊記」等等，如唐人劉知幾《史通·書志第八》所稱：「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以下為劉知幾通過問答方式所做的舉例：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續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案帝王建國，本無恆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主《百家譜》，中原有《方司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厥類衆多，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為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¹⁶

此類地理著作，主要按照其所設定之類別書寫，如都邑，氏族，方物等等，然而並不一定全然如此。例如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因為「耆舊」二字，往往被人

¹⁵《漢唐地理書鈔》作「盛宏之」，與《隋書·經籍志》等著錄之「盛弘之」不同。見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13。

¹⁶唐·劉知幾著，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卷三（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89。

們視為單純的人物傳記。例如《隋書·經籍志》將其列入「雜傳類」，而新舊《唐書》、《崇文書目》、《直齋書錄解題》也都作《耆舊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對此作出修正，而指出應寫作《耆舊記》，其理由是：



《襄陽耆舊記》五卷，晉習鑿齒撰。前載襄陽人物，中載其山川城邑，後載其牧守，《隋·經籍志》曰《耆舊記》，《唐·藝文志》曰《耆舊傳》，觀其書記錄叢脞，非傳體也，名當從《經籍志》云。¹⁷

對晁公武來說，「傳」意味著人物傳記，而「記」顯然涵蓋更廣，還包括「山川城邑」以及「牧守」。此即可證明，《襄陽耆舊記》「記」、「傳」性質兼而有之，所以造成目錄學家各執一端的現象。¹⁸本文所稱「地記」，可以借用晁公武對「傳」與「記」的分辨來理解。所謂「記」，不只是人物傳記，更包括地理景觀、風物知識、制度沿革等等。此外，「記」的邊界模糊，蒐羅廣闊，體例並不穩定，或也可以視為一個特徵。

此外，「異物志」與本文所討論的南方「地記」最有關係，因此撮舉為例。這類著作，可以說是在「博物」的傳統觀念下，發展而成的書寫體系。在中國文獻史上，以《異物志》命名者，從東漢楊孚《交州異物志》，至唐人房千里《南方異物志》、佚名《嶺表異物志》，根據近代學者王晶波的考察，計有二十二種。主要是漢、唐所作，宋後即少見（或與地志發展完熟有關）。這些《異物志》大多已無全貌，而分散於史傳或地理著作之中。¹⁹細加考索，會發現這些《異物志》中，記述「南方」風物的著作佔據極大比例。以時代區分，有東漢楊孚《異物志》（又名《南裔異物志》）、三國文人萬震《南州異物志》、朱應《扶南異物志》、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薛瑩《荊陽以南異物志》、孫暢《南中異物志》、《南方

¹⁷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九（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頁101。

¹⁸以上討論，可詳見倉修良：《倉修良探方志》，頁91。

¹⁹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51期（2000年），頁178-184。

異物志》、《南中八郡異物志》等；而唐代則有孟瑄《嶺南異物志》、房千里《南方異物志》。此外，唐人孟瑄《南海異事》、劉恂《嶺表錄異》，雖不直名「異物」，而皆以「異」為視角，載錄南方的奇聞軼事。而許聖和則爬梳晉人張華《博物志》，指出其亦通過「異物」的觀點，對南方風土民俗加以載述。²⁰《異物志》書寫的興起，與政治勢力的拓展有關。當帝國霸業拓張，則其眼目所及的疆界，便擴及南越、西南夷及西域等遠方異域的山川地理、風俗物產。如向達指出的：「漢時南方漸與中國相通，殊異之物，多為中原所未有。覽者異之，遂有《異物志》一類書籍出現，與《山海經》、《博物志》相先後。」²¹

王晶波研究指出，歷代《異物志》的書寫，呈現了文學與知識性共生的現象。初期的《異物志》，較重視博物知識的展示與積累。而至六朝時期，發展出志怪的成分，到唐代則拋棄《異物志》的事實與傳聞之知識基礎，以華美詞藻與荒誕敘事取代。²²《異物志》的書寫，雖帶有知識性的博物成分，卻始終與「志怪」、「錄異」脫不了關係。知識性與文學性，往往難以區分界定。從《山海經》夾帶著神話思維的紀載，及至張華《博物志》，一連串的「異人」、「異俗」、「異產」、「異地」之傳述，所謂知識的徵實性與文學的想像性之間，邊界始終模糊，存在著互涉、流動的可能。

²⁰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頁197。

²¹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頁567。

²²王晶波〈從地理博物雜記到志怪傳奇——《異物志》的生成演變過程及其古小說的關係〉，《西北師大學報》34卷4期（1997年7月），頁60-64。

二、「南方」研究與地理書寫研究評述



(一) 以「南方」作為研究框架之評述

傅斯年曾指出，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往往因為政治分裂，或者北方為外族所控制，而區分出南北中國。²³日本早期學者桑原隲藏則以淮水、漢水為界，從政治情勢、戰爭流動、經濟規模等角度，切分出「南北中國」。²⁴傅斯年和桑原隲藏的觀點，提供我們一個思考南北中國的框架，然必須警覺的是那樣的「南」、「北」是相對參照，而非要指出其「本質」就是如何。在「南北中國」的思考脈絡之下，許多唐代的文學研究應運而生。

例如，有些學者從宏觀、歷時性的視角，來探勘「南方文學」的樣態。例如鄧敏文的《中國南方民族文學關係史·隋唐十國兩宋卷》，就從民族文化和民族史的角度，討論了「南方文學」的特質。此書主要有兩個著眼點，一是北方文人如何與南方文化如何互動交流，其中牽連了移動、抒情性以及民族情懷等特質。二是討論南方各族的創作，包括漢文書寫、傳說、歌謠體系等等。²⁵另外如李德輝的《唐代交通與文學》，則是以「交通」為思考進路，輻射出唐代文學與行旅心態、媒介傳播和異族交流等等的討論。該書第七章〈南北交通與唐南方落後地區文學的發展〉，就從「南」、「北」的空間阻隔和文化差異，以北方文人移動至南方的創作為中心，討論審美典範位移、個人與地方社群的互動等等²⁶。而張仁福在《中國南北文化的反差：韓愈與歐陽修的文化透視》中，則以韓愈和歐陽修為主要探討對象，從其作品展示的地域色彩與人文關懷，揭櫫了唐宋南北文人的

²³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

²⁴ [日]桑原隲藏著，黃約瑟譯：〈歷史上所見的南北中國〉，收錄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9-69。

²⁵鄧敏文：《中國南方民族文學關係史·隋唐十國兩宋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²⁶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主要參考第七章〈南北交通與唐南方落後地區文學的發展——以唐代湖南文學為例〉，316-352。

結構差異。²⁷而鍾乃元《唐宋粵西地域文化與詩歌研究》與殷祝勝《唐代文士與粵西》，則較聚焦於「粵西」地區的文人社群和詩歌創作。這二部著作最重要的貢獻，是將粵西文士區分出貶謫、宦遊、幕僚和本土四種身分。並且比較出不同脈絡下的作者，對於「南方」地域的想像和書寫樣態產生何種差別。²⁸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則站在史學家的立場，分別從思想心態與社會文化為進路，探勘唐人的「歷史記憶」：包括歷史觀念、歷史意識或歷史思想等。本書分為上下卷，上卷以朝廷君臣的思想言論為中心，考察唐人對近當代與漢帝國的態度及其意義；而下卷，則以詩文為主要觀察對象，指出唐人與在地文化如何互動、交流，進而形塑帶有地方感的文化與歷史記憶。與本文最有關係的，是第六章〈他方的歷史記憶：以唐代前其中原士人與南方的關係為例〉以及第七章〈歷史記憶的文本化、在地性與流通〉。在〈他方的歷史中：以唐代前其中原士人與南方的關係為例〉中，廖宜方提出「舊記憶」的概念，指出那些從「祖父母口中聽聞、或從圖書承習」的文化記憶，如何與人親自踏訪的實際見聞相互撞擊。他所探問的也正是本文關懷的重心：來自北方的唐人，如何帶著舊有的歷史記憶與文化符碼，理解「南方」的「新文化」？固然，廖宜方的論述對象是唐初士人，且文本也多以詩歌為主，而所謂的「南方」意指的也只是「江南」；然而，廖宜方卻指出南方的「報導文學」（「報導文學」為廖宜方用語），總是來自南貶的北方文人「他者」的目光。這裡的他者，指的不僅是「被逐出京，成為京城社會與士大夫社群的外人」，也同時對應著異邦人的形象。²⁹

近年來，有諸多學者關注到「南方」書寫的議題，諸如范宜如、張蜀蕙和胡曉真，皆針對南貶／南行文人議題，發表過一系列頗具啟發性的研究論文。范宜

²⁷張仁福：《中國南北文化的反差：韓愈與歐陽修的文化透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28-111。

²⁸參見鍾乃元：《唐宋粵西地域文化與詩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殷祝勝《唐代文士與粵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²⁹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頁373-496。

如和胡曉真主要聚焦於明代士人的「南方」書寫，且使用的材料不限詩文，更多的採用了地志文獻，筆者將在下一小節討論。

張蜀蕙則較重視唐宋文人，而主要研究的範疇是詩文中所呈顯出來的「南方」書寫。其著作撮舉如〈馴化與觀看——唐、宋文人南方經驗中的疾病經驗與國族論述〉、³⁰〈流動的生命經驗與空間對話——從白居易、蘇軾「歷杭」作品看其南方意識的形成〉、³¹〈開闢與安頓——唐代文人南方經驗中的宗教經驗與國族論述〉、³²〈唐代南貶文人的水域書寫〉³³等多種。張蜀蕙在其研究中，反覆凸顯出「南方」書寫中，具有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乃至於真實與想像之間的辯證張力。在〈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的南方——柳宗元貶謫作品中的疆界空間〉一文，她特別指出，將「南方」物候入詩、入文，一方面是符應讀者獵異好奇的需求，然另一方面，這樣的敘述方式又來自某種「寫作樣式」。而這樣的「寫作樣式」，可以追溯至屈原——屈原提供了南貶文人的情感參照以及南方想像的文本。然而，文人們的書寫顯然不盡然都是香花香草，這就與文人們的個別經驗與見聞有關。³⁴張蜀蕙的〈唐代南貶文人的物候與風土敘述〉對本文探討的主題最有啟發。在這篇短短的文章中，張蜀蕙提點了風土研究中，「物候與對抗」、「地氣與時」、「習與化」等研究面向。並檢視了唐代南貶文人，指出其面對與北方不同的氣候型態時，如何自處，乃至於「對抗」的姿態。此涉及的不只是身體感的問題（濕、熱與瘴氣），亦同時與前人的「南方」文本產生對話。例如鮑照〈苦

³⁰張蜀蕙：〈馴化與觀看——唐、宋文人南方經驗中的疾病經驗與國族論述〉，《東華人文學報》第七期（2005年7月），頁41-84。

³¹張蜀蕙：〈流動的生命經驗與空間對話——從白居易、蘇軾「歷杭」作品看其南方意識的形成〉《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二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676-695。

³²張蜀蕙：〈開闢與安頓——唐代文人南方經驗中的宗教經驗與國族論述〉，《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三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5-59。

³³張蜀蕙：〈唐代南貶文人的水域書寫〉，《嶺南學》第六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00-125。

³⁴張蜀蕙：〈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的南方——柳宗元貶謫作品中的疆界空間〉，《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一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606-621。

熱行)，便提供了文人們理解眼前異地「炎墟」的視野。³⁵

美國學者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11）的著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採用散文般優美的筆法，勾勒出帶有「半異域色彩」的唐代南方圖像，並抉發其中的文化意涵。此書涉及的議題甚多，包括民族、性別、信仰、風土、世界觀等等，作者並以一個意涵豐富的意象「朱雀」加以統攝。此書猶如百科全書，不只點出了唐代「南方」的知識內容，更涉及其唐人如何理解、詮釋「南方」的認知框架。誠如譯者程章燦所云，薛愛華動用的材料，不只是中古文學的文獻，更涉及了宗教、物質文化、自然史、觀念史、文化史等研究領域的成果。³⁶此書對唐代「南方」研究方法與議題，有重要的啟發作用，然也因為涉及的面向寬廣，還有不少可以討論並深入探勘的部分。

在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大略掌握「南方」的書寫特質；而最有意義的討論，無非是文人個體進入「南方」，與地方文化和前人創作產生的碰撞與交流。而最顯而易見的，無非是其所衍生的「流寓」、「鄉愁」等書寫。高嘉謙曾從「離散」的視角，指出「南方」書寫傳統，源於在根深柢固的中原意識下，「北方」長期象徵著文化與文明的中心。因此，離開「北方」而走向「南方」，往往被銘刻著亂離、憂患與磨難的記憶與印象。除了歷史上幾個重大危難，造成政權的「南渡」、族群的集體流亡以外，作為個人的遷徙、流亡、官宦貶謫等，常常意味著涉入險惡環境、身心的錯置、苦難的際遇等。³⁷此涉及的是人們對於「南方」異界的想像：不只是空間或文化上的阻隔差異，亦指向了一個關於「南方」的知識系譜與書寫傳統，及其所帶來的認知框架。

³⁵張蜀蕙：〈唐代南貶文人的物候與敘述〉，汪維輝主編：《中文學術前沿》第九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3-55。

³⁶ [美]薛愛華著，程章燦、葉蕾蕾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³⁷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頁52-58。

(二)「南方」地記書寫研究評述



在學界的研究中，「南方」地記往往被視為史料文獻來運用，因而大多只有初步的輯佚與引介工作。³⁸直到近年，才有學者從「文學」研究的立場，對地記專書加以考察。這裡所謂的「文學」研究，除了基本的史料考證、體例比對，還包括作者與當地文化、歷史、風土的互動，乃至其所透顯出的書寫動機、敘事策略，乃至於其背後時代意義之探討。

李傳軍《漢唐風土記研究》開篇就以「中國古代風土觀」為題，從民間習俗、宗教信仰、區域文化等因素，檢視「風土觀」如何形成。其主要著重探討的專書文本，是晉人周處的《風土記》研究。其貢獻包括輯佚、體例考察，以及其所乘載的吳越和荊楚風土文化之抉發。³⁹此外，其關注的另一個主題，是漢唐風土記中的域外風土映像與空間構設。此較廣泛的討論了西域風土記中，涉及的華夷、風俗之辨等議題。⁴⁰而江永紅的碩士論文《六朝地志之物類記述及其文學價值研究》，亦著眼於六朝地志的物類書寫，討論其書寫的淵源和興盛原因，並比較與「詠物」詩賦的題材、對象與創作手法的差別。⁴¹關於「地記」所見研究大多如上述二作，聚焦於文獻考察、輯佚與基本的引介工作。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是少數以文學觀點，較深入研究「西南」地域的學術著作；除了傳統的詩文研究，更深入的討論了書寫「西南」的地記文獻材料。其從「情感與世界」、「戰爭與治理」、「性別與歷史」等多重面向，討論這批往往被學界視為「邊緣」的文本。舉例來說，其第三章〈炎徼與我鄉〉就以明人田汝成的《炎徼記聞》為主要研究對象，探勘其在黔江地區任官時，對於廣

³⁸如上文提及的《唐代文化》、《中國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題解》等書。

³⁹李傳軍：《漢唐風土記研究》，頁 1-118。

⁴⁰李傳軍：《漢唐風土記研究》，頁 119-191。

⁴¹江永紅：《六朝地志之物類記述及其文學價值研究》，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4年5月）。

西地方風土的描摹。《炎徼記聞》固然有「遊記」的見聞成分，然胡曉真亦提醒我們，不可忽視其仍具有地理書寫的記實特性。學界對於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已有不少研究，並指出此書是明代商業文化、旅遊活動和遊覽志一個重要的展示。⁴²與書寫名勝地域與遊人活動的《西湖遊覽志》相比，《炎徼記聞》受到的關注顯得更少。胡曉真從此書勾勒的「炎徼異境」，與田汝成之返鄉／故鄉書寫做了比較，而指出了「起點」與「終點」相互參照下所激盪的意義。⁴³

而范宜如對於晚明「南方」地理書寫也有一系列的研究。包括〈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⁴⁴〈地景·光影·文化記憶：論王士性紀遊書寫中的江南敘述〉、⁴⁵〈謝肇淛《滇略》的書寫視域及文化意蘊〉、⁴⁶〈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以謝肇淛、徐燏、徐（火勃）為考察對象〉⁴⁷等。范宜如亦通過這些看似客觀記述的地理版圖、山川地景書寫，去探查作者個人與地方文化、歷史，乃至於方志書寫傳統的對話。舉例來說，在〈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以謝肇淛、徐燏、徐（火勃）為考察對象〉一文，范宜如就以「荔枝書寫」為中心，從「食物與地理」的角度切入三位作者的「閩南」書寫中，牽涉的文化視角與地景塑造。

從上述的梳理，我們可以窺見對於「南方」地記書寫的討論並不多，仍存在許多議題值得深入開展。本文選擇《北戶錄》、《桂林風土記》、《蠻書》作為討論

⁴²參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二十四卷四期（2013年12月），頁93-138。

⁴³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頁137-162。

⁴⁴范宜如：〈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國文學報》四十二期（2007年12月），頁121-151。

⁴⁵范宜如：〈地景·光影·文化記憶：論王士性紀遊書寫中的江南敘述〉，《東華中文學報》三期（2009年12月），頁145-169。

⁴⁶范宜如：〈謝肇淛《滇略》的書寫視域及文化意蘊〉，《國文學報》五十五期（2014年6月）頁165-199。

⁴⁷范宜如：〈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以謝肇淛、徐燏、徐（火勃）為考察對象〉，《國文學報》五十九期（2016年6月）。

對象，正是奠基於此；一方面欲補足對於唐代南方「地記」研究的匱乏，另一方面也試圖與前輩學者的研究接軌與對話。筆者所見的對於「唐代」南方地記的討論，大多只停留於基本的史料考證與輯佚或校釋。就本論文關注的三部作品而言，《蠻書》的整理工作最為豐碩詳實，有最多的注釋本，如向達《蠻書校注》⁴⁸、趙呂甫《雲南志校釋》⁴⁹、木芹《雲南志補注》⁵⁰。《北戶錄》與《桂林風土記》則尚無注釋本，只有陶敏的《全唐五代筆記》做了較認真的考校與輯佚。⁵¹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地理」、「博物」著作與「小說」之間的關係。董乃斌指出，除了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外，還存在著小說的友鄰或旁支，即那些雖不能列入小說，卻又與它存在種種親緣關係的文體。它們在小說形成過程中，曾經提供過小說養分，甚至也被看作小說的前身或小說的一種。但從比較嚴格的定義來看，畢竟不能算是小說，如野史筆記，博物紀聞，叢殘零札，乃至許多敘事性的散文雜錄之類。⁵²董乃斌又指出：

在《新唐書·藝文傳》史傳雜史、故事、雜傳記和地理類中，依然保留了許多我們視之為小說的東西……例如劉恂《嶺表錄異》、余知古《渚宮舊事》、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段公路《北戶錄》等等⁵³。

董乃斌點出了「地理類」收錄的作品中，有時亦夾帶著小說性質，而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段公路《北戶錄》正是本文關注的案例。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點出中國小說的分期方式，包括：「六朝之鬼

⁴⁸唐·樊綽著，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⁴⁹唐·樊綽著，趙呂甫校釋《雲南志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⁵⁰唐·樊綽著，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⁵¹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

⁵²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9。

⁵³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頁158。

怪志怪書」、「唐之傳奇文」、「唐之傳奇集及雜俎」、「宋之志怪及傳奇文」等。⁵⁴在這樣的基礎上，學者們進一步對中國小說進行分類。「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的提法，首見於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他將兩漢魏晉志怪小說，分出了「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一類，並把《山海經》、《十州記》、《括地圖》、《神異經》、張華《博物志》、郭璞《玄中記》和《外國圖》納入，討論其特質與承衍關係。⁵⁵

後起學者對李劍國分類方式有所辯駁，誠如羅欣指出的，在張華《博物志》十卷中，只有前三卷基本是地理類的描寫，後六卷則包羅甚廣，涵括物性、物理、藥物、方士、服食、物名、異聞、史補等等，以「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分類並不妥當。而魏晉以降的諸多著作，所收錄的內容也往往有雜質的存在。因此，他提出應該打破傳統小說集歸類的做法，以小說具體的內容為依據，將記載「山川、動植物、物理、醫藥、技藝、典章、風俗」為主的文言小說，統稱為「博物雜記類小說」。⁵⁶筆者認為，羅欣之說固然有理，也解決了一集之中有數種體例的問題；然李劍國「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的提法，或許更能點出「地理博物」和「志怪小說」之間千絲萬縷、難以切分的關聯。如林淑貞在《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中，指出了志怪小說中的地理書寫，往往夾帶著虛與實、想像與知識之間的辯證張力。⁵⁷而在張鄉里的《唐前博物類小說研究》，亦點出了南朝任昉《述異記》的各個條目，都是以「地理知識」作為線索，諸如湘水、江南、漢州、揚州等等。這些地點與《山海經》中難以考察的遠國、《十州記》裡縹緲的仙境相較，是確實存在且真實可考的。此外，《述異記》更偏重於人文地理，而非自然地理，且對物的介紹，雖也有成仙之物和奇異物產的記載，然更著重於人文景觀，諸如堯碑、姑蘇台、望帝台、闔閭夫人墓等等。⁵⁸綜而言之，「文類」

⁵⁴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 1-77。

⁵⁵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69-203、311-333。

⁵⁶羅欣：《漢唐博物雜記類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7。

⁵⁷林淑貞：《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臺北：里仁書局，2010 年），第六章〈地誌書寫：互為主體性的地景臨現〉，頁 123-170。

⁵⁸張鄉里：《唐前博物類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346-363。

的區分畢竟是後設的觀點，我們不必死守，而可以進一步思考這樣的分類帶來什麼觀看的方式。

回到本文關注的唐代南方「地記」研究，誠如董乃斌指出的，《桂林風土記》和《北戶錄》，保留了許多小說傾向的記述；然我們不應將其中幾則記載單獨抽出，因呈現出的虛構傾向，就輕易當作單篇小說來看。而應當放進「地記」的整體脈絡之中觀察，與更能確實掌握其中的意義。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將以當代「文化地理學」為基本思考進路，並進而參照和辻哲郎《風土》、鄭毓瑜「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等論述，掌握中國傳統「南方」地記的特點。所謂「文化地理」，顧名思義，就是人與自然環境互動，而生產出物質或精神上的總和，此間牽涉了包括經濟、政治、歷史、技術等因素。⁵⁹在當代「文化地理學」的討論中，有兩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要目。其一，是學者點出了「地方作為一種認識方式」之論題。此涉及了個人的知識與觀感，如何將只有物質意義的「空間」，轉化為帶有情感和文化意涵的「地方」。此間固然涉及被觀看的事物和觀看方式的互動關係，及其所引發如「刻板印象」、「命名」、「地方感」等論題。⁶⁰其二，則是強調地理學是「建構」，而非「天生固有」；因此我們必須對地理知識和權力形式保持敏感，描述並思考所謂「事實」背後，可能帶有的辯證關係。⁶¹

在日本學者和辻哲郎（1889-1960）的《風土》中，則從西洋哲學的觀點，提供了對於人與風土關係的另一層面思考。1927年，和辻哲郎奉命赴德國留學，在彼時受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於同年發表的《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之影響，起心動念，展開了《風土》的撰作。在序言中，和辻哲郎敘說本書的主旨，在於「闡明人的存在方式與風土的關係，而不是論述自然環境如何制約人的生活」。他認為，人與風土的關係，並非主客之別，而是一

⁵⁹關於「文化地理學」的定義及其涉及範疇，可參李旭旦主編：《人文地理學概說》（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年），頁135。

⁶⁰[美]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頁5-25。

⁶¹[英] Pual cloke 等編著，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概論·導論》（台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XVIII。

種相互發現。他特別關注的是，人如何通過感知、進入風土，並在風土中發現自己，並展示出人的「自覺存在的表現」。⁶²綜觀《風土》全書，和辻哲郎花費很大的篇幅，討論風土的類型與人的關係。他並不著眼於彼些風土類型的地理學意義（例如農作、交通、經濟模式），而是更宏觀的關注不同風土下展現的文化現象、民族性特徵，乃至於藝術的表現。例如討論「季風型」風土時，指出印度民族「易於感受」、「忍辱負重」的特質，乃至於《吠陀經》的藝術性格；而在討論「牧場型」氣候時，則連結到希臘文化對於人的自由、解放之關注。⁶³

鄭毓瑜則回返「抒情」的中國傳統脈絡，點出了「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以重新看待文學研究的根本基礎。其指出：

空間意象並不就等於從自然地域或文物遺址上所標示的方位，當然也不是單單由個人記憶就可以聚合出來，而必須是一種社會相續乎動下的經驗產物，是四面八方的線索相互作用下所浮顯的立體座標。⁶⁴

此論點與其後來「引譬連類」觀點可以相互對話並且連貫。⁶⁵其突破了「疆域－認同」的地域和國族限制，指出「典律－認同」的知識框架：也就是，所謂「地方」，是古今同情共感知所在，而「認同」存在於彼此共享的文體語碼之中。「文學筆法固然不是客觀地呈現區域或地方，但是卻比看似精確的統計圖表更能撐拄

⁶² [日]和辻哲郎著，陳力衛譯：《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序言、第一章〈有關風土的基礎理論〉，頁1-18。

⁶³ [日]和辻哲郎：《風土》，第二章〈風土的三種類型〉、第三章〈季風型風土的特殊形態〉、第四章〈藝術的風土性〉，頁19-182。

⁶⁴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全新增訂版）》（臺北：麥田出版，2015年），見導言〈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頁16。

⁶⁵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14-27。

起當時深刻的社會脈絡與在地經驗。」⁶⁶

承上所述，本文一方面參照了「文化地理學」的理論資源，並交相比對、審視中國「南方」地記的特殊意義——包括其中蘊含的認同與抒情向度。理論提供我們思考的起點，然最終仍要落實到文本的掌握。當我們在觀看這些「地記」作品時，一方面固然要考索其與實存地理空間的對應性，然另一方面，亦必須警覺那樣看似記實的書寫方法，可能透顯出作者的主觀意念、知識框架乃至其夾帶的時代意義與政治謀劃。借用 Mike Crang 之語，是「文學協助創造了這些地方」；⁶⁷ 本文一方面要檢視地記著作中「再現」的南方，另一方面，更要從「再現」出來的南方，進一步去勾勒與思考，在知識與想像之間展示出的對話與張力。

二、章節安排及內容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章節安排各章要旨，略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和問題意識，並界定「南方」地記的研究範疇、審視歷來的相關研究，交代論文結構及簡介各章內容。

第二章〈注視／注釋「南方」：段公路《北戶錄》中的唐代南方風土圖像〉，則聚焦段公路書寫嶺南風物的《北戶錄》，去探勘唐人筆下的南方風物，及其背後「如何理解萬物，而萬物又如何存在」的知識體系。首先，將以「家學」與「南遊」，引介段公路其人及其創作《北戶錄》的文體淵源，及「異」的觀看模式。並進而檢視《北戶錄》的書寫方式，指出段公路通過親身經驗，注視「在南方」的所見所聞，驗證或修正前人的說法。接著，爬梳「異物志」的發展，指出這些「異物」撰述，並非作者獨佔的「發現」，而是對同一風物或現象的繼承與變造。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北戶錄》的特別之處，在於通過文本和歷史典故的大量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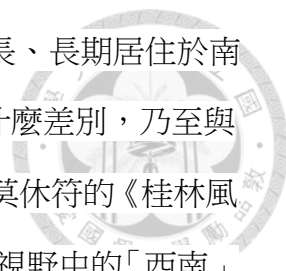
⁶⁶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見導言〈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頁 19-20。

⁶⁷ [英]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2003 年），頁 58。

引，用以「注釋」南方。此不只是中晚唐文人追異獵奇或炫學的心態，亦關乎段公路特殊的博物家學背景。使段公路筆下的「北戶」，不只是實在的南方地景，更是字詞符碼聯繫而成的文化圖像。

第三章〈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蠻書》中的西南敘事〉，則呼應胡曉真的說法，指出「中國西南」是人類學、歷史學上的經典題目，卻是文學研究的新課題。近代學者對《蠻書》中史學及民族學的考察，已有一定成果，而輯佚考據工作，也有為數頗眾的校注本。然而，對於《蠻書》專書更進一步的詮釋與研究，至今仍然匱乏。本章聚焦唐人樊綽的《蠻書》，一方面是補充前輩學者的研究，另一方面，則回應到筆者自身關心的兩個課題：首先，唐人如何理解並建構比「南方」更邊緣偏遠的「西南」風土圖像？如何在華夷之辨的傳統視角下，看待這個帶有辯證意味的「自我中的他者」，並藉著這個「他者」來審視自我？其次，如何從看似紀實的治理之書，考察作者的敘事策略，並詮釋其撰作策略與時代意義？唐人樊綽《蠻書》作為一部地方志，固然是對雲南當地風土的記載。然若將此書放入樊綽成書時，南詔勢力大起、交趾城破的時代脈絡，實不能忽略其中隱晦的「劫餘」紀事——也就是，在城市覆滅的災難以後，對於「已然失去」的故地的回眸與記憶。本文將以「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為思考進路，從戰爭、風物知識與歷史記憶的三個面向，去探勘《蠻書》隱而未顯的時代因素、書寫動機與文化意義。

第四章〈信是南方最勝遊：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中的詩跡、史跡與神跡〉。唐人對於「南方」邊陲的想像，多奠基於被派任乃至被貶謫的官員書寫之上。例如記述嶺南風土異物的段公路《北戶錄》、房千里《投荒雜錄》、孟瑄《嶺南異物志》，乃至於描寫雲南的樊綽《蠻書》、袁滋《雲南記》、竇滂《雲南別錄》等等。大抵來說，這些作品的書寫，幾乎不脫北方知識分子的「外部觀點」。他們往往通過南北的地域差異，乃至於文化傳統上的華夷之辨，來審視他們暫時作客的「南方」。在這樣的「外部觀點」籠罩下，「南方」往往呈顯出野蠻、兇惡、怪異的異



域風貌。⁶⁸緣此，不禁讓筆者想要探問，是否也存在著土生土長、長期居住於南方作者的觀點？而這樣的「內部觀點」，又與「外部觀點」有什麼差別，乃至與後者有辯證對話之處？基於上述的思路，本章擬聚焦晚唐士人莫休符的《桂林風土記》，藉由討論這部由書寫桂林風土的著作，來探勘唐代南人視野中的「西南」圖像。本章期望在文獻學與民族學的基礎上，拓寬視野，從文學詮釋的角度，進一步抉發《桂林風土記》的文化意義。包括《桂林風土記》撰作的體例，與前代地紀有何承衍關係？莫休符撰作此書的用心為何？其藉由書寫桂林風土，是否有更深刻的寄託？本文認為，《桂林風土記》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文字史料上的考證；而必須納入中晚唐時期，大量出現的「南方」風土書寫的脈絡中觀察。如此一來，更能凸顯出莫休符通過《桂林風土記》形塑出的「內部觀點」的特質，以及其與一般「外部觀點」書寫之地紀的辯證張力。本文認為，《桂林風土記》打破唐人一般對於「西南」蠻荒的想像，而通過通過詩跡、史跡乃至於神跡的連綴，將中土地區的文人化框景，移植到桂林，並進而構築出一幅別有洞天的西南「園林」敘事。

第五章為〈結論〉，回顧本文對唐代南方「地記」的討論，並總結此研究的貢獻及可能開展的面向。

⁶⁸請參見論文對於段公路《北戶錄》與樊綽《蠻書》的討論。

第二章、段公路《北戶錄》中的嶺南圖像



秩序既是作為物的內在規律和確定了物相互間遭遇的方式的隱蔽網絡而在物中被給定的，秩序又是只存在於注視、檢驗和語言所創造的網絡中；只是在這一網絡的空格，秩序才深刻地宣明自己，似乎它早已在那裡，默默等待著自己被陳述的時刻。

——傅柯：《詞與物》¹

第一節、前言

在中晚唐時期，出現了一批以南方邊陲為書寫範疇的風土筆記。相較為了中央統治方便的圖經方志，²這些風土筆記呈現了地方書寫的不同面向。檢視《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著錄，就有房千里《南方異物志》與《投荒雜錄》、孟瑄《嶺南異物志》與《南海異事》、劉恂《嶺表錄異》、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段公路《北戶錄》、尉遲樞《南楚新聞》、林謂《閩中記》、達奚通《海南諸蕃行記》、袁滋《雲南記》、竇滂《雲南別錄》等多種。³這些風土筆記，一方面見證南方的異地景觀、地方風物與人文歷史；另一方面，也透顯出唐代人們對於南方的想像，乃至關乎其背後，一套理解南方的博物知識體系。本章關心的議題，並不只是風土筆記裡呈現了哪些風物、何種習俗，而更關注作者如何將其見聞的「經

¹[法]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著，莫偉民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12月)，頁8。

²關於隋唐圖經發達的原因、編撰的方法與達成的效果，參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20-137。

³可惜的是這些「南方」筆記多有佚失，今日較完整的，僅得見房千里《南方異物志》與《投荒雜錄》、孟瑄《嶺南異物志》與《南海異事》、劉恂《嶺表錄異》、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段公路《北戶錄》、尉遲樞《南楚新聞》等。除了莫休符《桂林風土志》描寫西南風土，其餘作品都聚焦於嶺南的書寫。據此，本文所言「南方」，窄義上即指嶺南邊境，而廣義來說，即是唐人概念中，相對於「北方」中原的「南方」異境。參見宋·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509。

驗」，轉化為可以被不在此處的人們也能理解的「知識」。

本章擬聚焦段公路書寫嶺南風物的《北戶錄》，去探勘唐人筆下的南方風物，及其背後「如何理解萬物，而萬物又如何存在」的知識體系。相較於其父執輩段成式的《西陽雜俎》，段公路《北戶錄》受到的關注更少，目前較嚴謹的研究成果，僅見鍾無未的碩士論文以及余欣和鍾無未聯名書寫的期刊論文各一篇。後者是在前者基礎上，增補發展而成的版本，內容所差無多，皆為《北戶錄》做了相當認真的整理工作。⁴本文肯定其成果，然盼能在其文獻整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抉發《北戶錄》的敘事策略與文化意義。

《北戶錄》以南方風物為主軸，涉及「民風、土俗、飲食、衣製、歌謠、哀樂」的記述。⁵本文以傅柯《詞與物》作為本章的引子，是欲借用理論家對於「詞」與「物」之間隱然「秩序」的思考，來掌握、審視《北戶錄》中的知識圖像。

首先，本章將以「家學」與「南遊」作為關鍵詞，初步引介段公路其人及其創作《北戶錄》的養分與淵源，並考察其與《西陽雜俎》、博物志、乃至於「行記」書寫體例的關聯與差異。並進而以「注視南方」與「注釋南方」為思考進路。前者強調段公路面對異地知識的種種姿態，而後者則標舉作者對於經典文獻的拉連。本章將探勘《北戶錄》所展示的書寫特質，乃至於段公路如何將南方的親身經歷與見聞，納入龐大的「異物」知識網絡之中，逐漸編織出一幅既實而虛的「北戶」風土圖像。

⁴鍾無未：《北戶錄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余欣先生指導，2013年）；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第118期（2015年2月）。

⁵引陸希聲〈北戶錄序〉，見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三冊，頁2128。本文引述《北戶錄》文字，皆以此書為準。下文依敘述需要，僅標註頁碼，不贅注。

第二節、家學與南遊：《北戶錄》的成書淵源與體例考略



一、家學、南方與《西陽雜俎》

段公路，生卒年不詳，仕歷不見史傳，只知曾任萬年縣尉。然從《北戶錄》的載錄，可略知其南遊時間，大約是在唐懿宗咸通至僖宗乾符年間，⁶並從其提及的「愚又憶近事韋中令臯鎮西蜀時」，推敲段公路可能在南方任官府幕僚的線索。⁷關於段公路的生平，除了《北戶錄》寥寥的行旅紀載，而論及其家世背景者，就只有唐人陸希聲〈北戶錄序〉。陸希聲稱「東牟段君公路，鄒平公之孫也」，又云：

（段公路）自未能把筆，愛以指畫地如文字。及六七歲受學，果能強力不罷。其學尤長仄僻人所不能知者，薈乎群籍之中，佻佻然有餘力……予嘗觀圖於書府，君狀貌一似鄒平公，而又能以文學世其家。於乎！鄒平公為有後矣。（頁 2129）

文中的鄒平公，指的即是段公路的祖父段文昌。段文昌是唐穆宗時期的宰相，《舊唐書》有〈段文昌傳〉，而《新唐書》則附傳於其祖〈段志玄傳〉之下。《新唐書》提及段文昌的部分如下：

文昌素諳蜀利病，大抵治寬靜，間以威斷，不常任也，羣蠻震服……大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徙帥荊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

⁶ 《北戶錄》的時間標註，可見以下數條：〈緋猿〉：「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雞骨卜〉：「咸通辛卯年（十二年）從茂名歸南海，路盡東口，行次水程」、〈斑皮竹筍〉：「公路乾符初，經過夏口時，有人獻合歡筍於韋公尚書者」。

⁷ 清代藏書家陸心源〈重刻北戶錄敘〉的說法：「書中稱『咸通十年往高涼』，又稱『咸通辛卯年從茂名歸南海』，其人蓋先仕於粵而後官萬年尉者。」

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即日解而去，復節度西川。⁸



在《新唐書》的紀載裡，段文昌因為制伏了蜀地與南詔的蠻亂，屢屢立功，獲取武名。陸希聲在序中，以「鄒平公之孫」標誌了段公路的先輩系譜，不只凸顯出段氏的家世顯赫，或也揭示出從祖父段文昌開始，段家即與「南方」邊陲有著不可忽視的關聯。

此外，陸希聲的序文對於段公路「以文學世其家」的推崇，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段文昌之子段成式的《西陽雜俎》。關於段成式與段公路的親屬關係，有諸多說法。清人陸心源〈重刻北戶錄敘〉中，指出段公路是段成式之子，段安節之弟。而今人方南生所撰作的段氏家式表中，則認為段成式是段公路的叔叔。⁹本文較認可方南生的看法，因在《新唐書·段志玄傳》的附傳中，段成式之子只列段安節，並未列上段公路。¹⁰余欣、鍾無未比對了段公路《北戶錄》中〈斑皮竹筍〉一則，與《太平寰宇記》中段成式摹寫異竹、與徐商相唱和之事，其發生的地點與時間，有重疊之處，可見段成式與段公路的父執之誼，應屬不虛。¹¹段成式與段公路的實際互動，已難確考，然段成式「博學彊記」、「家多奇篇祕籍」¹²的家學背景，乃至於博物體的鉅作《西陽雜俎》，或也提供了段公路《北戶錄》的書寫示範。

⁸參見宋·宋祁等著：《新唐書》卷八十九，列傳第十四，中研院史語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北宋嘉祐十四行本，頁 3763-3764。

⁹段成式生卒年考證及其家世年表，見方南生編〈段成式年譜〉，唐·段成式著：《西陽雜俎》（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頁 305-308。

¹⁰參見宋·宋祁等著：《新唐書》卷八十九，列傳第十四，中研院史語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北宋嘉祐十四行本，頁 3764。

¹¹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頁 24。

¹²語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十章〈唐之傳奇集及雜俎〉，頁 53。

固然，二者於傳統目錄學的分類上有所不同，《四庫全書》把《酉陽雜俎》列為子部的小說家類，¹³而將《北戶錄》置入史部的地理類；然而，若從作者「摭采天下遺逸」的心態觀之，本質上並無差別。¹⁴換言之，段成式和段公路雖都有志怪／志異的心態，然亦著重於知識性材料的記述與闡發（如動物、植物、礦物，乃至於自然現象與科學技術），此是與一般以情節為中心的唐人傳奇小說較大的不同之處。¹⁵他們或隨筆抄錄（段成式自言「學落詞曼，未嘗覃思」¹⁶），或親加體驗（陸希聲言段公路「博而且信」），而都令彼些「異地」的人物與風土，成為知識體系的一環，有被認識的必要。

《酉陽雜俎》至少有三個可與《北戶錄》相互參照之處，以下分別論之。

其一，兩書都與「南方」有著密切的關聯。《酉陽雜俎》之名「酉陽」，一方面是藏書之所，也同時指涉著位處南方的荊州。盛弘之《荊州記》云：「小西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之。故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是。」¹⁷而宋人周登亦指出：「按唐史，成式世居青徐，齊褒公志玄四世孫，宰相文昌子也。文昌少客荊州，酉陽，荊之屬，成式豈嘗寓遊於此耶？」¹⁸根據方南生編〈段成式年譜〉，段文昌於貞元十五年（799）即入蜀，而段成式於貞元十九年（803）生於劍南西川，並隨父在蜀，直到五歲才歸返長安。而後，又有多次隨父赴蜀，並多年輾轉於揚州、江州、荊州等地，廣博見聞，養成了搜奇捕異之習。¹⁹楊義亦已指出，《酉陽雜俎》可看成南方習俗的投影，「是荊楚風俗與

¹³ 《提要》並指出「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來，推為小說之翹楚，莫或廢也。」

¹⁴ 相關討論可參見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頁215。

¹⁵ 程毅中在《唐代小說史》已指出段成式「寫的是志怪小說，但也有意探索自然界的奧秘……不僅記述了一些佛教故事，還保存了不少有關天象、礦藏和動物、植物的科技史料。」見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248-251。

¹⁶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頁1。

¹⁷ 引自唐·段成式著，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18。

¹⁸ 周登〈酉陽雜俎二十卷後敘〉，引自唐·段成式著，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頁18。

¹⁹ 見方南生編〈段成式年譜〉，唐·段成式著：《酉陽雜俎》，頁305-349。

作家趣味相契合的產物。」²⁰而《北戶錄》之「北戶」，則是指南方邊陲，特別是嶺南地區。²¹無論是「酉陽」或者「北戶」，我們可以說，「南方」在兩書中都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視角，而那可能是形成風物「奇觀化」的重要原因。

其二，則是這兩部書都具有的博異的功能，而作者亦帶有取異的心態。魯迅已指出《酉陽雜俎》帶有「錄異事」的特點。²²事實上，自六朝以降的博物著作，常常帶有「尚異獵奇」之色彩。²³就門類來說，《酉陽雜俎》就有「禮異」、「境異」、「物異」三種以「異」為目的命名。而「詭習」、「怪術」、「器奇」、「冥蹟」等門類，亦透顯著此書獵奇的撰作策略；更遑論「玉格」、「壺史」載神仙道教之術、「貝編」寫神佛釋氏之蹟。《酉陽雜俎》所展示的「異」之視角，隱然與《北戶錄》之「北戶」有所呼應。只是前者觸及的物類更為廣博繁雜，甚至帶有宗教上的關懷；²⁴而後者則聚焦於嶺南風土的見聞與記述，而亦帶有廣異的色彩。

《北戶錄》聚焦於嶺南風土，而《酉陽雜俎·境異》中，亦有一關於嶺南「飛頭獠子」的紀載：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美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²⁵

²⁰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17-218。

²¹關於「北戶」的意義，將在下一節詳細討論。

²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頁53。

²³許聖和爬梳六朝的「博物」觀念，並以張華《博物志》為例，指出因為帝國擴張與地域開發，使得過去未曾聽聞的奇特物種，逐漸形成文人炫博好奇的知識材料。見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頁197。

²⁴見鄭啓暉：《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論文，2004年），第三章〈《酉陽雜俎》的宗教敘事分析〉之討論，頁45-61。

²⁵唐·段成式著：《酉陽雜俎》，頁47。

「飛頭獠子」的奇事，並非段成式第一個記錄。考察歷史文獻，可以發現此傳說早有淵源。較具代表性的，是晉人張華《博物志·異蟲》中，有「落頭蟲」的描述：



南方有落頭蟲，其頭能飛。其種人常有所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之焉。
以其飛因晚便去，以耳為翼，將曉還，復著體，吳時往往得此人也。²⁶

而干寶《搜神記》則記為「落頭民」：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中出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體氣甚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和平。桓以為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²⁷

從張華《博物志》「落頭蟲」、干寶《搜神記》「落頭民」，再到《酉陽雜俎》「飛頭獠子」，我們可以發現，三者的敘事細節雖有差別，然異地（「南方」）與異事（「飛頭」）這兩個基本要素，在三個文本中都有出現，使我們能清楚看出其中的承衍關聯：南方「異境」如何與異象、異物、異俗相連。而這樣的「境異」觀點，在《酉陽雜俎》亦屢屢呈顯於「物異」篇，乃至於「諾皋記」及續編「支諾皋」

²⁶晉·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37。

²⁷晉·干寶：《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月），卷12，頁283。

的異國書寫。比較而言，《西陽雜俎》的「異」涉及的範疇較廣，更像是一部「雜家」、「雜學」之書；²⁸而《北戶錄》則帶有「行記」的傾向，不只記錄風物，亦載述自身遊歷南方的行蹤。然將「異地」與「異物」結合起來，仍是二者相似之處。

其三，在書寫方式上有相仿，乃至於承衍之處。兩書記述時，往往不只是平直的羅列，而會通過文獻經典與歷史典故的援引，將其所見聞之人事物加以「連類引證」。²⁹《西陽雜俎》對文獻典故的援用時有所出，可見於「屍窆」篇引《周禮》談罔象、引《水經》、《漢舊儀》談墳墓的機關、或者「語資」篇對文壇典故的援引等等。《西陽雜俎》對於經典的援引並不如《北戶錄》那麼頻繁，然在《西陽雜俎》的「廣動植」和續集的「支動」、「支植」篇中，卻相對較多。此自然讓我們聯想起《北戶錄》的書寫方式，亦是通過歷代經典去「注釋」南方風物。段成式於〈廣動植并序〉中言：

成式以天地間，造化所產，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故《山海經》、《爾雅》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魚，未列經史；或經史已載，事未悉者；或接諸耳目，簡編所無者。作「廣動植」，冀培土培丘陵之學也。³⁰

在這段小序中，段成式交代了其書寫「廣動植」篇的動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²⁸ 關於「雜家之書」的說法，可參見許逸民的討論：「就其（《西陽雜俎》）學術屬性來說，即使依舊遵循《四庫全書總目》的類目區分，將《西陽雜俎》仍然留在子部小說家類，那也不宜再混同於《述異記》、《清異錄》、《諧史》、《古今諺》等單一綴輯瑣語，無關宏旨之作，而應該獨設一個兼備小說諸體的『雜俎』屬類。而若就《西陽雜俎》有關歷史、地理、動植、礦產以及中外交通史的主體成分來說，則改易其原屬門類，也應該試題中應有之義。具體來說，我以為《西陽雜俎》脫離小說家類，改入子部雜家類，方稱允當。」見唐·段成式著，許逸民校箋：《西陽雜俎校箋》，頁3。

²⁹ 「連類引證」是陸希聲序《北戶錄》時所云，本章將在第四節詳加討論。

³⁰ 見唐·段成式著，許逸民校箋：《西陽雜俎校箋》，頁1095。

其指出了「經史簡編」與「造化所產」間的種種關係，分別有「有草木禽魚，未列經史」、「經史已載，事未悉者」、「接諸耳目，簡編所無者」三種。段成式之語，不只含攝著「補闕」、「錄見聞」的觀點，更重要的是，其似乎已意識到了經典與風物之間可能存在的可能性。「未列」、「未悉」、「簡編所無」者，成為了段成式書寫「廣動植」篇的動力。

將「廣動植」篇和《北戶錄》稍加比較，可以發現兩書所描述的物產，有些許重疊之處。例如皆寫及孔雀、鷓鴣、紅蝙蝠、十二時蟲、蛺蝶等多種。二者的描述的內容與方式，都有可相比觀，甚至可能有承衍之處。舉例來說，述及鷓鴣時，《酉陽雜俎》云：「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於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又云：「鷓鴣似雌雉，飛但南不向北。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鳥像雌雉，名鷓鴣。其志懷南，不向北徂。』」³¹

而《北戶錄》則云：

衡州南多鷓鴣，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辟溫瘴，前臆文為白圓點。又一名鴉，多對啼。每啼，連轉數音，其韻甚高。《廣志》言：遮姑鳴云「但南不北」。《古今注》云：「其鳴自呼」。《南越志》云：「鷓鴣，陽鳥也。雖復東西迴翔，然而命翻之始，必也南翥。其鳴自號。出杜薄州，食之亡癘。」
(頁 2131)

比較二者對於鷓鴣的描述，可以發現《酉陽雜俎》引東漢楊孚《交州異物志》「其志懷南，不向北徂」，闡述鷓鴣「飛但南不向北」的特點。而《北戶錄》雖未引《交州異物志》，卻也引《廣志》「但南不北」、《南越志》「命翻之始，必也南翥」說明相似的特徵。除此之外，也描寫了鷓鴣的鳴叫音韻，乃至於其「解嶺南野葛

³¹ 見唐·段成式著，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頁 2043、2062。

諸菌毒及辟溫瘴」、具有醫病價值的實用性。

而在述及鸚鵡時，《酉陽雜俎》云：



鸚鵡，能飛。眾鳥趾前三後一，唯鸚鵡四趾齊分。凡鳥下睞眨上，獨此鳥兩睞俱動，如人目。玄宗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咤。岐府文學能延京，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張燕公有表賀，稱為時樂鳥。³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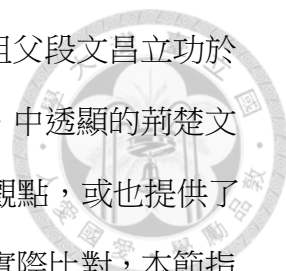
而《北戶錄》則著眼於「鸚鵡瘴」：

廣之南，新、勤、春十州呼為「南道」，多鸚鵡。翠衿丹觜，巧解人言，有鳴曲子如喉轉者，但小不及於隴右。每飛，則數千百頭。食木葉榕實。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顛而卒，土人謂為鸚鵡瘴。愚親驗之。咸通十年夏初，有三大舶將五色鸚鵡至者。雖繡羽錦衣，而病其胡語。昔天監年，交州有獻能歌鸚鵡者，詔亦不納。

《酉陽雜俎》對鸚鵡的描寫，顯然帶有一層稀珍浪漫的色彩，且與文學想像相連。而《北戶錄》中，嶺南的鸚鵡不再如此稀有，而是「每飛，則數千百頭」，甚至「交州有獻能歌鸚鵡者，詔亦不納」。對於鸚鵡的描述，似乎有意和《酉陽雜俎》分庭抗禮，標舉出「北戶」此地的鸚鵡。綜而言之，《酉陽雜俎》的「廣動植」及「支動」、「支植」篇，或與《北戶錄》有承襲的關係，然在面對相同風物時，段公路卻仍會揀選不同的文本材料，與前者加以區分。此涉及了作者「廣異」的博物意識，或也關乎某種競寫、有意與前人區別的心理。

綜合本節的討論，筆者爬梳了段公路的家學淵源，從中歸結出《北戶錄》的

³²唐·段成式著，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頁 1139。



可能養分。一方面，是段家與「南方」千絲萬縷的關聯，包括祖父段文昌立功於蜀地、南詔等南方蠻區的顯赫武功，乃至於段成式《酉陽雜俎》中透顯的荆楚文化內容。另一方面，則是《酉陽雜俎》中博物體例與「境異」觀點，或也提供了《北戶錄》書寫的樣式和觀看的視角。通過與《酉陽雜俎》的實際比對，本節指出《北戶錄》與《酉陽雜俎》中的「廣動植」、「支動」、「支植」篇，有重疊之處。雖難以保證段公路是取材於《酉陽雜俎》，然稍加比對，仍可點出二者之間存在的對話關係。其中較值得一提的，是二者皆通過文獻典故的比附，將異地風物納入文化體系之中。《北戶錄》加強發揮了這樣的書寫模式，使其呈現出與其他南方地記不同的特殊樣貌。

二、南遊與行記



陸希聲於〈重刻北戶錄序〉中，對《北戶錄》的成書意旨，做了如下涵括：「間者以事南遊五嶺間，嘗采其民風、土俗、飲食、衣製、歌謠、哀樂有異於中夏者，錄而志之。」（頁 2128）段公路究竟為了何「事」而「南遊」，從今日資料看來，已難詳知，只能從《北戶錄》的線索，推敲其可能在南方任官府幕僚。此外，陸希聲的〈北戶錄序〉中，亦指出了段公路對於民風土俗的採集，是本諸「異於中夏」的基礎。換言之，段公路的「南遊」，意味著進入了一個「異於中夏」的空間。通過「異」的視角，南方風物似乎都沾染上了異樣的色彩。而此從《北戶錄》的書名，更可洞見。

段公路《北戶錄》的命名，源於《爾雅·釋地》的「四荒」之說：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峽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大平，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大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四極。³³

郭璞注：「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邢昺疏：「北戶者，即日南郡是也。」³⁴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日南郡時則言：「言其在日之南，所謂北戶以向日者。」³⁵綜而言之，「北戶」不只意味著南方，且指涉的就是南方邊陲。在唐人令狐德棻所撰《周書·異域》中，

³³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正義：《爾雅注疏（下）》（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 221。

³⁴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正義：《爾雅注疏（下）》，頁 221。

³⁵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86年10月），頁 1669。



記述了高麗、百濟、蠻、獠、宕昌等「異域」的族裔，並在文末，的史臣議論中，對「四荒」之說有了更進一步的引申：

史臣曰：凡民肖形天地，稟靈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雨露所會，風流所通，九川為紀，五嶽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出焉。昧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好亂，彊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斯蓋天之所命，使其然乎。³⁶

令狐德棻通過「凡民肖形天地，稟靈陰陽」的氣感論述，指出了地方風土對生活於其上的人們，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他認為，「雨露所會，風流所通，九川為紀，五嶽作鎮」的「諸夏」，與「昧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河」的「荒裔」，不只是地理空間的差距，更因為「感其氣」，而產生了「仁義」與「凶德」的差距。在令狐德棻的論述中，那些「邊鄙」之人，被理解為「貪而無厭，狠而好亂」的野蠻份子。若從這個角度看，段公路以「北戶」命名南方，實已透顯出文化上的判準；地形空間的阻隔，同時也意味著文明與野蠻、自我與異己的拉鋸。在當代人文地理學中，「命名」是一重要的文化活動。通過「命名」，可以使實存的、物質性的「空間」，轉變帶有個人情感，並賦予文化意義的「地方」。³⁷段公路將南方風土以「北戶」命名，已透顯出段公路往往通過歷史或文化符碼的拉引，建構眼前的「南方」圖像。

《北戶錄》雖以地方風物的記錄為主軸，卻不同於一般的地記或博物書寫。最主要的差別，在於作者段公路一再於文中現身，閃滅著行旅者的眼光，也使得

³⁶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32。

³⁷參見[英]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頁5-22。

此書附上了一層遊歷記聞的色彩：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獼，有黃緋者。緋者絕大，毛彩般鮮，真謂奇獸。

——〈緋獼〉，頁 2132

公路至雷州，對岸倚舟，候風勢。見羣小兒簇二巨虵，各長丈餘。

——〈紅虵〉，頁 2134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手因覩嵒側有一木，五彩。

——〈蛺蝶枝〉，頁 2136

公路咸通辛卯年，從茂名歸南海，陸盡東口，行次水程，舟人具牢醴以祭船神，請愚為祝。

——〈鷄骨卜〉，頁 2144

公路乾符初，經過夏口時，有人獻合歡筍於韋公尚書者，自一本分為兩歧，長二尺餘，乃筍之瑞也。

——〈斑皮竹筍〉，頁 2150

柯慶明討論「遊覽記」和「山水記」的分別時曾指出，前者帶有「時間性」，而後者以「空間性」的描述為主。³⁸《北戶錄》雖仍以靜態的風土描述為主，然段公路屢屢在文中出現，不只標記時間，亦點出了行旅的路線，使其帶有「行記」

³⁸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第八章〈遊覽「記」與山水「記」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頁 381。

的動態色彩。李德輝曾指出，「行記」顧名思義，該是對己身行旅的記述，然更多時候，反倒是沿途的山川地理和見聞超過了行程本身，「行程路線反倒時隱時現，若有若無，致使敘行的主線淹沒在對山川風俗的載錄上，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它紀行的特色，模糊了它以行為本的性質。」³⁹

綜言之，《北戶錄》是一部混合了「行記」性質的地記作品，使《北戶錄》不只是靜態的博物陳設，更同時是動態的行走、觀看與感受。讀者可以從段公路記述的南方足跡，勾描出一幅嶺南遊歷的路線，並更能體驗有著多重間隔的「南方」。必須強調的是，「南遊」所牽涉的文化意涵，可以是屈原以降南方文士的所思所感，⁴⁰亦關乎「北戶」一詞所牽繫、華夷之辨視野下的蠻荒異域。而「南遊」所啟動的流轉視角，本文將在下一節更深入考察。

³⁹關於「行記」的文體特質與相關討論，參見李德輝：〈漢魏六朝行記三類兩體敘論〉，《東華漢學》十四期（2011年12月），頁21-54。

⁴⁰見張蜀蕙的討論：張蜀蕙：〈馴化與觀看——唐、宋文人南方經驗中的疾病經驗與國族論述〉，《東華人文學報》第七期（2005年7月），頁41-84。王立群則指出，屈原的《哀郢》、《離騷》、《涉江》等，可說是唐前遊蹤書寫的發軔之作。見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游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88。

第三節、注視南方：親驗與操作



《北戶錄》書前，有陸希聲的序文，說明了《北戶錄》的書寫要旨：

近日著小說者多矣，大率皆鬼神變怪荒唐誕妄之事。不然，則滑稽談諧以為笑樂之資。離此二者，或強言故事，則皆詆訾前賢，使悠悠者以為口實。此近世之通病也，如君所言，皆無有是。其著於錄者，悉可考驗。此蓋博物之一助，豈徒為譚端已而乎？君以予往年從事嶺南，備覈其實，請予序以為證。（頁 2129）

陸希聲標舉《北戶錄》「其著於錄者，悉可考驗」，並視之為「博物之一助」的特點，實是對中晚唐時期，日漸「荒唐誕妄」、作為「笑樂之資」的小說的反動。⁴¹在陸希聲的眼中，《北戶錄》雖多有「異於中夏」的記述，卻無「近世之通病」。換句話說，段公路撰作《北戶錄》一書，一方面有求異、廣博之意圖，另一方面卻戮力徵實，使其可信，作為可供來者「博物之一助」之書。

《北戶錄》在記述嶺南風物時，屢屢援用前人的方志著作，如楊孚《交洲異物志》、萬震《南州異物志》、沈懷遠《南越志》、裴淵《廣州記》等。然較前人較不一樣的是，《北戶錄》中，常常呈顯出作者段公路親身參與的紀錄。除了上一節論及對於前代「行記」作品的承繼，與《北戶錄》同期的地記著作也呈顯出相似的書寫特點。例如房千里《投荒雜錄》所記：

春州南門外有仙署館，館中有盧公亭，房千里貶官，尋醫於斯州，太守館之於是。東廂有內室，僕夫假寐。忽有朱衣人，甚魁偉，直來其前。僕輩驚，走告千里。既一二夕，又然。千里不信，然不復置於室內。後

⁴¹此讓我們聯想到，段成式《酉陽雜俎》雖記述了許多神異靈怪之事，在〈序〉中仍強調「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怪小說之書也。」見氏著：《酉陽雜俎》，頁 1。

累月，徙居溪亭。復有假掾吏寄與東室，晝日，見一男子披紗裳，屣履而來，曰：「若無久駐此。」掾驚出戶，俱以狀白於僚吏。有老牙門將陸建宗曰：「元和中，誅李師道，其從事陸行儉流於是州，賜死於是。」⁴²



或劉恂《嶺表錄異》所云：

波斯棗，廣州郭內見其樹，樹身無間枝，直聳三四十尺，及樹頂四向，共生十餘枝葉，如海稷廣州所種者。或三五年一番，結子亦似北中青棗，但小耳。自青及黃，葉已盡，朵朵著子，每朵約三二十顆。恂曾於番酋家，食本國將來者，色類沙糖，皮肉軟爛，餌之，乃火爍水蒸之味也。其核與北中棗殊異，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如小塊紫礦。恂亦收而種之，久無萌芽，疑是蒸熟也。⁴³

地記作者於文本中親自「現身」，似乎是唐代嶺南書寫一個共同的標誌。此一方面使文本內容更加生動，另一方面，也加強了所記之徵實性與可信度。

在《北戶錄》中，作者的「現身」並不只是單純交代遊歷的行蹤，或者旅途的見聞，更同時通過與所見的風物觸碰、操作，加以「驗證」。如此一來，便將個人的「經驗」，轉化為可被接受、理解的「知識」。然而誠如高桂惠先生所提點的，此間值得探問的，並不只是簡單的由「經驗」轉為「知識」的問題，更是段公路面對彼些南方風物知識的多種姿態。⁴⁴

試舉以下幾則記述，以觀察段公路如何對南方風物進行描寫與驗證：

⁴²唐·房千里著《投荒雜錄》，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二冊，頁 1099。

⁴³唐·劉恂著：《嶺表錄異》，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四冊，頁 2612。

⁴⁴高桂惠先生於筆者考口中，提出了諸多寶貴意見。其中最有啟發的，即是指出了這批南方地記所展示出的、面對知識的種種「姿態」。

通犀，置大霧重露下，終不沾濡，又堪為釵蠹。撓藥酒，酒生沫，若貯米飼雞，雞見輒驚散，一呼為「駭鷄犀」。或中芮箭刺，置於創中，立愈。蓋犀食百毒棘刺故也。愚重譯於蕃人，事皆不虛。今廣州有善理犀者，能補白犀。補時以鐵夾夾定，藥水煮而拍之，膠為一體，製梳掌，多作禽魚，隨意匠物。論其妙，至於鑄玉者方之蔑如也。又有裁龜甲或觜蟻、陷黑玳瑁為斑點者，亦以鐵夾煮而用之，為腰帶襯子之類。其焙淨，真者不及也。玳瑁，《切韻》字從「玉」，《文選》字從「蟲」，歐陽詢飛白從「甲」。愚以「甲」為是。凡玳瑁甲生取者，治毒第一，其力不下婆薩石。愚曾取解毒，立驗。南人神之。亦甚辟惡，與符拔甲相類。

——〈通犀〉，頁 2129。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緋者絕大，毛彩般鮮，真謂奇獸。夫猿則狙、獾、獠、狢之類，其色多傳青白玄黃而已……愚因召獵者捕而養之。極馴，不貪食。於樹杪間，呼之則至。但臂長，身不便於行，而未見通膊者也。後一歲，自潘州迴，路歷仙虛，聞舊山猿猿，不食而卒。噫！其為獸之性一何仁耶！是知鄧艾感事投弓，故無虛語。

——〈緋猿〉，頁 2132-2133

愚又憶近事韋中令臯鎮西蜀時，有黃柑一樹，方熟，忽數夕，眾實皆落，唯樹杪一帶獨存，其大如碗，枝葉滋茂，異於常者。園吏具白韋令。韋令親視之，曰：此奇果也，非臣下宜食。議欲表進，令去蒂尺餘折之。其實從蒂自落。有善醫者咎殷侍立，曰：「凡木實未過時蒂脫者，乃實之病也。請針驗之。」韋令再三方許。咎殷引針就蒂刺之，其實應

手而轉。殷則連下，一刺，血濺盈袖。韋令大驚，因命破之，乃兩頭蛇也。《異苑》又云：河內司馬元胤，元嘉中為新塗令，喪官。月旦祭柑，化而為鵝，又何怪也。

— 〈紅蛇〉，頁 2134

多居古木竅間，自呼其名，聲絕大。或云：一年一聲，驗之非也。又有十二時蟲，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於身，背生髻鬣，行疾如箭。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愚嘗獲一枚，閉於籠中，翫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一云：其首隨時輒作十二屬形，乃言之過也。

—— 〈蛤蚧〉，頁 2134

恩州有鹽場，出紅鹽，色如絳雪，驗之即由煎時染成，差可愛也。

—— 〈紅鹽〉，頁 2146

端、新州有鳥，類青鷁而觜大，常在池塘間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羣出其口。按《爾雅》曰：「鷁鳥似烏鷁而大，黃白雜色，鳴如鷁聲。」《廣志》云：「蚊母，此鳥吐出蚊也。」土人云，其翅堪為扇，唯辟蚊子，與陳藏器說同。又云：塞北有蚩母草，嶺南有蚩母木。此三色異類而同功。《南越志》又云：「古度樹，一呼椰子，南人號曰柁，不華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實中化為飛蛾，穿子飛出。」愚驗之，亦有為蚊子者。

—— 〈蚊子扇〉，頁 2141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手因覩崑側有一木，五彩。初謂丹青

之樹，因命童僕採之。頃獲一枝，尚綴蛺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縷者、金眼丁香眼者、紫斑眼黑花者、黃白者、緋脈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愚因登岸視之，乃木葉化焉。是知蝶生江南甘橘樹中。

——〈蛺蝶枝〉，頁 2136

在上述的引文中，作者段公路皆涉身其中，親自勘驗，而成為南方風物的見證者。例如〈通犀〉取以解毒、〈蛺蝶枝〉中命童僕採集、〈紅虵〉以針刺果實方知是兩頭蛇、甚至親自獵養緋猿等等。通過這些「驗證」，使得原來異地的見聞，獲得了可信度。此外，《北戶錄》亦有對前人的說法有所修正或補足。例如，在較《北戶錄》早撰作的段成式《酉陽雜俎》及孟瑄《嶺南異物志》都書寫到「十二時蟲」，然段公路指出了其中的謬誤之處。又或者，段公路發現南人常取紅蝙蝠作媚藥。不過，考察過往書籍的記載，可製作媚藥的藥材包括龍子、布穀腳脛骨、鵲腦、荀草等，然而卻沒有紅蝙蝠，「獨未見錄紅蝙蝠處，豈闕載乎？」段公路通過見聞與驗證，糾正了前人資料的不足。

除了親自驗證以外，《北戶錄》裡亦有不少南方風物如何被運用的記述。在段公路的筆下，嶺南異物往往是可以通過人類之運用，而成為「實用」之物的。包括以動植物磨製而成的藥方（〈通犀〉、〈紅蝙蝠〉、〈鶴子草〉）、占卜的用品（如〈雞卵卜〉、〈雞骨卜〉）、動植物製成的日常器具（如〈蚊母扇〉、〈紅鰕盃〉、〈雞毛筆〉）、養殖的方法（如〈魚種〉）、甚至是食物（如〈象鼻炙〉、〈鵝毛脰〉、〈米麩〉）以及料理方法（如〈食目〉）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通過親驗，然《北戶錄》的記述偶爾也會帶著奇異的色彩。例如〈水韭〉：

生於池塘中，葉似韭，有二三尺者，五六月堪食，不葷而脆，得非龍爪薤乎？……鄺善長又云：平樂村五六里，至東亭杜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東西廣二丈許，高起如屋，中有石床，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

許，則風必偃之，方可揃也。如過越不偃而揃者有咎。(頁 2150)

段公路引述酈道元之語，道出「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必偃之，方可揃也。如過越不偃而揃者有咎。」在此，水韭似乎被賦予了神巫色彩。⁴⁵又或者，〈紅虵〉一篇，談及以針刺果實，而果實變形為紅虵之事，引述《異苑》：「河內司馬元胤，元嘉中為新塗令，喪官。月旦祭柑，化而為鵝，又何怪也？」《北戶錄》中，對於物種變形的記載，自然讓我們聯想到六朝小說中一系列的物魅變形故事。⁴⁶

綜本節所述，本文認為，段公路書寫《北戶錄》，是以「實筆」錄「異事」的精神，注視南方。他通過親身經驗，撰述「在南方」的所見所聞。不只比對傳聞的真假，也通過實際的觸碰、採集、豢養，證實或辨駁這些異事的存在。然這樣的「實證精神」，也並非全然的排除神怪異說，更匯入了一定程度的浪漫想像。⁴⁷換言之，段公路一方面是將其「見聞」與過往的「傳聞」比對，而得出事實與否。而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實際的觸碰、操作，將原來只出現在文獻中的「異物」，落實在現實之中。

⁴⁵薛愛華指出，唐人頗重視草本植物的用途，且其醫學用途往往與巫術、宗教及象徵用途分不開來。換言之，在唐人的觀念中，所謂「實用」，並不全然與神祕色彩脫節。[美]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 1913-1991)著，程章燦、葉蕃蕃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338-339。

⁴⁶關於六朝小說中的變形觀，參見康韻梅：《六朝小說變形觀之探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頁 53-65。

⁴⁷薛愛華指出，不同於前代對於南方的刻板想像，總是有毒的植物、蜿蜒的毒蛇、黑色的森林，隨著對南方的理解，唐人逐漸發現發現南方的過人之處，「南方不再是煉獄或魔窟，而成了神聖的避難所。」(Edward Hetzel Schafer, 1913-1991)著，程章燦、葉蕃蕃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531。

第四節、注釋南方：引證與記憶



考察「物」的語源，已隱括了先民對宇宙萬物的認識，同時也是想像世界的方法。王國維認為，「物」字「從牛勿聲」。而「勿」的甲骨文本意，為有色之旗，故「物」即「雜色牛」。「物」字之意由「雜色牛」引申而出，即「萬有不齊之庶物」，故許慎解「物」為「萬物也」。⁴⁸李豐楙則指出：「將宇宙間林林總總的森羅萬象，凡接於目者總名之為物，類此大共名的認識應是始於人對於萬物的分辨之時。」他認為，「物」字意味「共名」的產生，反過來說，也是「分辨」、「分類」概念的出現。⁴⁹鄭毓瑜則進一步指出「物」與「類」的密切關聯。鄭氏認為觀看「物」的方式並非追問其「是什麼」，而是「如何在」，也就是「物」在「類」的脈絡之中如何呈現。鄭毓瑜從「名物」、「方物」等詞彙探討，指出在類分、感應的模式之中，「物」逐漸形成了一相互關聯的知識體系。⁵⁰也就是說，在追問「物」為何物之前，實當考察「物」在一個龐大的關聯網絡之中，如何呈現，及居處於什麼位置。綜合來說，「博物」在中國傳統之中，實是一張知識的大網絡：關涉著人如何理解萬物，而物又如何存在於此知識網絡的問題。

循著上述學者的思路，則我們也可以提問：《北戶錄》中的「異物」、「異事」，是怎麼被放置在一張古往今來的博物系譜中？或者，最根本的問題應該是：段公路如何描述「物」？如何將這些南方之「物」放入可供理解的脈絡之中？

陸希聲〈北戶錄序〉即指出，《北戶錄》「非徒止於所聞見而已，又能連類引證，與奇書異說相參驗，真所謂博而且信者矣。」（頁 2128-2129）筆者已在前一節討論段公路如何通過自身見聞，乃至於親自考驗、實際操作，使「異物」落

⁴⁸王國維〈釋物〉：「古者為雜帛為物，蓋由物本雜色牛之名，後推之以名雜帛……由雜色牛之名，因之以名雜帛，更因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例矣。」清·王國維：《觀堂集林》（臺北：印文印書館，1956），卷 6，頁 75。

⁴⁹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90-96。

⁵⁰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年），頁 236-238。

實為可信的知識。而本章節將以陸希聲所云「連類引證」為思考進路，討論段公路如何再把「實物」，通過各式文獻的拉連，引入「異物」的知識體系，進而拓寬「博物」的疆界。

若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回返到「異物志」的系譜重新爬梳，以清楚《北戶錄》在其中的位置。異物志的書寫，可以說是在「博物」觀念下，發展而成的。在中國文獻史上，以《異物志》命名者，從東漢楊孚《異物志》，至唐人房千里《南方異物志》、佚名《嶺表異物志》等，計有二十二種，宋以後即少見。這些《異物志》已無全貌，而散輯於方志等歷史地理著作之中。⁵¹我們發現，這些《異物志》以「南方」為主的撰述，竟佔據極大比例。以時代來分，就有東漢楊孚《異物志》（又名《南裔異物志》）、三國吳人萬震《南州異物志》、朱應《扶南異物志》、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薛瑩《荊陽以南異物志》、孫暢《南中異物志》、《南方異物志》、《南中八郡異物志》等；而唐後則有孟瑄《嶺南異物志》、房千里《南方異物志》等。此外，唐人孟瑄《南海異事》、劉恂《嶺表錄異》、尉遲樞《南楚新聞》、段公路《北戶錄》，雖不直名「異物志」，實際上皆以「異」為視角，載錄南方的奇聞軼事。⁵²

異物志書寫的興起，與政治勢力的拓展有關。當帝國霸業建起，則其眼目所及的疆界，便擴及南越、西南夷及西域等遠方異域的山川地理、風俗物產。⁵³王晶波研究指出，歷代異物志的書寫，呈現了文學與知識性共生的現象。初期的異物志，較重視博物知識的展示與積累。而至六朝時期，發展出志怪的成分，到唐

⁵¹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S1期（2000年），頁178-184。

⁵²在早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叢書集成初編」中，編者即把楊孚《異物志》和段公路《北戶錄》並列，編在同一冊集子中。東漢·楊孚：《異物志（及其他一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12月）。

⁵³向達指出：「漢時南方漸與中國相通，殊異之物，多為中原所未有。覽者異之，遂有《異物志》一類書籍出現，與《山海經》、《博物志》相先後。」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567。

代異物志的事實與傳聞之知識基礎則相對淡薄，被華美詞藻與荒誕敘事取代。⁵⁴異物志雖帶有知識性的博物成分，卻始終與志怪錄異脫不了關係；知識性與文學性、幻想性，往往難以明確區分。這在其他博物學的著作，也有類似的狀況。從《山海經》夾帶著神話思維的紀載，乃至張華《博物志》，一連串的「異人」、「異俗」、「異產」、「異地」記述，所謂知識事實與文學想像之間，界線始終模糊。

異物志通過「異」之視角，串聯起書寫者所見的風土物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南方異物」的撰述，常互有重疊之處；並非作者獨佔的「發現」，而是對同一事物或現象的繼承與變造。通過相近的記述，一套「異物」的知識體系便逐漸形塑而成。舉例來說，在歷代《異物志》中，鳥類佔了很大的部分。從最早東漢楊孚的《異物志》，就有鷓鴣、木客鳥、苦鳥等紀載。而歷代的《異物志》中，有些鳥類被反覆述及，彷彿標上了「異物」的特殊記號。例如鸚鵡，在唐人顏師古注《漢書·本紀·武帝劉徹》，解釋南越的「能言鳥」時，即援引三國吳人萬震《南州異物志》：

萬震《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⁵⁵

而唐人房千里《南方異物志》亦有鸚鵡的描述，比對下發現文字極為相似，可說是奠基於《南州異物志》的書寫之上，而加以擴充的：

鸚鵡鳥有三種：一種青，大如烏白；一種白，大如鴟鴞；一種五色，大於青者。交州、巴南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出杜薄州。凡鳥四指，三向

⁵⁴參王晶波：〈從地理博物雜記到志怪傳奇——《異物志》的生成演變過程及其古小說的關係〉，《西北師大學報》34卷4期（1997年7月），頁60-64。

⁵⁵漢·班固著：《漢書》卷六，《武帝劉徹本紀》，中研院史語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王先謙漢書補注本，頁176。

後。此鳥兩向前，兩指向後，異於凡鳥也。行則以口啄地，然後足從之。⁵⁶



萬震與房千里，皆描寫了鸚鵡有三種顏色及其產地。然房千里補充了三類鳥的體積、行走的方式，及其指爪的樣態，更細節的說明，鸚鵡與「異於凡鳥」之處。房千里在萬震的基礎上，有了更進一步的補充。

另如「孔雀」，早在東漢楊孚《異物志》，就有相關的記載：

孔雀形體既大，細頸隆背似鳳凰，自背及尾皆作員文。五色相繞，如帶千錢，文長二三尺，頭戴三毛長寸以為冠。足有距。栖遊岡陵，迎晨則鳴相和。⁵⁷

又云「孔雀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斑文采。捕得畜之，拍手則舞。」從這些記述裡，已提供了「孔雀」作為「異物」的幾項特徵，如外觀、習性，尤其是羽毛的文采，更被特別強調。而在唐人孟瑄、房千里、劉恂的南方「異物」記述中，也皆有出現。就成書年分先後，試錄於下，以便觀察比較：

孟瑄《嶺南異物志》：

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為脯臘。人又養其雛以為媒，傍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為芳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耳。⁵⁸

⁵⁶唐·房千里：《南方異物志》，見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2冊，頁1004。

⁵⁷東漢·楊孚著：《異物志（及其他一種）》，頁5。

⁵⁸唐·孟瑄《嶺南異物志》，見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二冊，頁1134。



房千里《南方異物志》：

孔雀，交趾、雷、羅諸州甚多，生高山喬木之上，大如雁，高三四尺，不減於鶴。細頸隆背，頭栽三毛，長寸許。數十群飛，棲遊崗陵，晨則鳴聲相和，其聲曰『都護』。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三年尾尚小，五年乃長二三尺。夏則脫毛，至春復生。自背至尾有圖文五色，金翠相繞如錢。自愛其尾，山棲必先擇置尾之地。雨則尾重，不能高飛。南人因往捕之，或暗伺其過，生斷其尾，以為方物。若回顧則金翠頓減矣。山人養其雛為媒，或探其卵，雞伏出之，飼以豬腸生菜之屬。聞人拍手則舞。其性妒，見采服者必啄之。⁵⁹

段公路《北戶錄·孔雀媒》：

雷、羅數州，收孔雀雛，養之，使極馴擾。致於山野間，以物絆足，傍施網羅，伺野孔雀至，即倒網掩之，舉無遺者。或生折翠羽，以珠毛編為簾子、拂子之屬，粲然可觀，真神禽也。一說孔雀不必匹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鶻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見《博物志》。又《周書》曰：「成王時，方人獻孔鳥。」方亦戎別名。《山海經》：南方孔鳥。郭璞註：孔雀也。《宋紀》曰：「孝武大明五年，有郡獻白孔雀為瑞者。」噫！象以齒而焚，麝因香而死，今孔雀亦以羽毛為累，得不悲夫。（頁 2130-2131）

劉恂《嶺表錄異》：

⁵⁹唐·房千里《南方異物志》，見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二冊，1104-1105。



交趾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為脯腊。人又養其雛以
媒，旁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
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為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耳。孔雀
翠尾，自累其身。比夫雄雞自斷其尾，無所稱焉。⁶⁰

比較之後，我們會發現對於孔雀的紀載，雖有繁疏，然多凸顯幾個相近的特徵。
如養「孔雀雛」為餌的「孔雀媒」，以及羽翼的「金翠之色」皆被述及。而孟瑄
《嶺南異物志》與劉恂《嶺表錄異》，文字幾乎一致，惟劉恂補綴帶有訓誡意味
的「孔雀翠尾，自累其身，比夫雄雞自斷其尾，無所稱焉」。而此句則與段公路
《北戶錄》中，〈孔雀媒〉的文意相似：「噫！象以齒而焚，麝因香而死，今孔雀
亦以羽毛為累，得不悲夫」。⁶¹

此外，房千里《南方異物志》對孔雀的描寫，顯然承繼楊孚《異物志》的紀
載。從敘事元素來看，包括「大如雁」、「細頸隆背，頭栽三毛，長寸許。數十群
飛，棲遊崗陵」、「聞人拍手則舞」，都與楊孚之書並無二致。綜觀這些南方的風
土筆記，除了孔雀以外，另如「荊桐花」、「朱槿」、「檳榔」、「犀牛」等異物，乃
至於「縛婦為妻」等異俗，都在南方異物的書寫中，屢屢出現。南方風物的知識
體系，遂在這一套「異」的相似視角中反覆形塑，逐步建構起來。

而回到段公路的《北戶錄》，其描述孔雀的方式，顯然與其他的「異物志」
有所不同。《北戶錄》也論及「孔雀媒」的南人風俗，卻多援引了《博物志》「雄
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周書》：「成王時，方人獻孔鳥。」、《山海經》「南方

⁶⁰唐·劉恂《嶺表錄異》，見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4冊，頁2617。

⁶¹在劉恂《嶺表錄異》裡，多有援引《北戶錄》的文句，甚至標明出自該書。如卷下「海蝦」一則，即引《北戶錄》云「滕脩為廣州刺史，有客語脩曰：『蝦鬚有一丈者，堪為拄杖。』脩不知信，客去東海，取鬚四尺以示，脩方服其異。」可見劉恂撰寫《嶺表錄異》時，實有參考《北戶錄》的記載。

孔鳥」及郭璞注、《宋紀》「孝武大明五年，有郡獻白孔雀為瑞者」等紀載，豐富了孔雀的意象。這些引述，環繞著其所描述的「實物」，而通過歷史文獻的連結，使南方的「孔雀」，被納入一連串關乎「孔雀」的記憶之中。換言之，這裡的「孔雀」便不只是其所親聞、只存在於一時一地的孔雀；而是可以讓人們普遍理解，古往今來都曾存在的「孔雀」。

在《北戶錄》裡，幾乎每一則風物的記載，都引述了文獻經典或歷史典故，用以說明、佐證或補充其所親聞之風物。根據統計，《北戶錄》中引甲部經類十六種，凡二十八次；引乙部史錄典籍三十一種，凡六十二次；引丙部子錄書二十五種，凡五十二次；引丁部集錄文十一種，凡十二次。由此可知，《北戶錄》不僅參考博物著作，也引述醫書、藥書，甚至是道經佛書等宗教性著作，⁶²使其親眼所見的「南方」，既有現地的實察，更有龐大的文獻資料與典故引證。

《北戶錄》大量的引經據典，並不只是中晚唐文人追異獵奇或炫學的心態，亦關乎段公路特殊的博物家學背景。而更重要的是，那讓我們看見了一套如何理解「南方」，甚至安置「南方」的知識體系。來自北方的文人，必須形塑一套他們所熟習的理解框架，來理解「異地」風物。段公路筆下的「北戶」，遂不只是實在的南方地景，更是字詞符碼聯繫而成的記憶圖像。其描繪的方式，是先將其所目睹的異物異事引介出來，再通過「按」字、「憶」字等，牽引出傳統文獻，例如：〈變柑〉：「愚按《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江浦之橘，箕山之東，清馬之所有櫨橘焉。」(2153)〈橄欖子〉：「愚按《南越志》：博羅縣有合成樹，樹去地二丈，為三衢：東向一衢為木威；南向一衢為橄欖；西向一衢為玉文。」(2154)又或者，以「憶」字如：〈鵝毛被〉：「愚憶《會要》載女國毛裘，都播國緝鳥羽以為服；《洞冥記》云：『董謁聚鳥獸毛寢；《家訓》云：朱詹饑即吞紙，寒即抱犬讀書，亦事較著者也。』」(頁 2141)、〈山橘子〉：「愚憶沈瑩《臨海異物志》曰：『雞橘子如指頭大，味甘，永寧界中有之。』」(2154) 通過「按」字、「憶」

⁶²統計可見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頁 315-324。

字，將此時此地的「南方」的異事異物，拉連了整個知識的網絡，不只拓展了原來的博物學知識，也注釋了眼前所見的南方。

而除了徵引傳統文獻，《北戶錄》有時也直接會取用歷史的傳說或典故。例如〈雞毛筆〉載錄的：

番禺諸郡如隴右，多以青羊毫為筆。昭州擇鷄毛為筆，其三覆鋒，亦有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字者。昔溪源有鴨毛筆，以山鷄毛、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徵其事，得非入江淹夢中者乎？（頁 2142）

《北戶錄》記述南方諸地造筆毛的素材，而寫及「昔溪源有鴨毛筆，以山鷄毛、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讓段公路聯想到江淹的「五彩筆」典故。這個典故，自然是《南史·江淹傳》裡，郭璞向江淹取回「五彩筆」，使之「江郎才盡」的故事。段公路在此引用，並不只是科學實證的精神，要指稱鴨毛筆就是傳說中的五彩筆，而更帶著一種連類引證的文學趣味。也就是說，所謂的「注釋」南方，不只是一套知識體系的拉引，亦透顯著書寫者段公路個人的情趣與想像。

第五節、餘論

本章以段公路的《北戶錄》為研究對象，通過「注視」與「注釋」兩個詞，討論南方地記的作者如何將「經驗」轉化為「知識」，並從中檢視唐人書寫「南方」的一種面向。筆者認為，《北戶錄》的異物書寫，並不只是如實的「呈現」，更是「再現」；進一步說，其涉及的不只是呈現了哪一些風物，更關乎這些「物」如何被描述，以及如何放置在人們的知識框架之中。而若落實到《北戶錄》，乃至於整個傳統博物學的脈絡下，則我們可以把提問聚焦為：段公路如何將個人的見聞「經驗」，轉化為可供理解的普遍的「知識」，進而以「北戶」風物拓寬博物學的範疇？

本章首先從段氏的「家學」與「南遊」，從外圍脈絡初步引介《北戶錄》的成書淵源。家學方面，本文認為段公路的祖父段文昌，與父執輩的段成式的文學、博物著述與南方經驗，都給予《北戶錄》可能的養分。並在與段成式《西陽雜俎·境異》篇的比較後，指出《北戶錄》及南方風物筆記中，一套關乎「異」的知識框架。而在段公路「南遊」的部分，公路通過自我的強調，使自身成為此書的見證者；並通過行蹤的標註，使《北戶錄》不只是靜態的博物陳設，更是動態的行走、觀看與感受。

其後，筆者聚焦《北戶錄》的書寫，分別從「注視南方」與「注釋南方」著手。在「注視南方」中，本文認為《北戶錄》的書寫手法，是以「實筆」錄「異事」。段公路通過親身經驗，撰述「在南方」的所見所聞。不只比對傳聞的真假，也通過實際的觸碰、採集、豢養等等，證實這些異事的存在，或者修正、補充前人的說法。然這樣的「實證精神」，也並非全然的排除神怪異說，更匯入了一定程度的浪漫想像。而在「注釋南方」裡，本章爬梳了「異物志」的發展，指出這些「異物」的撰述，常有重疊之處——也就是說，所謂「異物」並非作者獨佔的「發現」，而是對同一事物或現象的繼承與變造。通過反覆的記述，一套「異物」的知識體系逐漸形塑而成。而通過「異物」系譜的梳理與比較，本章指出《北戶

錄》與其他異物志的差別，在於對文獻典籍與歷史典故的大量運用，使段公路筆下的「北戶」，不只是實在的南方地景，更是字詞符碼聯繫而成的記憶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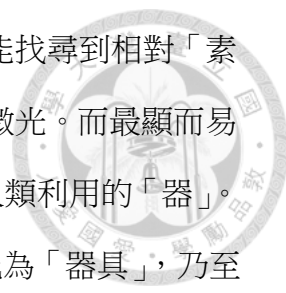
章節的最後，筆者想要試圖提出一則餘論，來思考《北戶錄》為何要大量引述典故文獻，及其與其他「異物志」顯著差別的原因。《北戶錄》作為一異物志、博物學式的著作，且段公路並未留下隻字片語的撰作動機說明，實在很難從中讀出什麼更深沉的寄託。然而，我們或許可以在《北戶錄》本身，找到一些線索。在〈鵝毛被〉中，段公路寫道：

邕之南有酋豪，多熟鵝毛為被，如稻畦衲之，其溫軟不下綿絮也。按上古十紀，有合雒紀，教人穴處，自食鳥獸，衣其皮毛，豈遠夷尚敦古之遺風耶？愚憶《會要》載女國毛裘，都播國緝鳥羽以為服；《洞冥記》云：董謁聚鳥獸毛寢；《家訓》云：朱詹饑即吞紙，寒即抱犬讀書，亦事較著者也。⁶³

在這則篇章裡，段公路亦大量援用文獻材料。他為了說明邕南產的鵝毛被，而通過「憶」字，拉引了《會要》中都播國民「緝鳥羽為服」、《洞冥記》「董謁聚鳥獸毛以寢其上」⁶⁴、《顏氏家訓》「義陽朱詹吞紙、抱犬讀書」⁶⁵等文獻典故。從第一個層次來看，段公路引述這些文獻要談的是，即使在蠻荒之地、困乏之境，也能取用最有限的資源保暖，維護身體機能。然若進一步結合段公路「豈遠夷尚敦

⁶⁴東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編荊為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東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98。

⁶⁵北齊·介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為孝元所禮。」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頁209。



古之遺風耶」的反問，其實就在說明，蠻荒困乏之境，人們也能找尋到相對「素樸」的文明。也就是說，即使是野蠻之處，也可以發現文明的微光。而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將「物」通過人的智慧與技巧，製作、轉化為可供人類利用的「器」。藉此來看，《北戶錄》不只書寫異物，更重視「異物」如何轉化為「器具」，乃至於引經據典去勾勒這幅被命名為「北戶」的南方圖像。此或許就是段公路在蠻荒之地書寫文明，為了闡發那幽微的光亮所做的努力吧。

第三章、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 《蠻書》中的西南敘事



第一節、前言

樊綽《蠻書》十卷，是唐人著述南詔史地專著中，唯一完整留存於世者。¹此書記載雲南地區的道路，城鎮，風俗，物產，史料頗為豐富，更成為宋代史家撰寫南蠻傳時的重要根據。²前行研究方面，近代學者對《蠻書》所負載的南詔史、民族史、交通史考察，已有一定成果；³而輯佚考據工作，也有為數頗眾的校注本。⁴然而，對於《蠻書》更進一步的文化詮釋與研究，至今仍然匱乏。近日，胡曉真出版《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是少見以文學方法探索「中國西南」地域的學術專書。⁵胡曉真指出，「中國西南」是人類學、歷史學的經典題目，卻是文學研究的新課題。她認為，這並非文本匱乏或議題薄弱，而是我們往往受限於習而未察的中心觀點。胡曉真以「西南敘事」為題，而不選擇相對自明的「西南書寫」，正要強調不同文本呈現西南時所蘊含的高度敘事性，亦即觀點、記憶與

¹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雲南志》條，頁153。

²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舊唐書·南詔傳》、《新唐書·南蠻傳》條，頁65-77。

³可參唐·樊綽著，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前言》（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6。李銀兵、黃治國：《〈蠻書〉及其史料價值》，《大理學院學報》7卷3期（2008年3月），頁1-4。就唐代南詔史的研究來說，關於南詔的王室族屬、社會性質、政治史、民族學探討，都已有豐碩成果。見趙鴻章：〈南詔研究述略〉，氏輯著：《南詔編年史稿》（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序言頁1-14。另如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論述入滇通道時，亦大量援引《蠻書》的交通旅程記載。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頁1179-1333。

⁴例如唐·樊綽著，向達《蠻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趙呂甫《雲南志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木芹《雲南志補注》等。

⁵所謂「西南」，引王德威的說法，即泛指滇、黔、湘、桂交會處，並旁及川、藏一代。此區域「相對於中原，一向被視為蠻夷之鄉」。王德威序文：〈寫在華夏邊緣〉，見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頁xvii。

構造。此間涉及的不只是「邊緣」與「中央」的辯證張力，更牽涉著時代、地理、政策、性別等外部脈絡的思考。⁶

胡曉真對於西南敘事的討論，僅限於明清時代，因此本文聚焦於唐人的《蠻書》，一方面是希望補充前輩學者的研究，並藉此與歷代的「西南」敘事有所銜接對話。另一方面，則回應到筆者自身關心的兩個課題：首先，唐人如何理解比「南方」更邊緣偏遠的「西南」風土？⁷如何站立在「華夏邊緣」，⁸掌握甚至形塑這群勢力大起的「化外人」圖像？⁹其次，我們該如何從看似紀實，且帶有官方色彩的地記著作，抉發作者的敘事策略與用心，並掌握其時代意義？

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 862 年）二月，樊綽為安南經略使蔡襲的幕僚，隨之進入安南。彼時南詔世隆嗣立，正進攻唐朝的播州（今貴州遵義）、邕州（今廣西）、雋州（今四川越嶲一帶）等地區；自咸通元年至四年（公元 860-863 年），共三次進攻安南。咸通四年（公元 863 年）二月，南詔攻陷交趾，蔡襲全家和隨從等七十餘人，於城陷之時戰死，樊綽長男樊韜及其家屬奴婢十四人亦陷沒。樊綽帶著印信，逃渡富良江而出。向達根據《蠻書》的記載，判斷樊綽可能先逃到

⁶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頁 1-33。

⁷早期日本學者桑原隲藏討論「中國有南北之別」時，即以淮水、漢水為界，從政治情勢、戰爭流動、經濟規模等角度，去切分出「南中國」和「北中國」。然而，他又指出：「上述各省之外，尚有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四省，我想暫時把它們置於南北中國之外」。換言之，「西南」竟成了南北中國之「外」、被排除、更邊緣異質的地域。見桑原隲藏著，黃約瑟譯：〈歷史上所見的南北中國〉，收錄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19-69。

⁸本文「華夏邊緣」論述取自於王明珂先生的研究。王氏指出，在一個族群的中心，往往不用特別強調自身的特性；然而在族群與他族的邊緣，文化的疆界上，各族群的特徵反而會被凸顯。參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頁 61-94。主要參見第三章〈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

⁹甘懷真從《唐律·名例律》的「化外人」條目，爬梳唐代的國籍制度。其指出，「化外人」因不受中國天子統治，故無教化之可能，而為「蠻夷」一類。換句話說，在此概念下，中國（郡縣）區域內部，並沒有「化外人」的可能。相關討論見甘懷真：〈從《唐律》化外人規定看唐代國籍制度〉，《早期中國史研究》三卷二期（2011 年 12 月），頁 1-32。

海門，再由海門歸國。咸通五年（公元 864 年）六月，樊綽授夔州都督府長史。¹⁰《蠻書》蒐集、彙整資料的時間，應在咸通三年至咸通四年的一年之間，而「附錄」之文，則在咸通五年之後才補入。¹¹也就是說，全書在編撰之時，南詔的騷動與叛變已然形成；而全書真正的完成，是在交趾城破以後。也就是說，閱讀《蠻書》時，不能只是將其視為南詔史料的背景文獻，更該考量異族勢力大起的時代背景，並審視作為「劫餘倖存者」的樊綽的書寫意志，乃至於敘事策略。¹²

於卷首的《蠻書·雲南界內旅途第一》中，樊綽如此寫道：

南蠻因姚州之後，屬蠻管係。從邕州路至蠻苴咩城，從黔州路至蠻苴咩城，兩地途程，臣未諳委。伏乞下堂帖令分析。緣南蠻姦猾，攻劫在心，田桑之餘，便習鬪敵。若不四面征戰，凶惡難悛。所以錄其城鎮川原，塵瀆宸宸。或冀破其蟻聚之眾，永清羌虜之夷。臣披瀝懇忱，無任隕越之至。（頁 18）¹³

¹⁰唐·樊綽著，向達校注：《蠻書校注》，頁 1-2。

¹¹方國瑜：〈有關南詔史史料的幾個問題〉，收錄於《方國瑜文集（第二輯）》（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372。

¹²筆者曾於臺大中文研究所發表會，宣讀此章節的初稿。後獲匿名評審意見，指出本文以「劫於書寫」指稱《蠻書》之誤，其說法如下：「按作者自言，所謂『劫餘書寫』是『城市覆滅的災難以後，對於『已然失去』的故地的回眸與記憶』，但樊綽『已然失去的故地』應為交趾而非南詔。」或許是行文造成的誤解，筆者必須於此澄清。本文所說的「故地」，絕非只是政治意義上的「故地」，而是基於華夏人士記憶裡或文化中的「故地」。固然南詔已自立為國，早非唐朝「故地」；然而在樊綽的描述中，屢屢召喚「漢族南征」的歷史記憶（如諸葛亮、馬援），使彼蠻夷之地仍帶有故有的帝國想像，彷彿南詔（或該還原為「雲南」）仍屬唐朝所有。因此，本文所云「劫餘」，欲闡明的是其中弔詭而複雜的心理。交趾的破毀，意味著的不只是城市的覆滅，更是唐代對於西南地區掌握的全面失守。於此意義上，「劫餘」便不只是政權的喪失，更意味著文化上的終結與離散。

¹³本文所引《蠻書》段落，以向達：《蠻書校注》為底本，並參校木芹《雲南志補注》、趙呂甫《雲南志校釋》。下引《蠻書》僅標示頁碼，不再贅注。

這段話，可以視為樊綽《蠻書》作意之表達。考察唐朝治理西南的歷史，可知姚州對唐朝而言，是統攝諸蠻的前哨站，從立朝之時便銳意管理。¹⁴而樊綽指出，南詔統領姚州以後，「從邕州路至蠻苴咩城」以及「從黔州路至蠻苴咩城」的兩條道路旅程，已不為唐人所熟悉。彼時南詔勢力大起，而朝廷持續積弱，岌岌可危的政治處境，使樊綽「伏乞下堂帖令分析」，並發下「錄其城鎮川原，塵瀆宸辰」的宏願。也就是說，《蠻書》之所以「錄其城鎮川原」，並不只是單純的呈現地方的山川城鎮，更重要的，是帶著「破其蟻聚之眾，永清羌虜之夷」的政治用心與戰略意圖。

緣此，筆者將以「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為思考進路，探討《蠻書》中的西南敘事。本文先從《蠻書》的書名爭議談起，爬梳「蠻」字的文化意涵，並指出其帶有的戰爭隱喻。筆者將檢視樊綽如何承繼「南蠻」的既有框架，建立一套觀看西南地區的視域。接著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勘《蠻書》的風物知識，如何以唐人自身為參照，羅列異物、異俗、異人、異族，進而形塑一方「異域／邊城」。最後，筆者將探討《蠻書》如何通過對「馬援銅柱」、「諸葛石碑」與「異牟尋誓文」等歷史文獻或紀念碑的挪用與再製，試圖復返、召喚過往的帝國榮光。

《蠻書》成書的時刻，唐朝國力已然衰頹，而南詔勢力大起；樊綽之筆看似紀錄「此時此地」的雲南，其實早已是文獻中的故地，記憶裡的失土。本文欲強調《蠻書》中透顯的「知識」與「想像」的辯證張力，乃至於「事實」與「虛構」的複雜糾纏。本文將考察所謂地理方志如何含攝作者的寄託，並回應到一個更大的主題：唐人如何理解、詮釋，乃至於形塑彼時的「西南」。

¹⁴見唐·樊綽著·趙呂甫校釋：《雲南志校釋》，頁 29-31。

第二節、戰爭與「蠻」的命名：從《蠻書》的書名爭議談起

由於樊綽並未標誌《蠻書》之名，而此作又傳鈔甚廣，抄錄者各憑己意，使此書在歷代流傳時派生了眾多書名，例如《雲南志》、《雲南記》、《雲南史紀》、《蠻書》、《南蠻記》、《南蠻志》、《南夷志》等多種。¹⁵《四庫提要》參考《新唐書·藝文志》、司馬光《通鑑考異》等眾家說法，採取《蠻書》之名：

《蠻書》十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今考司馬光《通鑑考異》、程大昌《禹貢圖》、蔡沈《書集傳》所引《蠻書》之文，並與是編相同，則《新唐書·志》為可信。題曰《蠻書》，從其朔也。¹⁶

今人向達的《蠻書校注》也遵循《四庫》的說法，以《蠻書》為名。¹⁷此外，向達又於卷首案語，引樊綽《蠻書》卷十自語「《蠻志》」，指稱《蠻書》之名可信。

18

亦有學者站在相反的立場，不同意《蠻書》之說，最主要的代表意見即雲南史學者方國瑜。方氏認為《蠻書》應復名《雲南志》，其理由有三。其一，樊綽

¹⁵方國瑜的說法：「此書名稱繁夥，乃由於世人重視傳鈔流行，各以意題書名，至無專稱。」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雲南志》條，頁155。

¹⁶見清·紀昀等著：《四庫總目提要》卷六十六，史部二十二。

¹⁷唐·樊綽著向達《蠻書校注》，頁3。同樣採用《蠻書》之名的，還有今人馮良方編著：《雲南古代漢文學文獻》（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69-270、王叔武輯著：《雲南古佚書鈔》（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8年）等，頁2。

¹⁸樊綽《蠻書》卷十原句：「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諸大首領。詳錄於此，為《蠻志》一十卷事，庶知南蠻首末之序。」見向達《蠻書校注》，頁18。事實上，《蠻書》卷十名為「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載錄的應該是南詔以外接壤的邦族。故此處寫南詔之事，應為外於《蠻書》的附錄資料。趙呂甫即認為：這一些資料是「樊綽在夔州長史任內時始搜得的。唐史館陸續收到這兩批文獻以後，就匯集並黏附於全書卷末，這就是第十卷內容特別駁雜臃腫，而與其他各卷編撰體例不一致的基本原因。」唐·樊綽著，趙呂甫校釋：《雲南志校釋》，頁3。

書中雖稱南詔為蠻或南蠻，然稱地名多曰雲南。如〈雲南界內途程第一〉、〈雲南城鎮第六〉、〈雲南管內物產第七〉，篇名已稱雲南。其二，既為地志之作，不宜稱為《蠻書》。且「蠻」為通稱，其意廣泛。其三，此書從宋代以來的藏書家著錄，皆稱《雲南志》，宋以後亦不稱《蠻書》，故四庫提要之說不可從。¹⁹此外，他也反駁樊綽自語《蠻志》之說，指出向達誤解之處。²⁰據方國瑜的說法，方氏曾就書名問題，與向達討論；然向氏並未採用，甚至認為方氏「以學術問題涉及政治問題」。²¹

追根究柢，樊綽並未為此書定名，書名的爭議永遠不會有正解。筆者並不意圖強下定論，然我們或可從向達與方國瑜的兩派爭論的基礎上，審視學者對此書的定位，並指出樊書介於《雲南志》與《蠻書》的雙重特質。方國瑜採《雲南志》而不從《蠻書》，固有其出身雲南的地緣考量，然就學術來看，實是將樊書看作「地志」之作，重視其科學的實錄精神。²²而向達以《蠻書》為名，顯然不只視樊書為一部的「地志」紀錄，更指出樊綽的訛誤之處，以及以唐人為本位的「偏見」，要求讀者以「批判」的角度來審視《蠻書》。²³就此而言，向達以《蠻書》為名，便不只指涉此書地志文本的實錄性，更批判性的點出作者的為文之意，標舉「蠻」字，即透顯出樊綽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並帶有濃厚民族偏見等等。²⁴換

¹⁹方國瑜：《〈雲南志〉概說》，收錄於唐·樊綽著，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頁4。

²⁰方國瑜指出：「此處『一十卷事』，文意難解，疑當做『為《蠻志》一十事』，庶知南蠻首末之序，後傳抄者誤增『卷』字，至不可讀。此十事附於十卷之後，所謂《蠻志》十事，僅限於在夔州所作。向達《唐代紀載南詔諸書考略》引樊綽此條說：『這一段文字，也許就是樊書的自序，錯簡在此』。所說非是。向達又以為『樊書自稱為《蠻志》』，亦非。樊書初纂成十卷，未命書名，以致後來名稱歧異，令人迷惑。所有名目，都未必為樊綽初名，而為後人所臆加者也。」方國瑜：《〈雲南志〉概說》，收錄於唐·樊綽著，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頁3。

²¹方國瑜：《〈雲南志〉概說》，收錄於唐·樊綽著，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頁11。

²²方國瑜：《〈雲南志〉概說》，收錄於唐·樊綽著，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頁3。

²³唐·樊綽著，向達校注：《蠻書校注》，頁11。

²⁴王德威指出，華人抵達異地，往往會以華與夷、番、蠻、鬼等命名，作為界定並鞏固自身種族、文明優越性的方式。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主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臺北：聯經

言之，「蠻」之命名與指涉，早已帶著華夷之辨，乃至於華夷建構的書寫用心。

審視歷代文獻，「蠻」字的出現甚早，在商代甲骨卜辭中已然有載。²⁵「蠻」字原意是養蠶取絲之人，絲長而衍生出綿長、綿遠、綿綿，甚至有讚美之意。故至春秋時，還有自稱「蠻氏」、「蠻子國」者。然在漢代以後，由於中央集權制度以及華夷之辨日益清晰，「蠻」字轉為貶義，用以指稱華夏邊陲，野蠻無序的民族。²⁶而在唐人的作品中，有不少即以「蠻」指稱西南蠻夷，詩作撮如白居易〈蠻子朝〉、徐凝〈蠻入西川後〉、崔致遠〈平蠻〉、高適〈李雲南征蠻詩并序〉等。以高適的〈李雲南征蠻詩并序〉為例，本詩原長十九聯，限於篇幅，節錄如下：

鼓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梯巘近高鳥，穿林經毒蟲。

鬼門無歸客，北戶多南風。蜂蠆隔萬里，雲雷隨九攻。²⁷

此詩作於天寶十二載夏，是高適頌揚雲南太守李宓征伐南詔之詩。近代學者已指出，此詩實是對少數民族的侵略，而遭強烈反抗。當時的右相楊國忠匿其敗狀，以獲勝奏聞，高適不明真相，故為錯誤的贊詞。²⁸在此詩中，我們可以發現一連串與「蠻」相關的用詞。諸如地理位置的高險偏荒（梯巘、九攻、北戶、隔萬里），生態環境的異怪（毒蟲、蜂蠆），其指涉的不只是蠻方的危險遼遠，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採取「征蠻」視角，已透顯出戰爭的時代因素。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頁6。

²⁵參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299。

²⁶關於「蠻」字由褒而貶的說法，及其字義的源流考察，參何光岳：《南蠻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8-12。呂春盛則從蠻族族屬的範疇變動，指出「蠻」字於秦漢時期就已專指長江中、上游異族的蠻人，其稱多混用「某某蠻夷」。直到南北朝，才直接以「某某蠻」稱呼。所謂「蠻」，是一個持續變動的概念，意味著漢人對於四周異族的認識，也隨著時代演變。見呂春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及其概念之演變〉，收錄於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06年），頁29-56

²⁷唐·高適著，劉開陽箋註：《高適詩集編年箋註》（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65。

²⁸唐·高適著，劉開陽箋註：《高適詩集編年箋註》，頁265。

而除了詩人之作，亦有張九齡〈敕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及諸酋首領書〉、牛叢〈責南詔蠻書〉等檄文傳世。值得注意的是，牛叢〈責南詔蠻書〉作於咸通十四年（西元 873 年），與《蠻書》成書時間相近，且亦是站在唐人為中心的立場，對南詔的侵略進行批判：

詔王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為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乃自絕王命，且雀蛇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²⁹

牛叢對詔王的批評，凸顯了唐人本位的思考模式。不入「太學」、不習「華風」，以至於不能「報德」，成為南詔人「不如蟲鳥」的關鍵因素。而與此同時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亦有相似的言論。乾符四年（西元 877 年），由於南詔持續作亂，僖宗有意與之和親。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對此進言：「蠻蓄鳥獸心，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尚貴主，失國家大體？」³⁰在牛叢以及崔安潛的言論中，「蠻」人與鳥獸被取來並列，甚至「不如蟲鳥」，將之視為「非人」的存在。事實上，將西南蠻族視為「非人」的看法，其實早在《永昌郡傳》這本晉人寫的雲南古代方志中，有所呈顯。其不僅描述雲南地區的蠻族「喜食人，以為至珍美」，更指出蠻人「雖有人形，禽獸其心；言語服飾，不與華同」的特點。³¹我們注意到此間的華夷區分：「蠻人」之所以非人，是因為不受教化。然而，若仔細考察牛叢和崔安潛的言論，以及其所處南詔勢力大起的時代背景，則可以指出，在他們的言論中，「蠻」之非人的指涉，實亦關涉著「戰爭」時期的敵我之別。³²

²⁹宋·宋祁等著：《新唐書·南蠻傳中》，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72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191 上。

³⁰宋·宋祁等著：《新唐書·南蠻傳中》，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72 冊，頁 192 下-193 上。

³¹晉·佚名：《永昌郡傳》，引自王叔武輯著：《雲南古佚書鈔》，頁 17。

³²誠如榮迪斯·巴特勒所指出的，在戰爭情境下，人們總會將敵我劃分清晰。敵方已不屬於與我

《蠻書·名類第四》中，載述唐天寶年間，雲南東部民族分布，可謂後世掌握南詔民族史最重要的文獻材料。其頻繁以「蠻」稱呼各個族裔，諸如獨錦蠻、弄棟蠻、青蛉蠻、河蠻、施蠻、順蠻、磨些蠻、撲子蠻、尋傳蠻、裸形蠻、望苴子蠻等。《蠻書》對於這些「蠻民」的記述，多呈顯出部落社會的原始樣貌。樊綽以身體特徵、服飾、食物、居住、治理制度等，描繪蠻族的特質，並以之作為不同蠻族的分野。這些西南蠻族，體現出相似的特點，幾乎可以視為「蠻」所牽連的詞彙：諸如身手矯健，驍勇善戰，乃至於生食野肉、無君長制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這裡對於蠻族的描述，幾乎都與「戰鬥」無法脫離關係。例如撲子蠻「勇悍矯捷」、「深林間射飛鼠，發無不中」、尋傳蠻「持弓挾矢射豪豬」、「每戰鬥，即以籠子籠頭，如兜鑿狀」、裸形蠻「盡日持弓」、「有外來侵暴者，則射之」等等，指出西南民族的多是好鬥善戰的群體。

與此相關的是，《蠻書》中也有不少對於「武器」的描述，這也是此書與一般異物志、博物志最大的不同之處。在「雲南管內物產」卷七中，除了一般物志常見的動物、植物、礦物的記載，更特別的是，有對於器物，尤其是武器的著錄，例如「鐸鞘」、「朱笥」、「郁刀」、「南詔劍」、「槍」、「箭」等。而這些武器，又多被描述為銳利、惡毒的，如朱笥「所指無不洞也」、郁刀「用毒藥、蟲、魚之類，又淬以白馬血，經十數年乃用。中人肌即死」等等。對於驍勇善戰的族裔，以及武器兇狠的強調，符合樊綽所標舉的「南蠻姦猾，攻劫在心，田桑之餘，便習鬪敵。若不四面征戰，凶惡難悛」之說，而此亦回應到了戰爭的時代背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蠻書·名類第四》中，樊綽洋洋灑灑列舉近三十餘種「蠻」，唯獨兩則記了「人」：

裳人，本漢人也。部落在鐵橋北，不知遷徙年月。**初襲漢服**，後稍參諸戎風俗，迄今但朝霞纏頭，其餘無異。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領兵攻破

同種的「人類」，而是殊別之「獸」，是必須仇視，乃至於無情殲滅的異類他者。美·茱迪斯·巴特勒著，何磊譯：《戰爭的框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88-89。

吐蕃鐵橋節度城，獲裳人數千戶，即移於雲南東北諸川。今鐵橋城為南蠻所據，差大將軍為城使。

(頁 92)

桃花人，本屬安南林西原七綰洞主大首領李由獨管轄，亦為境上戍卒，每年亦納賦稅。……切以桃花人今亦呼桃花蠻也，本安南林西原七綰洞左右側居，人披羊皮或披氈，前梳髻。雖拘於蠻，心皆向唐化。

(頁 108)

樊綽通過「本漢人」、「初襲漢服」的血緣成因，乃至於「為境上戍卒」、「每年亦納賦稅」的政治制度關係，透顯著蠻人與華人，並不是絕對的二元對立，而存在著「雖拘於蠻，心皆向唐化」的對話關係。陳寅恪曾指出，漢人與胡人的分別，自北朝起，文化便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者，即為漢人，胡化者則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³³由《蠻書》看來，是「人」是「蠻」，最大的分野，血統固然是考量的因素，然更重要的還是「唐化」與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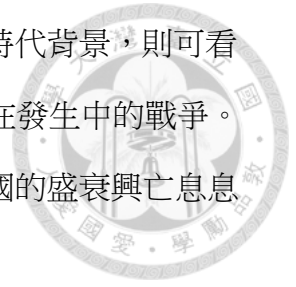
綜觀本章的討論，筆者爬梳「蠻」的意義，並指出其與「戰爭」的關係，並不只是要做字源學上的考證，而是希望提供一條閱讀《蠻書》的途徑。樊書中大量使用「蠻」字，實已透顯作者的政治立場與價值判斷。除了傳統的華夷區分，更指向唐朝積弱、南詔叛亂等政治因素與時代背景。筆者以《蠻書》指稱樊書，並非絕對否定方國瑜的《雲南志》之說，³⁴而更傾向從「蠻」的觀點，探析樊書如何以「蠻」為視角，建構一幅西南地方的異族圖像。《蠻書》描述的「蠻」的特質，不只再次鞏固了華夷的分界，更強調出這些「蠻人」具體存在於「蠻地」

³³陳寅恪：〈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200-201。

³⁴筆者大抵理解且贊同方國瑜的《雲南志》之說，然綜觀樊書，樊綽書寫的內容並不只限於雲南。例如卷十〈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名〉，即同時涉及了彌諾國、驃國、小婆羅門等東南亞的諸多小國，故單稱《雲南志》似乎並不完善。

的樣貌。而若將《蠻書》放回南詔起兵攻陷交趾、唐人失利的時代背景，則可看出《蠻書》中的「蠻」，不只是抽象意義上的文明之別，更是正在發生中的戰爭。

「蠻」是實際存在威脅，具有武力的民族，甚至與整個大唐帝國的盛衰興亡息息相關。



第三節、異物與邊城：《蠻書》中的風物知識形塑

《蠻書》的作者樊綽，並未親身到過雲南，此書的內容主要參考的是袁滋的《雲南行記》以及南詔史臣的檔案，編纂而成。³⁵換言之，《蠻書》提供的並不只是雲南地方的所見所聞、如實記載，而是經過作者有意識的挑選、節錄過往文獻，並藉此建構的雲南圖像。就這個角度來看，《蠻書》所書寫的「南詔」，就不只如官方為了統治需求而編撰的地理圖經，而更可能帶著作者的主觀用意，乃至於想像和虛構的成分。基於上述前提，本節將探析《蠻書》如何通過一連串關於「西南」邊陲的風土意象，去塑造彼座「邊城」的知識圖像。

《蠻書》在記載雲南風俗與物產時，常以漢人自身的文化與物產為參照。例如：

麗水城又出波羅蜜果，大者若漢城甜瓜，引蔓如蘿蔔，十一月十二月熟。皮如蓮房，子處割之，色微紅，似甜瓜，香可食。或云此即思難也，南蠻以此果為珍好。 《蠻書·雲南管內物產第七》，頁 193。

豬、羊、貓、犬、騾、驢、豹、兔、鵝、鴨，諸山及人家悉有之。但食之與中土稍異。蠻不待烹熟，皆半生而吃之。

《蠻書·雲南管內物產第七》，頁 204。

其蠻，丈夫一切披氈，其餘衣服略與漢同，唯頭囊特異耳。南詔以紅綾，其餘向下皆以皂綾絹。 《蠻書·風俗第八》，頁 207。

十一月一日盛會客，造酒醴，殺牛羊，親族鄰里，更相宴樂。三月內作

³⁵唐·樊綽著，向達校注：《蠻書校注》頁 8。

樂相慶，惟務追歡。戶外必設桃茱，如歲旦然。改年即用建寅之月。其餘節日，麤與漢同，唯不知有寒食清明耳。

《蠻書·風俗第八》，頁 211。



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棟下宇，悉與漢同，惟東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別置倉舍，有欄檻，腳高數丈，云避田鼠也，上閣如車蓋狀。

《蠻書·風俗第八》，頁 215。

《蠻書》中所記述的雲南風物，多以漢人既有的傳統知識為基準，而指出蠻人的衣飾、房屋、食物、節慶等的異同之處。例如畜養各種動物，卻「半生而吃之」；或者描述節慶「粗與漢同」，卻「不知有寒食清明耳」。通過與中土的比較和參照，將雲南地區的風物，納入了漢人容易理解、掌握的知識系統之中。

《蠻書》中對於風物的描寫雖然簡短，猶如知識性筆記，有時卻仍透顯著華夷有別的認知框架。舉例來說，《蠻書·雲南管內物產第七》中對於「織物」的記載，就頗值得一提：

蠻地無桑，悉養柘，蠶繞樹。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數頃，聳幹數丈。三月初，蠶已生，三月中，繭出。抽絲法稍異中土。精者為紡絲綾，亦織為錦及絹。其紡絲入朱紫以為上服。錦文頗有密致奇采，蠻及家口悉不許為衣服。其絹極粗，原細入色，制如衾被，庶賤男女計以披之。亦有刺繡，蠻王並清平官禮衣悉服錦繡，皆上綴波羅皮。俗不解織綾羅，自大和三年蠻賊寇西川，虜掠巧兒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織綾羅也。

《蠻書·雲南管內物產第七》，頁 173-174

樊綽開頭便記「蠻地無桑」，而改種「柘」。在《說文解字》中，許慎釋「柘」為

「桑也」，而《說文解字》則云：「山桑、柘桑皆桑之屬，古書并言二者，則曰『桑柘』。單言一者，則曰桑，曰柘。柘亦曰柘桑。」綜觀唐代文獻，唐人幾乎沒有明確分別「桑」與「柘」為兩種植物，而多將二者並稱，或者單獨言「桑」。撮舉如杜甫詩〈昔游〉「桑柘葉如雨，飛蠶共徘徊」、³⁶韓愈詩〈縣齋有懷〉「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等，³⁷乃至於杜佑《通典》，都是言「桑」或「桑柘」。³⁸《蠻書》特別標舉出「蠻地無桑，悉養柘」，將桑、柘區分開來，一方面可以說樊書實事求是，發揮了地志的科學精神；然另一方面，樊綽也通過「無桑（而有柘）」的記載，刻意區分出「蠻地」與「中原」的差別之處。

樊綽除了描述抽絲法「稍異中土」，緊接著又記載：「俗不解織綾羅，自大和三年蠻賊寇西川，虜掠巧兒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織綾羅也。」《新唐書·南蠻傳》中，對大和三年之事有更詳細的記載：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時大和三年也。嵯巔乃悉眾掩邛、戎、嵩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嵯巔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眾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³⁹

對唐人而言，「大和三年」嵯巔率軍侵略西南領地的事件，是一起戰爭失利的慘痛記憶。由於西川節度使的失能，以致大片領土喪失，甚至大量平民百姓喪生或

³⁶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詮》（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701。

³⁷唐·韓愈著，《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74-175。

³⁸唐·杜佑《通典》：「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唐·杜佑《通典》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288。

³⁹宋·宋祁等著：宋祁等著：《新唐書·南蠻傳中》，清·紀昀等編撰：《文津閣四庫全書》第272冊，頁186上-186下。

淪為異族統治。《蠻書》特意擷取了「虜掠巧兒及女工」，以織物技術的轉移，帶出了戰爭的背景。蠻人從「俗不解織綾羅」到「如今悉解織綾羅」，不只是縫織技術的演進，亦是領土邊界的移動，乃至於透顯出唐人與蠻人的戰爭情境與政治勢力消長。

在《蠻書》中對於雲南地形與城邑的描述，也構成了認知雲南地區重要的知識內容。除了「雲南界內途程第一」、「山川江源第二」、「六詔第三」、「六賧第五」、「雲南城鎮第六」等，約有一半的篇幅，就是針對地理的書寫。其中包括路途遠近、自然景觀、城市型態等，都有豐富的記載。樊綽描述險惡的地理，屢屢指出其「地有瘴毒」，來勾勒行旅西南的風險。例如：「管摩零都督城在山上，自尋傳、祁鮮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木不枯，日從草際沒」、「大雪山在永呂西北，從騰充過寶山城，又過金寶城以北大賧，周迴百餘里，悉皆野蠻，無君長也。地有瘴毒，河賧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等。事實上，早在晉人魏完的《南中八郡志》中，對於雲南地區就屢有「瘴毒」的記載：「有不津江，江有瘴氣」、「有禁水，水有惡毒氣」、「縣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瘴氣」，⁴⁰是一片「飛鳥過之，不能得去」⁴¹之處。學者張軻風已指出，兩漢時期對於南方疾病的描述多以「濕」、「毒」為主，而六朝以後，「障氣」或「瘴氣」便成為對於環境疾病的一種固定表述。三國至劉宋期間，文獻頻頻出現「障氣」的說法，而東漢鄭玄注《周禮·地官》中的「地慝」時即云：「地慝，若障、盎然也。」又云：「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也就說，對古人而言，「瘴」同時是「障」（甚至是「嶂」），意味著地理交通的阻隔，也凸顯出「水土不服」、「絕域」等身心因素與邊疆色彩。⁴²而于賡哲則從社會史的角度，爬梳了「卑濕」、

⁴⁰晉·魏完《南中八郡志》，引自王叔武輯著：《雲南古佚書鈔》，頁9-11。另在晉人佚名之作《永昌郡傳》，也有「江有毒瘴」的說法。

⁴¹晉·魏完《南中八郡志》，引自王叔武輯著：《雲南古佚書鈔》，頁8。

⁴²張軻風：〈從「瘴」到「障」：「瘴氣」說生成的地理空間基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4卷2期（2009年4月），頁135-143

「瘴毒」、「野蠻」等觀念，如何在以北方人為主的文化中建構，進而成為理解「南方」，帶有優劣之別的知識框架。他指出，這些問題不能只是單純視作自然地理，更要考慮不同文化圈帶來的觀念衝突。⁴³

除了通過「地有瘴毒」來呈現，樊綽也常常連結「異物」，來形塑雲南的怪異險惡。例如《蠻書·雲南界內途程第一》中，對於「石門」的記述：

石門東崖石壁，直上萬仞，下臨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數百尺，惟聞水聲，人不可到。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閣路，橫闊一步，斜亘三十餘里，半壁架空，欹危虛險。其安梁石孔，即隋朝所鑿也。閣外至夔嶺七日程，直經朱提江，下上躋攀，偃身側足。又有黃蠅、飛蛭、毒蛇、短狐、沙虱之類。 (頁 19)

這一段的描寫，凸顯出石門地形的險峻。樊綽不僅強調「直上萬仞」、「橫闊一步，斜亘三十餘里」的險峻地勢，也特別描述這些險惡地形所產出的「異物」。若進一步觀察彼些「異物」，可以發現「黃蠅」、「飛蛭」、「毒蛇」、「短狐」、「沙虱」等都是毒物。早在晉人張華《博物志》中，就把「射工」（即短狐）與「沙虱」並放在一起，指出：

深山窮谷，多毒虐之物。氣則有瘴癘，人則有工蟲，獸則有虎，鳥則有鳩，蛇則有蝮，蟲則有射工、沙虱，草則有鉤吻野葛，其餘則蛟蟒之屬生也。⁴⁴

而在《魏書》中，亦將射工、沙虱、蛇虺同列，並指明位處於巴、蜀、蠻、僚、

⁴³于賡哲：《唐代疾病、醫療史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 217-232。請參考第十一章〈疾病、卑濕與中古族群邊界〉。

⁴⁴晉·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 133。

楚、越等邊陲地帶，並帶出了這些地區「機巧趨利，恩義寡薄」的道德判准：

巴、蜀、蠻、獠、溪、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鱉，嗜欲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陸種，以罟網為業。機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饑寒，地既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虱、蛇虺之害，無所不有

⁴⁵。

而宋人編纂的類書《太平御覽》，「蟲豸部七」一門類，亦將「水蛭」、「短狐」、「沙虱」被並放為一類。⁴⁶由《博物志》、《魏書》、《蠻書》，再到後代《太平類纂》這樣的大部類書，我們發現人們對於毒物的記述，往往是成套的，意味著「蠻荒之地的生物」。換言之，《蠻書》中的風物，一方面固然是對物種的博物學記述，然而另一方面，卻也鞏固著「蠻」之為「蠻」的知識體系。

若更進一步考察這些「毒物」，更可指出其中蘊含著人們對於偏荒地區的特定想像。以「短狐」為例，在干寶《搜神記》中的〈江中蜮〉即有提及：

漢光武中，平中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詩》所謂「為鬼為蜮，則不可測」也。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為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為主，亂氣所生也⁴⁷

⁴⁵北齊·魏收：《魏書·司馬叡傳》，錄於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62冊，頁376上。

⁴⁶宋·李昉：《太平御覽·蟲豸部七》錄於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01冊，頁442下-449上。

⁴⁷晉·干寶：《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90。

而唐人歐陽詢的《藝文類聚·災異部·蠹》亦有收錄：



《洪範·五行傳》曰：「蠹，射人者也。」生於南越地。南方謂之「短狐」者也。《毛詩》曰：「為鬼為蠹，則不可得。」其物不可見，蓋氣精也。南越夷狄淫佚處也。其蠹生水澤，地多婦人，其淫色為主，故南越多蠹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故聖人名之曰蠹。蠹者猶惑也⁴⁸。

在《搜神記》這樣的志怪小說中，干寶除了載述「短狐」的劇毒，還記載了「以方術抑制」、「得沙石於肉中」以及「淫女亂氣」等獵奇尚異的細節。而在《藝文類聚》中，則保留「淫女亂氣」之說，並強調了「聖人」名「蠹」猶「惑」的禮教意涵。這兩則文獻，指出了「短狐」與地方環境的關係。首先，此固可追溯到《周官·考工記》的「地氣」之說，即水澤、南越的地理環境，產生了有具地域特性的物種。⁴⁹而唐人對西南地區的理解，亦一定程度承繼這樣的觀點，例如許棠的〈送徐侍卿充南詔判官〉，就有「地偏風自雜」的詩句。⁵⁰其次，「短狐」所生長之地，帶有「淫女」、「惑亂」等明顯的文化與道德判准。換言之，「短狐」作為一蠻荒地帶（南越）的毒物，更是「不道德」、「不文明」的文化象徵。由這樣的角​​度來看，這一系列的毒物，便不只是風物的羅列，更不時透顯著華夷之辨的框架。也就是，這些書寫皆通過特定毒物的記述與聯想，收編甚至建構了他們

⁴⁸唐·歐陽詢：《藝文類聚》，錄於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88 冊，頁 979 上。

⁴⁹《周官·考工記》的「地氣」之說：「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逾淮而北為枳，鵠不逾濟，貉逾汶則死，此地氣然也。」見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958 上。

⁵⁰此詩是許棠贈予徐雲虔赴南詔任官員所作，詩中也充斥著異域色彩與蠻荒想像。全詩如下：「西去安夷落，乘輶從節行。彤庭傳聖旨，異域化戎情。瘴路窮巴徼，蠻川過嶠城。地偏風自雜，天漏月稀明。危棧連空動，長江到底清。笑宜防狒狒，言好聽猩猩。撫論如敦行，歸情自合盟。回期佩印綬，何更見新正。」見清·沈三曾等編：《全唐詩》卷 604（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6986-6987。

未曾到過的蠻方異域。

相似的書寫，在《蠻書》中屢有所見，例如在《山川水源第二》中，對於「麗水」的紀載：

又麗水，一名祿江。源自邛些城三危山下。南流過麗水城西，又南至蒼望。又東南過道雙王道勿川。西過彌諾道立柵，又西與彌諾江合流。過驃國南入於海。水中有蛟龍、鱷魚、烏鰂魚。又有水獸似牛，遊泳則波濤沸湧，狀如海潮。《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蓋此是也。」

(頁 52-53)

樊綽紀錄了蛟龍、鱷魚、乃至於似牛的「水獸」，這些兇猛怪物，映襯出麗水這個地方令人畏懼。而其中，烏鰂魚雖非猛獸，卻也是讓人驚奇的南方物種。⁵¹通過一系列迥異於中原地區的奇怪物種，包括毒物、怪物、奇物，形塑了西南地方的怪異與偏荒。樊綽通過有意的揀選，使險惡的地勢與奇異的物種相結合，呈顯出蠻荒險地獨有的特徵。

綜而言之，《蠻書》對西南風物知識的記述，不只著墨於地形高峻陡峭，更通過「瘴氣」、「毒物」、「異獸」等一系列相關的蠻荒意象，去形塑這處「邊城」。彼些意象在相關的物志書寫中，往往被歸納為一類，顯示出人們慣於以某種特定的想像，去掌握未曾履及的他方。

⁵¹例如宋·李石《續博物志》引《南越志》曰：「烏鰂懷墨而知禮，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給人，物書迹如淡墨逾年墨消空紙耳。」所謂烏鰂即為烏賊。見宋·李石著：《續博物志》，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南方草木狀（及其他三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26。

第四節、歷史記憶與帝國想像：銅柱、石碑與誓文

樊綽所處的唐代，已歷經安史之亂，國力走向衰弱，而南詔屢屢的攻伐與擾境，更是唐人巨大的隱憂。後人多認為唐代亡於西北外族，然在《新唐書·突厥》中，史臣已敏銳指出南蠻是唐朝終結的關鍵：

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為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之所繇亡云。⁵²

陳寅恪認為，外族的興廢，常與其他外族盛衰有關，而不只是中國與某一特定外族的單獨互動關係。是故，南詔之所以興起，即同時與吐蕃的衰弱有關。此消彼長，南詔便在大和三年（829），攻遂陷邛、戎、雋三州，進一步入掠成都。⁵³而呂思勉則指出，南詔侵擾邊疆，使唐朝困於調兵轉餉之事，「此則政理之不臧，亦未可盡咎蠻夷矣。」⁵⁴樊綽在《蠻書·南蠻條教第九》中，即對唐朝與南詔的關係，提出了觀察與批判：

朝廷差使到雲南，南詔迎接遠送。自數年來，緣邕、交兩地長吏苛暴，恣殺非事，致令眾蠻告冤，因茲頻來攻掠，伏蒙聖心，征發大軍，指揮期於克復。 (頁 227)

⁵²宋·宋祁等著：《新唐書·突厥》，錄於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72 冊，頁 23 上、26 上。

⁵³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346-347。

⁵⁴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334。

樊綽從過去南詔「迎接遠送」的殷勤，到近年「眾蠻告冤，因茲頻來攻掠」的窘境，指出了「邕、交兩地長吏苛暴，恣殺非事」等酷吏暴政的問題。而其背後，已透顯出今非昔比的政治景況。

《蠻書·雲南界內旅途卷一》的開篇，就寫道：「安寧城，後漢元鼎二年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所。去交趾城池四十八日程。漢時城壁尚存，碑銘並在。」⁵⁵《蠻書·雲南管內物產卷七》亦再次述及「馬援銅柱」之事：「天寶八載，玄宗委特進何履光統領十道兵馬，從安南進軍伐蠻國。十載，已收復安寧城並馬援銅柱」。在樊綽寫下這些記述時，交趾城已然陷入存亡危機，故《蠻書》開偏就指出安寧城「去交趾城四十八日程」，又引「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事，就頗堪玩味。

馬援所立銅柱，早不可見，故設立銅柱的地點，乃至於真假與否，歷來頗受爭議。考察《後漢書·馬援傳》所記，馬援曾平定交趾徵氏姊妹叛亂，然卻未有立銅柱之說。⁵⁶西晉《廣州記》是最早記載馬援銅柱的史籍：「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除了《廣州記》外，後世史籍如《交洲箋》、《林邑記》、《晉書》、《隋書》等，多與《吳錄》相同，認為立柱之處在林邑，大抵位於今越南北部、中部的廣南—峴港省一帶。而其詳實的位置，則有各種不同的說法。⁵⁷

經過現代學者的考察，《蠻書》所云馬援立銅柱於安寧城之說，已被認定為

⁵⁵向達指出馬援定交趾是後漢光武帝建武十九年事，且元鼎是西漢武帝年號，樊綽於此失之考據。見唐·樊綽著，向達校注：《蠻書校注》，頁1。《蠻書》原作「安寧城，後漢元鼎二年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所。去交趾城池四十八日程。」而趙呂甫引木芹之說，認定「安寧城」和「交趾城」當互改，因「此條乃總述交趾、安寧間之里程，下條始分敘兩地間各段道里，下條既云：『從安南府城……』，此條應首言交趾城，上下文例方一致也。」《雲南志校釋》，頁1。然木芹後來在《雲南志補注》中，又引李埏〈馬援安寧立銅柱辨〉，修正了原來互改之說。見唐·樊綽著，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頁4。

⁵⁶劉宋·范曄：《後漢書·馬援傳》，錄於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7冊，頁6上-7上。

⁵⁷關於歷代史籍所記「馬援立銅柱」之考察，詳見王元林、吳力勇：〈馬援銅柱與國家象徵意義探索〉，《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1卷2期（2011年3月），頁87-88。

「荒唐」、「附會」之說。誠如李埏所云，一來馬援從未涉足雲南，如何「立銅柱定疆界」？二來，《後漢書·馬援傳》不吝篇幅記載馬援在交趾鑄銅馬、銅鼓，乃至於上銅表之事，卻對銅柱一字未提，正好反證「立銅柱」並非事實。⁵⁸也就是說，「馬援立銅柱」之事，已無地景實證，當為無稽，然《蠻書》仍根據地方傳言或檔案文獻的記載將其寫入，甚至置於開篇。⁵⁹於此，馬援銅柱便不只是一件漢代的古物（且其真實性闕疑），更成為政治象徵：《蠻書》以「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為起點，一方面指向中國「理番」的控制權，另一方面，也通過歷史記憶，召喚出唐人對於大一統帝國的野心與想像。

除了交趾，在《蠻書·雲南城鎮第六》中，亦出現了大量對於「故地」的標記。例如：

雲南城，天寶中閣羅鳳所規置也。嘗為信州地。城池郭邑皆如漢制。州中南北二十餘里，東西四十五里。帶邑及過山雖有三千餘戶，田疇多廢，閭里少人。諸葛亮分永昌東北置雲南郡，斯即其故地也。

（頁 127）

柘東城，廣德二年鳳伽異所置也。其地漢舊昆川，故謂昆池。東北有井邑城隍，城西有漢城，土俗相傳云是莊躄故城。城之東十餘里有穀昌村，漢穀昌王故地也。

（頁 135-136）

晉甯州，漢滇河故地也。

（頁 138）

⁵⁸李埏：〈馬援安寧立銅柱辨〉，原刊載於《思想戰線》3期（1990年），引自唐·樊綽著，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頁4-5。

⁵⁹《新唐書》顯然亦承繼《蠻書》的說法，在《南蠻傳》中記述安寧城時，也提及馬援銅柱：「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走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石城南面有新豐川，漢南寧州新豐縣故地也。

(頁 141)

安甯鎮去柘東城西一日程，連然縣故地也。

(頁 143)

樊綽記述「故地」，一方面呈現出地方史、城市史的沿革，另一方面，所謂「故地」，早已是唐人失去的故土。樊綽通過「故地」一詞，回顧了漢族統治蠻地的榮光，也追悼著唐人逐漸崩毀的帝國。因此，提及「故地」的段落，樊綽除了交代地理位置，還常常牽繫著過往的歷史人物或事件，使其夾帶著一層歷史記憶的厚度。而此間最最頻繁提及的，即是諸葛亮的治蠻的歷史典故：

石門外第三程至牛頭山，山有諸葛古城，館臨水，名馬安渡。上源從阿等路部落，繞蒙夔山，又東折與朱提江合。

《蠻書·雲南界內途程第一》，頁 29

蜀忠武侯諸葛亮伐南蠻，五月渡瀘水處，在弄棟城北，今謂之南瀘。兩岸葭葦，大如臂脛。川中氣候常熱，雖方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又東北入戎州界，為馬湖江，至開邊縣門，與朱提江合流，戎州南城入外江。

《蠻書·山川水源第二》，頁 44-45

蘭滄江源出吐蕃中大雪山下莎川。東南過聿齋城西，謂之瀨水河。又過順蠻部落。南流過劍川大山之西。蘭滄江南流入海。龍尾城西第七驛有橋，即永昌也。兩岸高險，水迅激。橫互大竹索為梁，上布篲，篲上實板，仍通以竹屋蓋橋。其穿索石孔，孔明所鑿也。昔諸葛征永昌，於

此築城。今江西山上有廢城遺跡及古碑猶存，亦有神祠廟存焉。

《蠻書·山川水源第二》，頁 49-51

石城川，味縣故地也。貞觀中，為郎州，開元初改為南寧州。州城即諸葛亮戰處故城也。城中有諸葛亮所撰文，立二碑，背上篆文曰：「此碑如倒，蠻為漢奴。」近年蠻夷以木撐柱。

《蠻書·雲南城鎮第六》，頁 139-141

雲南城，天寶中閣羅鳳所規置也。嘗為信州地。城池郭邑皆如漢制。州中南北二十餘里，東西四十五里。帶邑及過山雖有三千餘戶，田疇多廢，閭里少人。諸葛亮分永昌東北置雲南郡，斯即其故地也。

《蠻書·雲南城鎮第六》，頁 127

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蒼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廣蕩城六十日程。廣蕩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西邊大洞川，亦有諸葛武侯城。城中有神廟，土俗咸共敬畏，禱祝不闕。蠻夷騎馬，遙望廟即下馬趨走。

《蠻書·雲南城鎮第六》，頁 159-160

在這些段落中，樊綽通過三個面向，來描述諸葛亮對於雲南的治理與影響。其一，是政治版圖上的劃分。「諸葛亮分永昌東北置雲南郡」，指的即是諸葛亮平定南中以後，將原來的五郡改為七郡，加強統治，此亦影響了後來大一統政權對此地區的掌握。⁶⁰其二，對於「戰爭」的強調，包括「渡瀘水處」、「昔諸葛征永昌，於此築城」、「諸葛亮戰處故城」等古戰場的遺跡，此亦關乎第二節中指出的，《蠻

⁶⁰見向文斌、覃山權：〈諸葛亮南征對雲南的影響〉，《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5 卷 7 期（2010 年 7 月），頁 87-88。

書》對於「戰爭」的關注——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當然都是諸葛亮「打勝仗」的遺跡。其三，通過歷史地景或文化遺址，標誌出諸葛亮對於雲南的控管，亦凸顯出古代與現今差異的張力。例如「諸葛古城」、「諸葛武侯城」等，乃至於「孔明所鑿」之橋索石孔、刻有「此碑如倒，蠻為漢奴」的碑文等。

諸葛亮所立石碑的細節，說法頗眾，查看《新纂雲南通志》的「金石考」，就有「諸葛亮紀功碑」、「諸葛亮撰文碑」、「南寧諸葛碑」、「彌渡諸葛碑」、「諸葛南征」等多種，然皆無實際地景，故只能列為「存疑」。⁶¹而《蠻書》載「此碑如倒，蠻為漢奴」之事，後亦為《新唐書·南詔傳》所挪用：「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搯搯。」事實上，早在《蠻書》以前，唐人魏徵所撰《隋書·史萬歲傳》中，就有對諸葛石碑的相關紀載：

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⁶²

《隋書》史萬歲見諸葛亮紀功碑之說，後世野史屢有所承，⁶³相較於《蠻書》、《新唐書》所記，《隋書》碑文更帶有「推背圖」式的預言意味，渲染諸葛亮的神異色彩。諸葛碑已無實景，因而就如同前述「馬援銅柱」，成為了文獻中被再製的文化景觀。樊綽通過文字鉤沉歷史，以馬援、諸葛亮等漢代人物，召喚著歷史的

⁶¹見劉景毛等點校：《新纂雲南通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91-93。

⁶²唐·魏徵等著：《隋書·史萬歲傳》，錄於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9冊，頁815上-815下。

⁶³如明·倪輅輯，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訂，木芹會證：《南詔野史會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77、380。

帝國榮光。

除了「馬援銅柱」、「諸葛石碑」等由漢人樹立，已不存在（或從未存在）的地景，《蠻書》亦載述由南詔人撰寫的碑文。天寶九年（750），南詔王閣羅鳳因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雲南太守張虔陀不禮，而起兵叛亂，圍殺張虔陀，取姚州等三十二州。閣羅鳳後北臣吐蕃，吐蕃以為弟，吐蕃授金印，號東帝。大曆元年（766），於大和城立「南詔德化碑」。⁶⁴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亂正好在此段時期爆發（755-763），唐朝失去鎮壓邊疆的兵力，吐蕃與南詔正好藉機結盟，吐蕃甚至一度攻佔唐代首都長安，兵隊中可能就夾帶著南詔的軍隊。⁶⁵

遲至貞元十年（794），由於劍南節度使韋皋，極力分化吐蕃與南詔的結盟、並加以招納，南詔王異牟尋終於再次歸化。⁶⁶唐人一般將「南詔德化碑」詮釋為南詔向唐朝表明背唐投蕃乃「迫不得已」之意，例如《蠻書·六詔》：「閣羅鳳嘗謂後嗣悅歸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舊本，呈示漢使，足以雪吾前過也。」《新唐書·南蠻傳上》亦記閣羅鳳云：「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⁶⁷然若仔細考察碑文，會發現「南詔德化碑」的原初目的，其實是對閣羅鳳歌功頌德，並向吐蕃示好，表明繼續結盟之作。而後世之所以有前述的曲解，實是南詔與唐朝重歸舊好時，後起的繼承者異牟尋討

⁶⁴關於〈南詔德化碑〉作者，普遍認為是異牟尋的清平官鄭蠻利（即鄭回），然王叔武考察成文年代與碑文字跡，認定為閣羅鳳的清平官王蠻盛所為。然亦有學者如王宏道，對此提出質疑，認為該是鄭回。二人之間互有駁答，相關討論見王叔武：〈《南詔德化碑》作者考〉，《思想戰線》2期（1978年），頁85-87。王宏道：〈《南詔德化碑》碑文作者為王蠻盛質疑（上）〉《雲南社會科學》4期（1985年），頁68-76。王宏道：〈《南詔德化碑》碑文作者為王蠻盛質疑（下）〉《雲南社會科學》5期（1985年），頁80-88。

⁶⁵ [美]查爾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譯：《南詔國與唐代西南邊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4-95。

⁶⁶關於韋皋與南詔的交涉和聯盟，詳見美·查爾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譯：《南詔國與唐代西南邊疆》，頁105-110。

⁶⁷宋·宋祁等著：《新唐書·南蠻傳上》，錄於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72冊，頁180上。

好唐人的說法。⁶⁸因此，「南詔德化碑」也如「諸葛石碑」、「馬援銅柱」，不只該看作歷史上的客觀存在物，而當考量其背後的時代背景與詮釋策略。「南詔德化碑」成為一副被「再製」的碑文，同時提供南詔回歸的說詞，也滿足了中國大一統的野心。

《蠻書》對於異牟尋的「歸化」，花費大篇幅記述，甚至在《蠻書》完成以後，將異牟尋回歸時所立的「誓文」重新補入。無論此篇「誓文」是樊綽或唐史館臣補入，⁶⁹都意味著唐人對於此則史事的重視。進一步說，在交趾城破以後，唐人對於西南地區的掌握，可謂徹底失敗。而將異牟尋貞元十年的「誓文」重新納入，便不只是單純的史料補充，更是「劫餘」以後，中國重新召喚過往帝國榮光、凝聚族群向心力的重要鎖匙。異牟尋「誓文」之重要性不言可喻。是故不畏其長，全文引述：

貞元十年，歲次甲戌，正月乙亥，朔，五日己卯，雲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大軍將與劍南西川節度使巡官崔佐時，謹詣點蒼山北，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管內川穀諸神靈，同請降臨，**永為證據**。

⁶⁸關於「南詔德化碑」為文目的，詳見趙心愚的討論。趙心愚：〈《南詔德化碑》立碑目的試探〉，《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 143 期（2014 年 2 月），頁 99-104。

⁶⁹樊綽《蠻書·六詔》之末曾云：「臣咸通四年正月，奉本使尚書蔡襲意旨，令書吏寫蠻王異牟尋《誓文》數本，並書牒系於車駑上，飛入賊營。臣切覽牟尋《誓文》，立盟極切。今南蠻子孫違負前誓，伏料天道必誅，容臣親於江源訪覓其《誓文》，續俟寫錄真本進上。」而今日《蠻書》可見該篇《誓文》，四庫館臣云：「異牟尋《誓文》今附卷末，而此云待訪覓續寫者，蓋其初作此篇時尚未得《誓文》，故所言如此。其後訪覓附入，而此本未及刊削，遂前後互異其說耳。」而向達則認為：「原本此段頗有矛盾。既云令書吏寫蠻王異牟尋《誓文》數本繫於車駑上飛入賊營內，而後又云容臣親於江源訪覓其《誓文》云云，是原本脫誤，尚不止此也。」見向達：《蠻書校注》，頁 81。趙呂甫則認為二說皆不當，而認為今本《誓文》是唐史臣附入，故樊綽也無從刪削。見趙呂甫校釋：《雲南志校釋》，頁 117。木芹則認為，三種說法都有可能。見唐·樊綽著，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頁 46。

念異牟尋乃祖乃父忠赤附漢。去天寶九載，被姚州都督張虔陀等離間部落，因此與漢阻絕。經今四十三年，與吐蕃洽和，為兄弟之國。吐蕃贊普冊牟尋為東王，王亦無二心，亦無二志。去貞元四年，奉劍南節度使韋皋仆射書，具陳漢皇帝聖明懷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義等招諭，兼送皇帝敕書。遂與清平官大軍將、大首領等密圖大計，誠天地發於禎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趙莫羅眉、楊大和眉等贊仆射來書，三路獻表。願歸清化，誓為漢臣。啟告宗祖明神，鑒照忠款。今再蒙皇帝蒙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仆射遣巡官崔佐時傳語，牟尋等契誠，誓無遷變，謹請西洱河點蒼山神祠監盟，牟尋與清平官洪驃利時、大軍將段盛等請全部落歸附漢朝。山河兩利，即願牟尋、清平官大軍將等福祚無疆，子孫昌盛不絕。管諸睽首領，永無離貳。興兵動眾，討伐吐蕃，無不克捷。如會盟之後，發起二心，及與吐蕃私相會合，或輒窺侵漢界內田地，即願天地神祇共降災罰，宗嗣殄滅，部落不安，災疾臻湊，人戶流散，稼穡產畜，悉皆減耗。如蒙漢與通和之後，有起異心，規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難，不賜救恤，亦請準此誓文，神祇共罰。如蒙大漢和通之後，更無異意，即願大漢國祚長久，福盛子孫，天下清平，永保無疆之祚。漢使崔佐時至益州，不為牟尋陳說，及節度使不為奏聞牟尋赤心歸國之意，亦願神祇降之災。今年牟尋率眾官，具牢禮，到西洱河，奏請山川土地靈祇。請漢使計會，發動兵馬，同心戮力，共行討伐。然吐蕃神川、昆明、會同已來，不假天兵，牟尋盡收復鐵橋為界，歸漢舊疆宇。謹率群官虔誠盟誓，共克金契，永為誓信。其誓文一本，請劍南節度隨表進獻。一本藏於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尋留詔城內府庫，貽誠子孫。伏惟山川神祇，同鑒誠懇！

《蠻書·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第十》，頁 261-265

異牟尋與唐朝的盟誓儀式，與南詔的地方民俗文化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帶有詛咒意味的誓詞，進行儀式的地點在點蒼山神祠，乃至於拜請之神靈有天、地、水三官，可能帶有爨文化「明月社」和「五斗米道」的痕跡。⁷⁰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異牟尋一再標舉對唐人的赤誠，並強調「誓文」效果的永恆性與延續性。異牟尋一方面通過盟誓，強調「誓無遷變」、「永為誓信」的永恆意義，另一方面又標舉「子孫昌盛不絕」、「福盛子孫」、「貽誠子孫」的延續性。也就是說，其所立定的「誓文」，不只關注當下的同盟，更強調後繼者如何延續這段和平關係。即便這段誓文只是政治權謀的話術，然考諸歷史實情，從立誓到毀棄，才短短七十年，⁷¹這篇「永為誓信」的誓文已然毀棄，對唐人而言該是多麼唏噓諷刺。樊綽曾在《蠻書》中，闡述尋回牟尋「誓文」的動機與前因後果：

臣咸通四年正月，奉本使尚書蔡襲意旨，令書吏寫蠻王異牟尋「誓文」數本，並書牒系於車弩上，飛入賊營。臣切覽牟尋「誓文」，立盟極切。
今南蠻子孫違負前誓，伏料天道必誅，容臣親於江源訪覓其《誓文》，續俟寫錄真本進上。

《蠻書·六詔第三》，頁 81

由此看來，樊綽費心尋回異牟尋的「誓文」，其目的固然是對雲南歷史文獻的補足，然更該看作「今南蠻子孫違負前誓，伏料天道必誅」的急切呼喚。這裡的呼喚，並不只是對於南詔破壞聯盟誓詞的咒詛，更標舉出天朝的立場，以及朝臣對於政治情勢的體察與無奈。也因此，這篇「誓文」就不只是地方文獻或歷史記憶，更關乎當前政治的境況。

若進一步審視《蠻書》，會發現除了這一篇「誓文」，《蠻書》也花費大量的

⁷⁰陳斌、張躍：《雲南少數民族盟誓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頁 76-79。

⁷¹這裡的七十年，指的是貞元十年（公元 794 年）立誓，咸通四年（公元 863 年）南詔攻破交趾。

篇幅，去撰寫異牟尋的事蹟。例如：



貞元十年，以尚書祠部郎中兼禦史中丞袁滋、內給事俱文珍、劉幽巖入雲南，持節冊南詔異牟尋為雲南王，為西南之藩屏。

《蠻書·名類第四》，頁 78

後分散在磨些江側，並劍共諸川悉有之，餘部落不去。當天寶中，姚州刺史張乾拖守城拒戰，陷死殆盡。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破掠吐蕃地邑，收獲弄棟城，遷於永昌之城。

《蠻書·名類第四》，頁 91

裳人，本漢人也。部落在鐵橋北，不知遷徙年月。初襲漢服，後稍參諸戎風俗，迄今但朝霞纏頭，其餘無異。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領兵攻破吐蕃鐵橋節度城，獲裳人數千戶，即移於雲南東北諸川。今鐵橋城為南蠻所據，差大將軍為城使。

《蠻書·名類第四》，頁 92

順蠻，本烏蠻種類，初與施蠻部落參居劍、共諸川。……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虜其王傍彌潛宗族，置於雲南白巖，養給之。其施蠻部落百姓，則散隸東北諸川。

《蠻書·名類第四》，頁 95

茫蠻部落，並是開南雜種也……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攻其族類。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有此茫蠻，於安南蘇歷江岸聚二三千人隊。

《蠻書·名類第四》，頁 105



鐵橋城在劍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驛。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用軍

破東西兩城，斬斷鐵橋，大籠官已下投水死者以萬計。

《蠻書·雲南城鎮第六》，頁 153

琥珀，永昌城界西去十八日程琥珀山掘之，去松林甚遠。片塊大重二十餘斤。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進獻一塊，大者重二十六斤，當日以為罕有也。

《蠻書·雲南管內物產第七》，頁 200

從這些段落，可以觀察樊綽如何詮釋，乃至於建構一個臣服、效忠於唐朝的蠻王。若取《新唐書》來對照，可以顯而易見的發現《蠻書》不同之處。《新唐書》中的異牟尋，是源源本本從大歷十四年，閣羅鳳死，立異牟尋為嗣寫起，並述及其如何受吐蕃壓迫（「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候，歲索兵助防」、運用武力和計策，與唐朝斡旋，才終於結盟。⁷²相較於《新唐書》的完整記述，《蠻書》中的異牟尋，則更像一個歷史的「切面」，「貞元十年」尤其成為作者一再復返，並且特別重視的時刻（《新唐書·南蠻上》述及異牟尋的段落，從未特別提起「貞元十年」）。「貞元十年」，正是異牟尋與唐使崔佐時結盟，銘刻誓文，並與唐朝聯手攻打吐蕃的關鍵年份。也就說，相對於史傳，樊綽更有意揀選、召喚出作為「唐臣」的異牟尋（而非「蠻王」異牟尋），凸顯「南詔立功，歸化朝廷，發使冊命」的帝國榮光。在《蠻書》中，凡所見處皆「故地」，讓雲南不只是現實的地理，更佈滿了往日的記憶與帝國魅影，而那正是這部「劫餘之書」的癥結所在。

⁷²宋·宋祁等著：《新唐書·南蠻上》，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72 冊，頁 180 上-181 下。

第五節、小結

《蠻書》作為一部地記著作，固然是對雲南當地風土、風物、山河、城市的記載。然若將此書放入樊綽成書時，南詔勢力大起、交趾城破的時代脈絡，實不能忽略其中隱晦的「劫餘」紀事——也就是，在城市覆滅的災難以後，對於「已然失去」的故地的回眸與記憶。值得注意的是，《蠻書》的作者樊綽，並未親身到過雲南，此書的內容，主要參考的是袁滋的《雲南行記》以及南詔史臣的檔案，編纂而成。⁷³換句話說，《蠻書》中呈現的西南，並非親眼所見、現實的，大部分是文獻裡、記憶裡「過去」的西南，甚至是想像中的西南。

基於上述的觀點，本文從「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的角度切入，並以戰爭、風物知識與歷史記憶等三個面向，去探勘《蠻書》隱而未顯的書寫動機與文化意義。首先，筆者從《蠻書》的書名爭議談起，指出本書的性質，並不只是單純的地志文獻，更隱含著作者的為書之意與政治用心。大量的「蠻」字使用，意味著樊綽觀看雲南的視域，牽引著一系列「蠻」字的既定想像。樊綽通過蠻族驍勇善戰和大量的武器記述，透顯出彼時戰爭的時代景況。而後，筆者聚焦於《蠻書》對於風物知識的形塑，指出樊綽常會以一系列的蠻荒詞彙、異地物象去形塑地方，例如「瘴氣」、「毒物」、「異獸」等，營塑出雲南地區的偏遠與野蠻。此間不僅是對於蠻地知識的建構，更透顯出華人如何想像蠻夷，乃至於是兩造文化間的衝突。本文進一步考察了樊綽如何通過歷史記憶，在「劫餘」之後，重新呼喚華夏帝國的圖像。筆者以「馬援銅柱」、「諸葛石碑」、「南詔德化碑」等故地記憶，去檢視樊綽如何通過挪用與再製，召回華夏民族征服南詔的歷史。而最後，筆者討論樊綽對於異牟尋「誓文」的尋回與補入，乃至於一再重返「貞元十年」的帝國光榮時刻，指出其對「唐臣」異牟尋（而非「蠻王」異牟尋）的聚焦與銘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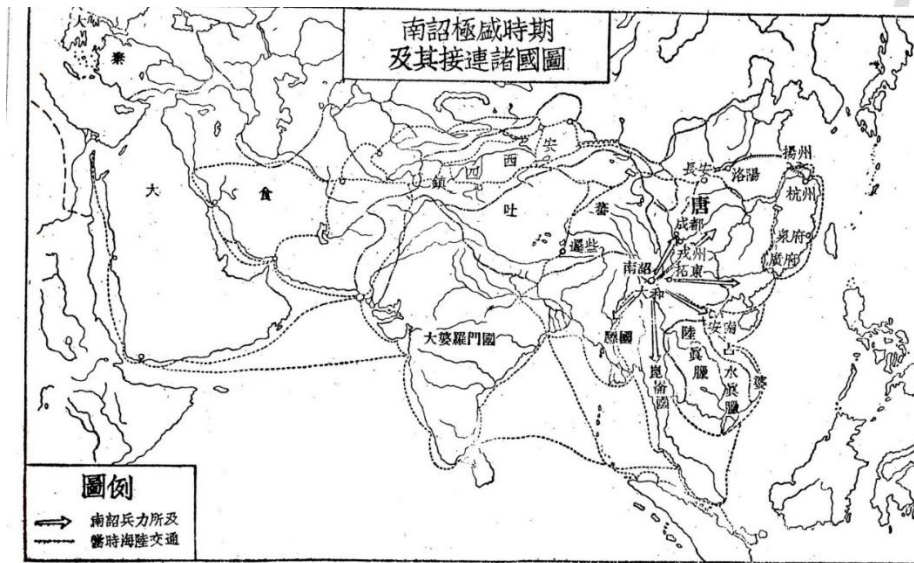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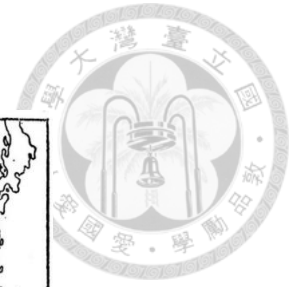
回應到本文最初的探問，筆者藉著樊綽《蠻書》這個位處「華夏邊緣」的個案，探勘了中晚唐時期，唐人的地誌書寫對於「西南」的形塑。誠如當代人文地

⁷³唐·樊綽著，向達：《蠻書校注》，頁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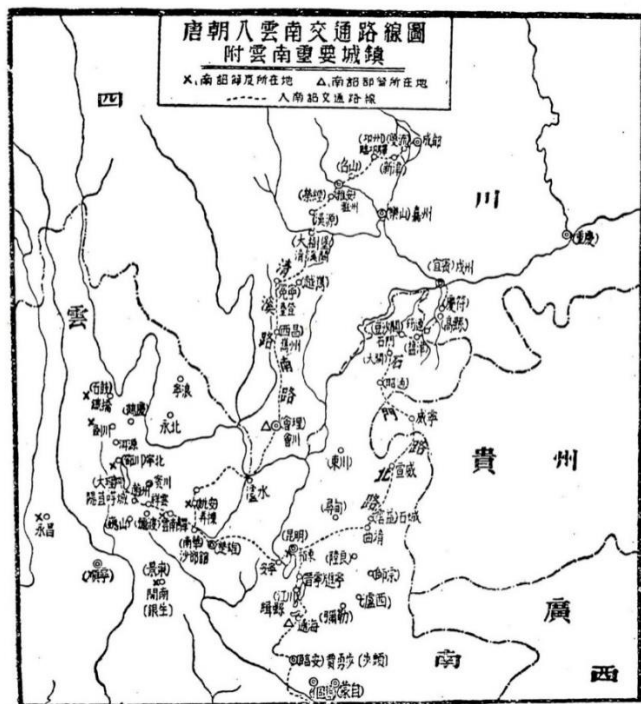
理學者提醒我們的，必須強調地理學是「建構」的，而非「天生固有」；因此我們必須對地理知識和權力形式保持敏感，描述並進而思考所謂「事實」背後，所可能帶有的辯證關係。⁷⁴因此，我們閱讀《蠻書》時，不能只是將其視為一部客觀的觀察紀錄，更該探索其寫作策略。其中指涉著「蠻」所牽連的視域，歷史記憶與地方知識的交纏，乃至於帝國想像與政治情勢。在《蠻書》中，所謂的「蠻」並不只是靜態的、被觀察的靜物，也不只是歷史文獻中，抽象的「華夷之辨」，而是實際存在的惘惘威脅，並與整個帝國的盛衰興亡息息相關。

⁷⁴英·Pual cloke 等編著，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概論·導論》，台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8月，XVIII。

附錄、南詔與諸地關係圖⁷⁵



(附圖一：南詔極盛時期及其接連諸國圖)



(附圖二：唐朝入雲南交通路線圖，附雲南重要城鎮)

⁷⁵附錄兩圖皆引自唐·樊綽著，向達校注：《蠻書校注》。

第四章、信是南方最勝遊：

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中的詩跡、史跡與神跡



新春蕊綻訾家洲，信是南方最勝遊。

——《桂林風土記》引陸宏休〈和訾州宴〉

第一節、前言

唐人對於「南方」邊陲的想像，多奠基於被派任乃至被貶謫的官員書寫之上。例如記述嶺南風土異物的段公路《北戶錄》、房千里《投荒雜錄》、孟瑄《嶺南異物志》，乃至於描寫雲南的樊綽《蠻書》、袁滋《雲南記》、竇滂《雲南別錄》等等。大抵來說，這些作品的書寫，幾乎不脫北方知識分子的「外部觀點」。他們往往通過南北的地域差異，乃至於文化傳統上的華夷之辨，來審視他們暫時作客的「南方」。在這樣的「外部觀點」籠罩下，「南方」往往呈顯出野蠻、兇惡、怪異的異域風貌。¹緣此，不禁讓筆者深思，是否也存在著土生土長、長期居住於南方作者的觀點？而這樣的「內部觀點」，又與「外部觀點」有什麼差別，乃至與後者有辯證對話之處？²

基於上述的思路，本文擬藉由晚唐士人莫休符的《桂林風土記》這部書寫桂林風土的著作，探勘唐代南人視野中的「西南」圖像。莫休符生卒年不詳，封州開建（今廣東懷集西南）人，為越人之後裔。唐懿宗咸通末，受知於嶺南節度使鄭愚。曾經任職檢校左散騎常侍、融州刺史、權知春州等，昭宗時，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光化二年（899）退居，錄桂林風土人物，著《桂林風土記》三卷。今

¹參見本論文第二、第三章對於段公路《北戶錄》與樊綽《蠻書》的討論。

²「內部觀點」與「外部觀點」之說，參胡曉真先生的說法。詳見《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之討論。

所見《桂林風土記》已非全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此記，《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今存者一卷。卷中目錄四十六條，今闕火山、採木二條。蓋殘闕之餘，非完書矣。」³根據董靈超的考察，此書從南宋末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開始，已從所錄三卷變成一卷。⁴而鄭鐵巨指出，此書在宋元之際，已然散失過半。⁵陶敏則採用《四庫全書》本為底本，校以《太平廣記》、《太平御覽》，考證並輯錄佚文，得見《桂林風土記》有序一篇與四十七則條目，是目前較完整也較具公信力的版本。⁶近代學者對於《桂林風土記》的關注並不多，除了上述基本的考察與輯佚工作，大多只是指出《桂林風土記》的文獻史料價值。例如吳永章即從南方民族史的角度，指出「因桂林為古代越人及其後裔的聚居地，而且該地又是中原與嶺南交通要道，故對該地的記述，無疑有益於古代南方民族史的研究。」⁷

緣此，本章期望在文獻學與民族學的基礎上，拓寬視野，從文學詮釋的角度，進一步抉發《桂林風土記》的文化意義。本文關心的重心，包括《桂林風土記》撰作的體例，與前代地記有何承衍關係？而此書與後代士人對於桂林的想像與形塑又有何關聯？莫休符撰作此書的用心為何？其藉由書寫桂林風土，是否有何深刻的寄託？筆者認為，《桂林風土記》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文字史料上的孤立考證；而必須將其納入中晚唐時期，大量出現的「南方」風土書寫的脈絡中觀察。如此一來，才能更全面掌握此書的特質，凸顯莫休符通過《桂林風土記》形塑出

³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史部二十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2-51上。

⁴董靈超：〈《桂林風土記》三考〉，《柳州師專學報》第30卷5期（2015年10月），頁16。

⁵鄭鐵巨：〈《桂林風土記》校讀記〉總31期（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頁97。

⁶陶敏：《全唐五代筆記》第三冊（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頁2560-2574。本文引述《桂林風土記》皆以此書為準，並參照鄭鐵巨〈《桂林風土記》校讀記〉總31期，頁97-101。下引《桂林風土記》，僅加附頁碼，不再贅注。

⁷吳永章：《中國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題解》（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頁41。

的「內部觀點」，與一般「外部觀點」書寫之南方地記的差異與辯證。承上所述，本章將分為三個部分，以《桂林風土記》為中心，探討其呈顯出的幾項課題。首先，是對《桂林風土記》的體例加以考略，指出莫休符「補闕」和「錄見聞」的史傳意識，以及其與《三國志》、《奉天記》、《荆楚歲時記》、《湘中記》的承衍關係，並進一步比對周處的《風土記》，指出莫休符對於人文景觀的標舉。其次，筆者進一步從《桂林風土記》中大量的「詩跡」及詩人，乃至於「史跡」和「神跡」的記述，指出莫休符的書寫策略，一方面翻轉人們對西南蠻夷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形塑桂林地方的文化根源與文人風景。最後，筆者以宋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與明人張鳴鳳《桂勝》、《桂故》兩組作品，檢視《桂林風土記》對於後代桂林書寫的影響，並反過來指出莫休符撰作此書的文化意義和用心所在。

第二節、「補闕」與「錄見聞」：《桂林風土記》之體例考略



學者倉修良已經指出，相較於早前的地理書如《山海經》、《十州記》等，從魏晉南北朝時發展起來的地記，更重視「地理」和「歷史」的結合。為了呼應世家大族鞏固權力的需求，出現了「地理志」與「人物傳記」結合的體例，如常璩《華陽國志》、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等。這些地記作品相較於史傳中的地理書著重的「空間／地方」，更多了一層「時間／歷史」的關懷。而到了唐代，由於世家大族削弱、中央集權興起以及州郡制度的重新規劃，以境界、道里、戶口為主要記述內容的「圖經」，取代了「地記」成為主流（猶如「國史」取代「私史」）。⁸然而，地記書寫並未消失，反而化作伏流，補充著被官方圖經忽略的暗處。

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對於「時間／歷史」的關注，可以從該書之〈序〉中窺見端倪：

前賢撰述，有事必書。故有《三國志》、《荊楚歲時記》、《湘中記》、《奉天記》。惟桂林事跡，闕然無聞。休符因退居，粗錄見聞，作《桂林風土記》，聊以為敘。時唐光化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莫休符序。（頁 2560）

莫休符開宗明義便提出了「前賢撰述，有事必書」的論述，並指出其撰寫《桂林風土記》的根本動機，便在於「惟桂林事跡，闕然無聞。休符因退居，粗錄見聞」。其對於「補闕」和「錄見聞」意識的標舉，讓人想及唐代文人常常透顯出的「補史意識」。⁹此在形同稗官野史的筆記中，屢有呈顯。¹⁰若從這個角度觀察序中提

⁸見倉修良：《倉修良探方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主要見〈論方志的起源〉、〈再論方志的起源〉、〈地紀與圖經〉等章節，頁 16-104。

⁹吳夏平指出，唐人「補史」意識之所以興盛，大抵有三點原因：一是史官地位崇高；二是史館

出的《三國志》、《荊楚歲時記》、《湘中記》、《奉天記》四部前代著作，則頗富意義。其中，梁人宗懔的《荊楚歲時記》與晉人羅含的《湘中記》，是著眼於地方風物與歲俗的地記書寫。這兩本書一方面與「風土記」的書寫傳統有關，另一方面也都形塑著「南方」的風土樣貌。羅含《湘中記》今已殘缺，然從留存下來的文字，仍可謂袁山松《宜都記》、盛弘之《荊州記》的先導。其對於山水的描寫，已不拘泥於寫實，而是善用文學性的表現手法，引人入勝。¹¹此外，《湘中記》對於屈原歷史遊蹤的拉引與比附，亦使此作不只是地理記述，更透顯出文化的積累。而《荊楚歲時記》中對於月令、節慶、歲俗活動之著墨，更不侷限於山川地理的生態描述，而強調人文精神的昂揚。¹²《湘中記》和《荊楚歲時記》雖是地理著作，然其對於人文精神與地方文化的關注，卻使之有別於一般的地理方志。這樣的寫作方式在《桂林風土記》中有明顯的繼承，筆者將在下面的章節著重討論。

除了《湘中記》和《荊楚歲時記》，莫休符對《三國志》和《奉天記》的標舉，也值得探討。莫休符在序中第一部標榜的著作即為《三國志》，此難免讓人想及，莫休符所處的時代背景：在安史亂後的時空背景下，文人的憂國與劫餘心

獨立後，朝廷規定不得私撰國史；三是安史之亂帶來的動盪不安。詳見吳夏平：〈論唐代筆記小說的史學淵源〉，《新亞論叢》總 14 期（2013 年），頁 127-128。

¹⁰撮舉如李肇《國史補·序》：「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為。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唐·李肇：《國史補》，收錄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丁如明等校點：《全唐五代筆記大觀（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89。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序》：「懼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問，謹錄如左，以備史官之闕」等。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序》，《全唐五代筆記大觀（上冊）》，頁 464。

¹¹關於《湘中記》的討論，詳見鮑遠航：〈羅含《湘中記》考——《水經注》徵引文獻研究之一〉，《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8 卷 2 期（2006 年 3 月），頁 97-101

¹²人文精神的彰顯，在《荊楚歲時記》對於「人日」的描寫更可見一斑。詳參王詩評：〈《荊楚歲時記》中的人日節俗論略〉，《漢學研究集刊》第十五期（2012 年 12 月），頁 29-54。

理，以及要為帝國留下著作的決心。¹³而更饒富興味的是，莫休符亦同時標舉了記述君王落難之作《奉天記》。此書今已失傳，而《新唐書·藝文志》猶有三部與此相關的存目，包括徐岱《奉天記》一卷、崔光庭《德宗幸奉天錄》一卷、趙元一《奉天錄》四卷，並在徐岱《奉天記》書目之下，有「德宗西狩事」的標註。所謂「德宗西狩事」，指的是建中四年（783），涇原地方士兵叛變，攻入長安，德宗逃至奉天（今陝西乾縣）的史事。¹⁴史學研究者已指出，涇原兵變並非偶發的無妄之災，而是唐廷與西北邊鎮的矛盾衝突的長期累積。¹⁵距離莫休符撰寫《桂林風土記》，「德宗西狩事」才約百年前的事。那是安史亂後，唐室一次重大的危機，且亦是與中國邊鎮有關的災變。莫休符點出《奉天記》的重要性，顯然不只關注地方書寫，更強調了對於歷史興衰，乃至對於國家的政教關懷。對於這兩部書的標榜，再次呼應了上述「補闕」、「錄見聞」的為書用心，以及對於歷史與文化向度的關懷。

綜觀清人王謨《漢唐地理書鈔》之總目，多有以「記」為名的著作，撮舉如鮑至《南雍州記》、裴淵《廣州記》、王歆《始安記》、梁福《廬陵記》、徐靈期《衡山記》等。可惜這些著作都只剩下斷簡殘篇，作者的生平事蹟也難以查考。¹⁶而今可見較完整、唐前的文獻，如梁人宗懔《荊楚歲時記》、北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等，不只記述地方風物，更對文化習俗加以描繪。前者重視地方節日與習俗，而後者則著墨於洛陽的建築空間。而另如東晉法顯《佛國記》，則除了取經路途的記載，更附帶一層宗教神異的色彩。從這些以「記」為名的地記文本中，我們可以看見風土如何進入知識分子的視野，以及其所展示的各種不同的樣貌。

¹³在筆者討論《大唐新語》的文章中，有更進一步的延伸。參見陳柏言：〈匡諫·鑑戒·禮典：論《大唐新語》的政教意旨〉，《思辨集》19期（2016年3月），頁289-306。

¹⁴關於「德宗西狩」事之前因後果，詳見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冊）》第七章第三節「涇師之變」，頁213-218。

¹⁵參見王效鋒：〈唐德宗「奉天之難」探析〉，《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0卷6期（2011年11月），頁77-82。

¹⁶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11-22。

歷代以「風土記」名者，大抵已然散佚。而據文獻所記，在唐代時期，至少曾流傳有《荊楚風土記》¹⁷、《長沙風土記》¹⁸二部，也都已然失傳。¹⁹今所知最早以「風土記」為名者，當屬西晉周處的《風土記》。此書早已亡佚，篇次無考。近代學者李傳軍做了頗詳細的輯佚工作，並在周之冕、嚴可均等前人分類的基礎上，分析《風土記》的內容，包括郡邑、山水、氣候、風俗、歲時、草木、舟車、器物、服飾、飲食、人物等共十六種體例。²⁰若將《桂林風土記》的類別，按照李傳軍的分類，大抵可以得出下表的對照：

序號	周處《風土記》體例	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條目
一	都邑	桂林
二	山水	漓山、獨秀峰、海洋山、靈渠、甘巖、牂牁水、如錦潭、訾家洲、仙人山
三	氣候	
四	風俗	宜州龍開江事、開元寺震井、延

¹⁷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四《攷史》：「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潘水李氏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裏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彩囊，盛柏露食之。』又《荊楚風土記》：『以五彩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收錄於《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293-294

¹⁸北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十五曾提及：「（張）調登天寶二年進士第。奉使長沙，嘗作《長沙風土記》云：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罪湘東。」北宋·計有功著，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669。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長沙土風碑》一卷，唐潭州刺史張調撰。前有碑銘，後有湘中記載事迹七十件。」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頁146。

¹⁹西元七三三年，日本出現了第一部完整的地方志，即名《出雲國風土記》。此書以漢文寫成，或許可供參照。然日本文學自有其傳統，亦非本文著力之處，故在此聊備一說。近期相關討論可見[日]伊藤劍：〈現傳『出雲國風土記』の成立をめぐる〉，《國語と國文學》6月號（2017年），頁17-31。

²⁰李傳軍：《漢唐風土記研究》，頁49-118。

		齡寺聖像
五	歲時	
六	舟車	
七	器物	
八	服飾	
九	飲食	
十	果實	
十一	草木	
十二	鳥獸	
十三	蟲魚	
十四	武備	
十五	居處 ²¹	越亭、巖光亭、東出亭、碧潯亭、拜表亭、隱仙亭、張天師道陵宅、舜祠、雙女冢、歐陽都護冢、伏波廟、東觀、堯山廟
十六	人物	菩提寺道林和尚、米蘭美績、理光祿、宋顏延之、李給事長歌、李襲誌、衛國公李靖、中書令褚遂良、中書令張九齡、桂州陳都督、袁恕己、張鷟

經過上表的比對，筆者有如下的觀察：

²¹所謂「居處」，在古代指的不只是「家屋」、「住宅」，而是較廣義的建築概念。舉例來說，唐人李嶠《雜詠百二首》組詩中，有一組即為詠「居處」之作。「居處」十首分別是：城、門、市、井、宅、池、樓、橋、舟、車等。見唐·李嶠《雜詠百二首》，收錄於《謝宣城詩集（及其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3-15。



一、《桂林風土記》和《風土記》皆有都邑、山水、風俗、居處、人物的記載，而沒有氣候、歲時、舟車、器物、服飾、飲食、果實、草木、鳥獸、果實、蟲魚、武備的記述。

二、從比例上來看，《桂林風土記》顯然更著重於「居處」和「人物」的記述。在周處《風土記》中，對「人物」的記載只見一條：

陽羨縣令袁起生有神靈，無疾暴亡。殞歿已竟，風雷冥晦，失起喪柩。山下居民夜聞山下有數十人，晨往山上，見起棺柩。俄而潛藏，惟有石冢、石壇今在。²²

雖然只有一條，卻透顯出周處《風土記》之「記人」，同時也夾帶著「志怪」的系統，其闡述了一則頗為靈異的「失棺」故事。這與《桂林風土記》亦頗能呼應。《桂林風土記》中，有兩則顯然可以歸類為「志怪」的記載，分別是〈徐氏還魂〉和〈石氏射樟木燈檠崇〉。前者是死而復生的還魂故事，後者則是器物變形的精怪異譚。而除了這兩則以外，亦有不少篇章籠罩著宗教靈驗或鄉野傳奇的色彩，例如〈菩提寺道林和尚〉、〈桂州陳都督〉等。

《桂林風土記》中「記人」而又「志怪」的書寫方式，一方面呈顯出知識階層獵奇好異之風，另一方面亦揭示了地理方志與志怪故事難以分離的文體關聯。²³然必須強調的是，這些看似詭奇無稽的志怪故事，莫休符始終不忘標舉其徵實性。例如〈徐氏還魂〉一條，在記述本事之前，先從史傳中漢武帝有「神通之異」

²²北宋·李昉編撰：《太平御覽》卷五五〇，《禮儀部·棺》，錄於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98，頁 192。

²³地志與「志怪小說」的關係，請見林淑貞的討論。林淑貞：〈地誌書寫：互為主體性的地景臨現〉，見氏著《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頁 123-170。

的記載寫起，並列舉干寶、蘇泉、崔韶等人皆有妖異撰作，及至唐代丞相牛僧儒亦有《玄怪錄》傳世。一方面，莫休符引述大量文獻資料作為「志怪」的佐證，二方面又標舉「咸通末，莫非目驗，方證不誣」的「目驗」可信度，此亦呼應著書前「補闕」與「錄見聞」的精神。而〈石氏射樟木燈檠崇〉一條，則記述石從武家中爆發惡疾，後發現是家中的「舊使樟木燈檠」作怪，便一箭將之射殺，燈檠化作齏粉，此讓人想及唐人傳奇中一系列的器物精怪的變形故事。²⁴此事固然荒謬，然莫休符在文末，亦註明了此事曾被張文規寫成〈石氏射燈檠傳〉，且石從武確有其人，其子「勛在職，近方去世」。這樣特別強調徵實的寫作方式，亦在〈菩提寺道林和尚〉、〈開元寺震井〉、〈桂州陳都督〉、〈宜州龍開江事〉等條目中屢有呈顯。綜而言之，《桂林風土記》固然有好異尚奇，帶著想像虛構的成分，然莫休符最終仍會以徵實的史傳筆法將之收攝，回應「補闕」而「錄見聞」之宣稱。

周處《風土記》對於「居處」記載，可見兩條。其一是：「(宜興)縣有九亭，今三可識，其六不知其所。」²⁵其二則是：「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一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²⁶《桂林風土記》中，「居處」類則主要分為三類。一是一般的居住空間，如會仙里、遷鶯坊府郭。二是「亭台」類，例如越亭、巖光亭、東出亭、碧潯亭、拜表亭、隱仙亭等。以上二類，在上引周處《風土記》兩條中恰有呈現。而第三類則是廟觀、祠堂、墳塚等，涉及神靈或習俗信仰的「祭祀空間」。此則是莫休符《桂林風土記》特有，並與周處《風土記》不同之處。

²⁴見北宋·李昉編撰：《太平廣記》卷 368-371，「精怪一」至「精怪四」皆「雜器用」類精怪。宋·李昉編撰：《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2926-2946。

²⁵引自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六《常州·景物下》（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 年），頁 71。

²⁶引自唐·徐堅：《初學記》卷二十四《居處部·宅第》（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578-579。

第三節、地景、文士與詩跡



唐代是中國的詩歌盛世，詩的「經典化」也達到了鼎沸。此不只展現於詩歌的蓬勃創作，環繞著「詩」的文本也應運而生。例如王昌齡《詩格》、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等詩話作品，乃至於大量論詩詩的出現，²⁷標舉了詩學理論的建構與發展。而除了詩學理論的相關著作，亦衍生出載錄詩歌「本事」的敘事作品，其中又以孟棻的《本事詩》、范攄《雲溪友議》最具代表性。廖棟樑指出，《本事詩》延續著《孟子》「知人論世」的傳統，強調出作者與時代的必然聯繫。其擁有文學批評的色彩，然另一方面又夾帶著故事性，因此在傳統目錄學上，始終遊移於「詩文評」或「小說」的定位。²⁸而康韻梅則進一步指出，這類作品穿梭於詩序、詩話和小說的邊界，展現其在文體上的多元性。²⁹承繼兩位學者的研究，我們認為與其將《本事詩》、《雲溪友議》這樣的作品歸諸舊有的文類，不如肯認其開出了一種「關於詩的書寫」的體例。換言之，對於「詩」的作者及創作背景的興趣，使得「載錄詩事」的敘事作品浮現；而這一類的作品本身，有時並不見得附庸於詩作，更開展出該文體自身的特點。除了《本事詩》、《雲溪友議》這樣傾向小說的體例以外，有些詩歌及其「本事」也會通過地記的形式被載述下來。這樣的記述，為詩歌創造了書寫的「背景」，例如詩人遊歷城邑、山水的蹤跡，乃至於題記的山壁或建築，有心人亦可藉此尋幽訪勝，考索詩的「本事」。

事實上，地景的吟詠與題記，在中國文學史上屢有所見，也被有意識的記錄下來。舉例來說，《昭明文選》中就列有「遊覽」、「行旅」兩門類，³⁰標誌出最

²⁷關於「論詩詩」，參見朱大銀：《唐代論詩詩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15年）。

²⁸廖棟樑：〈試論孟棻《本事詩》〉，《中外文學》23卷4期（1994年9月），頁172-184。

²⁹康韻梅：〈唐代載錄詩事小說的敘事探究——以《本事詩》、《雲溪友議》為考察中心〉，《漢學研究》26卷4期（2008年12月），頁119-128。

³⁰關於《文選》中〈遊覽〉和〈行旅〉類重疊與差異之處的，請參見王文進：〈南朝「山水詩」中的「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察〉，《東華人文學報》第一期（1999年7月），頁103-114。

晚至南朝，對於山水地景的記述，已經蔚為大盛。而到了唐代這樣的「詩之盛世」，更多文人有意識的在地景上留下「詩跡」。例如白居易曾說「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因有時耶！」³¹柳宗元也有相似的體悟：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勝跡鬱埋，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³²

對白居易和柳宗元來說，地景是靜態的、沉默的；而能讓地景「說話」的方式，只有通過作品發聲——即是寫詩。

唐代地記中，大量載錄詩事者較為少見，《桂林風土記》可謂開其濫觴。而到了宋代，因為交通便利與觀光行旅的發展，地記中出現了許多對於地方詩人與詩歌的記載。四庫館臣論及宋人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時說：

其書采摭繁富，惟取賅博，於列朝人物一一並登，至於題詠古蹟，若張祜金山詩之類，亦皆並錄。後來方志必列人物、藝文者，其體皆本於史，蓋地理之書記載，至是書而史，詳體例亦至是而大變。³³

館臣注意到《太平寰宇記》中，對於詩歌乃至於「題詠古蹟」之事的收錄。而至此書以降，方志多列人物和藝文，實是往史傳的體例趨近。而南北宋之際，由阮閱編定的《詩話總龜》甚至開闢「留題」門類，有近百篇地方詩事的紀載。³⁴而

³¹唐·白居易：〈白蘋州五亭記〉，《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3799。

³²唐·柳宗元：〈邕州作馬退山茅亭記〉，《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454。

³³清·紀昀等：《欽定四庫總目提要》卷六十八，史部二十四，頁2-453。

³⁴南宋·阮閱編撰：《詩話總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171-192。

到了明代以降，諸多商業需求的「遊覽記」出現（如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更對地方名勝的題記、詩事大加渲染。³⁵綜而觀之，地記中的題記、詩事增加，伴隨著「名勝」觀念的興起，此或許和交通旅遊，乃至於遊覽參觀的發展有關。

回頭審視莫休符的《桂林風土記》，其可謂較早的凸顯「名勝」意識，並加入大量詩事的地記著作。其在開篇說明「桂林」郡制沿革時，就引述了張衡的〈四愁詩〉：「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³⁶。此一方面扣合「桂林為郡久矣」的地理沿革考察，另一方面亦揭示出桂林與詩歌的關聯，竟是如此的悠長悠遠。在清人朱彝尊的《曝書亭集》中，卷四十四有《桂林風土記》之跋曰：

《桂林風土記》，唐光化二年融州刺史莫休符撰……雖非足本，中載張固、盧順之、張叢、元晦、路單、韋瓘、歐陽贛、李渤諸人詩，采唐音者均未著於錄。洽聞之，君子亟當發其幽光者也。³⁷

朱彝尊已然注意到，《桂林風土記》中的史料價值，在於保存了許多未被收錄的唐人詩作，例如張固、盧順之、張叢等人的作品。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述及：

今觀諸詩外，尚有楊尚書、陸宏休二首，亦唐代佚篇，為他書之所未載。今《全唐詩》採錄諸篇，即據此本，則其可資考證者，又不止於譜民風、記土產矣。³⁸

³⁵田汝成《西湖遊覽志》與旅遊文化和商業出版的關係，參見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24卷4期（2013年12月），頁93-138。

³⁶漢·張衡著，張震澤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

³⁷清·朱彝尊：〈桂林風土記跋〉，氏著：《曝書亭集》卷四十四（上海：國學整理社，1937年），頁531。

³⁸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史部二十六，頁2-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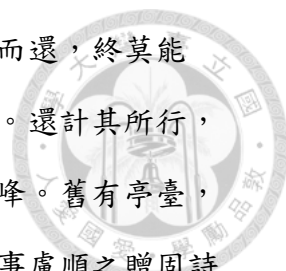
館臣亦提及《桂林風土記》不只如一般地記「譜民風、記土產」，更有對於軼詩的保存。此固然涉及莫休符於《桂林風土記·序》中所言「惟桂林事跡，闕然無聞」的補史、補闕意識，然若我們進一步問：什麼是有價值保存並被載述的「桂林事跡」呢？為什麼特別挑選「詩事」記載？這就關乎莫休符視野中的桂林，乃至其建構想像中的「桂林」的意圖。

睽諸《桂林風土記》現存的四十四條目，一共出現了十五首詩，並以詩歌創作的背景為主要內容。在此，詩的本事被以「地理志」的形式召喚出來，而「詩跡」也就成為後人觀看桂林地方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地景。然而或許有人會追問，這些事蹟是否為真？我們可從莫休符自序中，指出其具有的徵實精神，來保證其書寫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然若依學者淺見洋二的看法，考證詩「本事」是否虛構並無太大意義。他認為，重要的是讀者可以從這些記載中，看出詩作的「不確定性」——詩作的詮釋將隨著「本事」而改變姿態。³⁹基於這個觀點，《桂林風土記》將詩歌鑲嵌於地景之中，並不只影響到詩的詮釋，詩作也同時形塑著地景的風貌。

若將《桂林風土記》中涉及詩事的條目稍加分類，其中載述個人題記的最多，有〈巖光亭〉、〈訾家洲〉、〈碧潯亭〉、〈歐陽都護塚〉等。和詩次之，有〈東觀〉、〈越亭〉等。甚而有〈李給事長歌〉這樣無地景描述，只記一個人，一首長詩的條目。以下就取〈東觀〉一則為例，審視《桂林風土記》如何載述地景與詩事，並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觀在府郭三里，隔長河，其東南皆崇山巨壑，綠竹青松，崆峒幽奇，登臨險隘，不可名狀。有石門似公府之狀，而隘匯。燭行五十步有洞穴，坦平，如球場，可容千百人。如此者八九所，約略相似，皆有清泉綠

³⁹[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岡天千穗譯：《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關於詩與「本事」、「本意」以及「詩讖」〉，頁365-366。



水，乳液葩漿，怪石嵌空，龍盤虎踞，引燭緣涉，竟日而還，終莫能際。相傳云：昔有人好泉石，多束花果裹糧，深涉而行。還計其所行，已及東河之下，如聞棹楫濡濡之聲在其上。又有山外高峰。舊有亭臺，近已摧壞。前政張侍郎名固，大中年重陽節宴於此，從事盧順之贈固詩曰：「渡江旌旆動魚龍，令節開筵上碧峰。翡翠巢低巖桂小，茱萸房濕露香濃。白雲郊外無塵事，黃菊筵中盡醉容。好是謝公高興處，夕陽歸騎出疏松。」張侍郎和詩曰：「亂山青翠郡城東，爽節憑高一望通。交友會時絲管合，羽觴飛處笑言同。金英耀彩晴雲外，玉樹凝霜暮雨中。高詠已勞潘岳思，醉歡慚道自車公。」咸通年，前政張大夫叢遊東觀，詩曰：「巖岫碧潺湲，靈蹤若可攀。樓臺煙靄外，松竹翠微閑。玉液寒深洞，秋光秀遠山。憑君指歸路，何處是人寰。」(頁 2561)

首先，莫休符描述了「東觀」周圍的地理環境，包括崇山巨壑，也突顯出桂林鐘乳石穴「乳液葩漿，怪石嵌空」，以及行人可行於東河之下的特殊地貌。接下來，則帶出了兩組、三位文人的詩作，分別是大中年間，盧順之與張固的「重陽唱和」，以及咸通年張叢的東觀賦詩。莫休符錄下這三首詩的意義，可從「記錄地貌」與「文化活動」的兩個層面來看。首先，這些詩句，輔證了其所敘地景的樣貌。例如「翡翠巢低巖桂小」、「亂山青翠郡城東」、「玉液寒深洞，秋光秀遠山」等，印證「綠竹青松，崆峒幽奇」之不虛，另一方面也用詩意的修辭，烘托了桂林地方的綠與青，幽與奇。其次，這些詩歌展示出此地曾經發生的文化活動。例如「黃菊筵中盡醉容」、「羽觴飛處笑言同」中佳節醉容、賓主盡歡的圖景，乃至於「憑君指歸路，何處是人寰」的樂園仙境想像。

如此一來，地景的描述便不只是地方風物的客觀羅列，更藉由詩句的綴連、文人活動的召喚，賦予地方一層詩意的山水想像。與此相似的書寫方式，在《桂林風土記》中頻頻出現。例如〈訾家洲〉一則，先是述及大河浮洲的地景樣貌，

再提及此地曾發生的各種文人活動：曾有大夫裴行立「造亭宇」、「植花木」、「東風融和，眾卉爭妍」；又有柳宗元「撰碑千餘言」等等。而後，莫休符再述及楊漢公「宴游」之事，及其與陸弘休之賦詩：



桂林雲物畫漫漫，雨裏花開雨裏殘。
惟有今朝好風景，櫻桃含笑柳眉攢。

——楊漢公〈訾州宴游〉，頁 25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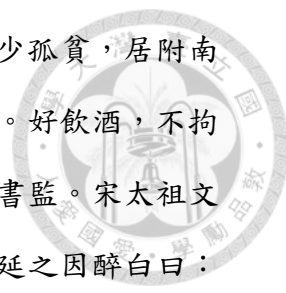
新春蕊綻訾家洲，信是南方最勝遊。
酒滿百分殊不怕，人添一歲更堪愁。
鶯聲暗逐歌聲艷，花態還隨舞態羞。
莫惜今朝同醕酌，任他龜鶴與蜉蝣。

——陸弘休〈和訾州宴〉，頁 2563

這樣的書寫，使得《桂林風土記》不只是靜態的文字，更增添了人的宴游賞玩、唱和賦詩等文化活動。它不只限於描寫風物，更穿越了文字，與地方上實際的景貌互動。人們可以通過閱讀，親自走訪，並在「詩跡」中，體會彷彿與古人同遊的樂趣。《桂林風土記》被今人視為「唐代唯一的一部桂林旅遊指南」，⁴⁰就與這樣的書寫特徵有關。

而另外值得注意的，還有〈獨秀峰〉和〈顏特進〉兩則。這兩則條目與其他載述唐代當朝詩人不同，而是記前代的詩人顏延之：

⁴⁰鍾文典主編：《桂林通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二章，〈秦和大一統下桂林的發展〉，頁 61。



宋顏延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曾祖舍，父顯。延之少孤貧，居附南郭空巷，甚陋，好讀書，無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好飲酒，不拘細行。年三十，尚未婚。起家豫章公世子參軍，累官秘書監。宋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宋氏第三主，昵愛僧惠琳，常獨占一榻。延之因醉白曰：「昔劉盆子尚同參軍乘輿。袁絲正色曰：『此三公之座，豈可以刑餘之人居之！』」延之性方直，言無所迴避。居身清約，不求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與謝靈運以詞彩齊名，而遲速相懸。嘗敕俱入擬樂府，上篇靈運立成，而延之久而方就。帝問其優劣於鮑照，照曰：「謝五言如芙蓉初發，自然可愛。顏詩鋪錦列繡，雕績滿眼。」尋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遇一佳景，必酣醉而還。臨去留錢二百萬與淵明，悉送酒家。及淵明卒，延之為之誄。以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自潘岳、陸機之作，文士莫及顏、謝焉。

——〈顏特進〉，頁 2570-2571

在郭中，居子城正北百餘步。高聳直上，周回一里餘。迴出郭中，下有巖洞。舊有宋朝名儒顏延之宅、讀書亭，嘗賦詩云：「未若獨秀者，嵯峨郭邑開。」後為從事所居。往往見靈精，居者少寧，前政張侍郎廢毀焉。

——〈獨秀山〉，頁 2564

顏延之因被當朝權臣徐羨之排擠，而流寓桂林任職太守。考察今日可見資料，顏延之並無在桂林創作的完整詩篇流傳，唯一留下的只有《桂林風土記》中載述的這則詩句：「未若獨秀者，嵯峨郭邑開。」然顏延之曾在從始安郡（即桂林舊名）歸返京城的途中，寫下〈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詩。此詩被《文選》收編為「行旅」類，詩中除了沿途風景的描述（「水國周地嶮，河山信重復」等），更令人矚目的，是其登高而生的悲哀傷感：「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

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⁴¹而早在顏延之赴始安郡任職的途中，就已寫下〈祭屈原文〉，藉由憑弔同樣流離南方的屈原，抒發遭君王猜忌的憂憤之情。⁴²

然而，這樣的流寓之苦，在《桂林風土記》的記述中彷彿都被隱蔽了。〈顏特進〉一則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先是寫顏延之的性格與生平：包括「少孤貧」、「好讀書」，以及「性方直，言無所迴避」等。必須指出的是，這裡不諱君怒的「直言」，並非劉肅《大唐新語》那樣「極諫」、「直諫」的朝士形象，⁴³而更接近魏晉時文士的風流疏狂⁴⁴——換言之，更著墨於詩人的才氣與風采，而非嚴肅的朝臣形象。第二個部分，則是點出了鮑照對顏延之和謝靈運詩作的評價，以及顏延之與陶淵明的交誼（贈錢、為其寫〈陶徵士誄〉），最後再標舉「自潘岳、陸機之作，文士莫及顏、謝焉」，強調出顏延之作品的價值。若不明白顏延之流寓桂林的讀者，或許會困惑於這則記述與桂林風土的關係。文中提及桂林的段落，只有寥寥的一句：「尋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甚至並無來到桂林以後的紀載，只點出了其經過潯陽，拜訪陶淵明之事。而在〈獨秀峰〉中，莫休符則記下「舊有宋朝名儒顏延之宅讀書亭」，而並未著墨於其流寓的困境。我們可以說，在《桂林風土記》中，作為「朝臣」的流寓之苦被隱蔽，而作為「文士」的風流形象與文采特質被放大了。

承此，若觀察《桂林風土記》載錄之文士官員（請參見附表二），會發現「宦遊文人」佔大多數，而「貶謫文人」與「幕僚文人」次之。而這些「貶謫文人」的描述，大多並不著墨於政治上的失意與落寞，而更強調其展示的文采、休閒及對於當地的文化建設。例如開篇「桂林」，引述張衡的〈四愁詩〉「我所思兮在桂

⁴¹南朝梁·蕭統編選，李善注：《文選》（香港：商務印書館，1960年），頁1310-1311。

⁴²南朝梁·蕭統編選，李善注：《文選》，頁586-587。

⁴³筆者曾撰文討論劉肅《大唐新語》的「匡諫」意涵，並指出其承接的是漢代賈誼《新語》「朝士論政」，而非《世說新語》「文士風流」傳統。參陳柏言：〈匡諫·鑑戒·禮典：論《大唐新語》的政教意旨〉，《思辨集》第19期（2016年3月），頁289-306。

⁴⁴誠如《南史·顏延之傳》中，顏延之自語「狂不可及」，而這亦是顏延之仕途顛簸的原因。唐·李延壽：《南史·顏延之傳》，中研院史語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元大德本，頁879。

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似乎凸顯出詩人對於桂林的嚮往，然若考察此詩背景，翻看《文選》所收此詩小序「時天下漸弊，張衡鬱郁不得志，為《四愁詩》」⁴⁵，則可知莫休符只是凸顯出此詩較美好的部分。另如提及顏延之，則看重期在詩藝上的成就；而對張鷟的描述，則強調《雕龍策》、《帝王龜鏡》、《朝野僉載》等作品的流傳。而柳宗元、皇甫湜則分別只提到「撰碑」之事：「有大儒柳宗元員外撰碑，千餘言猶在」、「有從事皇甫湜、吳武陵撰碑碣二所」。這並不是在說，《桂林風土記》完全忽略了西南流寓之苦，例如對褚遂良的描寫，也述及蒙冤之災；而〈隱仙亭〉中所記李渤〈嘆鳥〉詩，亦有鄉愁餘韻。然而，相對其他紀錄南方邊疆的地記來說，莫休符更有意通過詩歌、詩跡與文士們的文化活動，將桂林塑造成一座文化樂土。

綜而言之，在《桂林風土記》中，風土地景總牽連著文士與詩跡，而打破了西南在人們刻板印象中「偏荒」、「險絕」，而塑造出「園林」般的樂土樣貌。如果說《本事詩》是對於詩歌創作現場的補充，則《桂林風土記》便是通過文人活動和詩歌創作，賦予桂林風土以歷史、文化乃至於情感的縱深。《桂林風土記》不只增添作品本事、讓詩歌「故事化」，同時也創造出了文學地景。⁴⁶借用宇文所安討論中唐詩人時所說的：

詮釋智慧的力量不僅侷限於園林。機智是便攜性的，把其他地方也變成對園林這一人為建構的私人空間的模擬。這裡，重要的是記住，有關私人天地的詩是公共性的；它是給朋友們，以供流傳流通閱讀的。詩歌展示的對象不是園林，而是詩人自己……詩人不僅只在公務餘暇時才登臨此山，而且，他很快就會聚了一批驚嘆的觀眾，構築了一個以詩人為關

⁴⁵南朝梁·蕭統編選，李善注：《文選》，頁 639。

⁴⁶相關討論可見張蜀蕙：〈南宋筆記、方志、地理書與地誌文學景觀、詩跡形成〉，宣讀於「2016 年宋代國際研討會：筆記與宋人的知識建構」。

注中心的有限空間。在眾目睽睽之下，山野成了園林。⁴⁷



宇文所安認為，中唐以後的詩人開始將注意力放到微末的事物上，使其展現出「溢餘」的價值。而所謂「機智」，則與「個人性的詮釋」有關。詩人展示機智之處，並不在於生死等等「大議題」，而更與日常生活樂趣連結，並將地景通過詩歌，建築成私人卻又帶有公共意義的空間。在《桂林風土記》中，機智並不只展示在詩歌的創作，更在於對地景的勾描與詮釋。在此，「詩跡」可謂對地景「詩意的占有」。此不只是文學審美的層次，同時是文化形象的建制，乃至於對桂土風土的銘刻與塑造。本文認為，《桂林風土記》翻轉了人們一般對於「西南」蠻荒的想像，而通過詩跡與文士活動的連綴，將中土地區的文人化框景，移植到桂林，並進而構築出一幅別有洞天的西南「園林」敘事。⁴⁸

⁴⁷[美]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機智與私人生活〉，《中國「中世紀」的終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頁88-89。

⁴⁸中國「園林」書寫，近年頗受學者的關注。本文將《桂林風土記》中的「桂林」視為一處「園林」，採取的是較為寬鬆的定義。即文人通過詩意的占有（宇文所安語），將生活中所見的環境變成「自然道場」。其開顯出的是兼具精神與感官層面的美學，也是具備倫理意涵的修養工夫。莫休符所見的桂林，與《桂林風土記》中的「桂林」，不只是「現實」與「文本」的再現關係，更產生了相互對話、相互定義的可能。參見劉苑如主編：《生活園林：中國園林書寫與日常生活》，〈導論〉（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3年），頁I - XIV。

第四節、史跡、神跡與文明之地



莫休符自述創作動機時，已闡述「桂林事跡，闕然無聞。休符因退居，粗錄見聞」的補史意識。在上一節，筆者探討了《桂林風土記》中，收錄了大量詩歌，以及詩歌所牽動的文人活動，諸如題記、宴游、唱和等等。莫休符有意識的削弱「流寓」邊疆的悲苦印象，而打造許多「詩跡」勝景，賦予桂林山水一層文人的樂土想像。而除了「詩跡」的記述，莫休符亦在書中載錄了不少當地的文化遺跡。這類文化遺蹟大抵可以分為兩種。其一是亭台，包括越亭、巖光亭、東出亭、碧潯亭、拜表亭、隱仙亭等。亭台往往是文人們娛玩、題詩的空間，此在前文亦有論及。其次，則是帶有地方信仰色彩的祭祀空間，包括張天師道陵宅、舜祠、雙女冢、歐陽都護冢、伏波廟、東觀、堯山廟等。此間值得注意的是，《桂林風土記》中出現了許多「舜帝」巡遊的記述。在全書開篇第〈桂林〉一條即云：

按《地理志》，桂州，《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越亡國時服於楚，秦始皇三十三年，發逋亡、贅婿、賈人，掠取陸梁之地為桂林。吳時文士薛宗言：昔帝舜南巡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

——〈桂林〉，頁 2560

而後又有三條論及帝舜之事，羅列如下：

舜祠在虞山之下，有澄潭，號皇潭。古老相承言，舜南巡曾遊此潭。今每遇歲旱，張旗震鼓，請雨多應。中有大魚，遇洪水泛下，至府東門河際，有停客巨舫，往往載起，然終不為人之害。舊傳舜葬蒼梧丘，在道州江華縣九疑山也。

——〈舜祠〉，頁 2561



在府城北十里，俗傳舜妃尋帝，卒而葬於此。冢高十餘丈，周迴二里餘。

——〈雙女冢〉，頁 2561

在府之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望，遂名堯山。山有廟，極靈，四時公私饗奠不絕。北接湖山，連亘千餘里。天將降雨，則雲霧四起，逡巡風雨立至。每歲農耕候雨，輒以堯山雲卜期。

——〈堯山廟〉，2563

文中記載舜「南巡」之事，可以聯繫到《史記·五帝本紀第一中》提到，舜在繼承堯之大位前，就展開了「南巡狩」的活動：

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辯於羣神。揖五瑞，擇吉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於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後四朝。⁴⁹

而舜在繼帝位三十九年後，再次南巡，最後「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⁵⁰。

⁴⁹漢·司馬遷著，瀧川龜太郎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一，〈五帝本紀第一〉（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 31-32。

⁵⁰漢·司馬遷著，瀧川龜太郎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一，〈五帝本紀第一〉，頁 38

由上可知，舜兩次的「南巡狩」，乃至於蒼梧崩殂，成為了廣西桂林地區，堯舜信仰的來源。堯帝甚至未曾履及蒼梧，卻仍有因與舜祠相對，而將當地山嶺命名為「堯山」之事。⁵¹吳永章已點出，《桂林風土記》中〈舜祠〉與〈堯山廟〉兩條，反映出傳說人物堯、舜與南方民族的密切關係。⁵²事實上，對於「舜」的標記、在許多南來文人的創作中都頗為常見，而於舜廟的石刻也成為著名的文化地景。例如永州二妃廟有柳宗元〈湘源二妃廟記〉、舜廟則有張九齡〈祭舜廟文〉、元結〈舜祠表〉與〈舜廟狀〉等。⁵³

誠如陳泳超指出，堯舜傳說所帶來的總體印象，是聖君賢臣、太平盛世的典範，而《堯典》、《皋陶謨》、《五帝本紀》、《夏本紀》的隆重其事、細如目見，更讓人嚮往那是一個難以企及的黃金時代。⁵⁴《桂林風土記》從開篇就拉連「昔帝舜南巡蒼梧」之事，試圖將桂林的歷史記憶向堯舜追溯，可謂使得位處西南偏荒的桂林，頓時有了悠久的文化傳承。從《桂林風土記》看來，堯舜的歷史人物形象有神格化的傾向。每遇歲旱，民眾便祭祀以求降雨，且頗為靈驗。⁵⁵可見堯舜的崇拜，不只是單純的祭祀活動，更與當地百姓的農事乃至於日常生活密切相關。進一步說，莫休符通過「蒼梧」這個帶有豐富意義的古老地號，⁵⁶以及廟宇史跡

⁵¹除了《桂林風土記》中〈堯山廟〉條目，亦可見樂史《太平寰宇記》：「堯山在府城東北四十四里。按史傳堯封履不到蒼梧，以其西與舜祠相對，邑人慕堯之風，遂名為堯山。」北宋·樂史著，王文楚等校注：《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3102。

⁵²吳永章：《中國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題解》，頁41。

⁵³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40。

⁵⁴陳泳超：《堯舜傳說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25。

⁵⁵孫軍輝指出，唐代的司雨神頗眾，除了最普遍的山川神和龍神，人們相信有靈跡處皆可祈雨，如祠堂等，而已故的官員亦可成為祈雨的神祇。見氏著：〈唐代社會祈雨活動探析〉，《湖北社會科學》第10期（2009年），頁120-121。

⁵⁶除了上引堯舜的段落，《桂林風土記》中另有二處提及「蒼梧」之名。一是〈宜州龍開江事〉「合蒼梧耆老盡知之」，二是〈隱仙亭〉所記李渤〈嘆鳥〉之詩：「隨雲不厭蒼梧遠，似雁逢春又北飛」。

與典籍傳說的勾連印證，使得桂林成為民族神話與聖人形跡曾經巡歷過的南方。

除了堯舜祠廟以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是對於東漢伏波將軍馬援的紀載。在《桂林風土記》中，即出現以下兩則紀述：

伏波廟在郭中之東北二里，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之祠也。

——〈伏波廟〉，頁 2561

全義縣漓、湘二水分流處。相傳曰，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川濬濟，水急曲行回互，用遏其衝，節節斗門，以駐其勢。有伏波廟在縣側。又按後漢鄭弘奏，交趾七郡貢錢，從東泛海多沒溺，請開桂嶺靈渠，後御史史祿重開闢。又按前漢武帝元鼎五年，命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仆、戈船將軍巖助擊南越，呂嘉戈船出零陵，下灘水。此則前漢嶺首已通舟楫，明矣。焉得至後漢馬援、鄭弘，始開靈渠？於理未盡。言馬、鄭重修則可，云創闢於義有乖。休符駁。

——〈靈渠〉，頁 2566

施鐵靖研究指出，秦漢以降，凡到過廣西的古代將領，對當地社會民間影響之深遠，無一人能超過東漢名將馬援。唐僖宗乾符二年（西元 875 年），馬援更被敕封為王，在廣西立廟祭祀。⁵⁷馬援與中國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來密切，例如記載唐代南詔風土與歷史的《蠻書》，亦多有馬援遺址的記述。⁵⁸另如李翱〈準制祭伏波神文〉，祭文中即有「破斬徵側，實平交趾。來往蠻谿，未卒而死」⁵⁹、強調

⁵⁷施鐵靖：〈馬援在廣西〉，《河池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二十三卷第三期（2003 年 9 月），頁 40。

⁵⁸見本論文第三章對樊綽《蠻書》的討論。

⁵⁹清·董誥《欽定全唐文》卷六四〇（台南：經緯書局，1965 年），頁 834。


其征伐蠻族的表述。范玉春考察指出，唐代伏波廟祭祀的主神有路博德或馬援兩種說法，然伏波信仰會在廣西流行，實是因為馬援崇拜的興起。⁶⁰《桂林風土記》中標誌伏波廟所祭之神為馬援，更佐證了這一點。莫休符在〈靈渠〉這一條目中，再次提及馬援。然卻是為了辯駁，靈渠並非後漢馬援、鄭弘所開，而早在前漢進攻南越時，就己能通船。⁶¹於此，不僅再次符應莫休符撰作的徵實性，同時也可看出馬援對桂林當地的影響遠佈。馬援即使並非第一個開闢渠道之人，然百姓對於「伏波」的崇拜，實正指向了對於「治理」與「秩序」嚮往，其背後仍預設著桂林不再是「化外之地」，而是被中原文明覆蓋的地域。

《桂林風土記》中，除了堯舜、馬援這樣由歷史人物轉向民間信仰的記載，亦有不少神異之事的記錄。此大抵可以分為三類。其一是神仙或神龍蹤跡，例如〈灘山〉中記載「龍朔中曾降天使，投龍於此」（頁 2563）、〈會仙里〉載「舊有群仙於此」、〈隱山〉載「時見龍跡，大如碗」、〈如錦潭〉載「潭中時聞音樂，如大府廣筵」（頁 2567）、〈象州仙人山〉載「多有神仙聚集」（頁 2567）等。其二是奇人異事，如〈張天師道陵宅〉載「廟中有美異果時，有人食之，無患。唯不可採取，必致禍也」（頁 2566）、〈菩提寺道林和尚〉載異僧送金函之事（頁 2567）、〈徐氏還魂〉載女子還魂後具備「吉卜兇惡」、「述善惡」的本領（頁 2568）、〈桂林陳都督〉載異人堪輿、地產金筍之事（頁 2572）等。其三是鬼怪作亂，如〈歐陽都護塚〉載「鬼兵填土」之事（頁 2565）、〈石氏射樟木燈檠崇〉載精怪變形（頁 2569）等。其中又以神仙或神龍蹤跡最多，奇人異事次之，而鬼怪作亂最少。

從這些記述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桂林當地，同時保持萬物有靈，以及佛道混合的信仰習俗。《桂林風土記》特別錄之，此間固然有補闕的筆法，乃至於

⁶⁰范玉春：〈馬援崇拜的地理分布：以伏波廟為視角〉，《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十三卷第三期（2007年6月），頁 101-105。

⁶¹在近代出土的竹簡文獻中，證明《淮南子》、《漢書》中所謂秦人鑿渠通糧之渠，即為靈渠。見張孝南：〈秦鑿靈渠新證〉，《廣西水利水電》第5期（2010年），頁 84-86。



文人獵異好奇的心理。然另一方面，在這些看似神異的現象中，莫休符常常有意賦予教化之意涵。例如〈桂州陳都督〉中，載錄太宗朝時的博士呂才「博涉群書，該通眾藝」，其撰作《陰陽吉凶》、《地理要訣》等陰陽堪輿之書。莫休符隨後又稱：「愚以為呂氏多才多學，博古辨今，不欲世人曉達陰陽，輒恃年命，罔拘慎。博前知，遂立斯言，以節逾僭」。此條是為了說明桂林「異人」堪輿之奇術，然莫休符卻拉引呂才的案例，點出了「博前知，遂立斯言，以節逾僭」的教化意義。又例如〈開元寺震井〉，載述當地寺廟以羊肉祭祀，乃至水井坍方之異事。然莫休符卻藉此強調因果報應之重要性，並引述孔明之言「勿以惡小而故為，勿以善小而不為」，說明「以神祇為證，則終身不居有過之地」的道理。

第五節、建構「桂林」：《桂林風土記》及其餘響



《桂林風土記》是第一部以桂林地區為範疇的地記書寫。通過上文的討論，可以指出此書與一般「南方」地記的差異之處，在於作者莫休符通過詩跡、史跡與神跡的記述，翻轉了人們對於西南蠻夷的刻板印象，進而將桂林形塑為一處富有歷史淵源和文化典故的文人園林。而本節將進一步檢視其餘響，通過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人張鳴鳳《桂勝》、《桂故》這兩組同樣以桂林為書寫對象的地理著作為案例，指出其中存在的既成視角及承衍關係。限於篇幅，本節仍將以《桂林風土記》為參照的主軸，藉此關照「桂林」的形象如何在歷代文人的筆下形塑。

（一）以志代詩：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後代學者對於范成大的關注，多聚焦於其「使金」的政治身分及詩詞創作，卻較少人注意其地理著述方面的成就。范成大畢生宦遊奔波，身心摧殘，飽受疾病之苦。故晚年返鄉時，便浮升為故鄉蘇州寫志，「彰一邑之盛」的念頭，而撰成《吳郡志》。此作部頭浩繁，展現了范成大的懷鄉之情與為學態度，亦彰顯出宋代方志體制的成熟。⁶²而根據范成大自己的記述，其於宋孝帝乾道八年（1172），抵達知靜江府（即桂林），歷任二年後受詔離職，於淳熙二年（1175）入蜀途中，追懷桂林之事，而寫下《桂海虞衡志》。相較於《吳郡志》之廣博精嚴，此作顯得較為隨興瑣碎。⁶³較不似宋代體志浩繁的地志，而更傾向前代地記或博物志的色彩。書中內容凡志巖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獸、志蟲鳥、志花、志果、志草木、雜誌、志蠻，共十五門類。其中志酒最少，僅有兩則；而

⁶²范成大《吳郡志》的相關討論，見邱詩倫：《范成大《吳郡志》研究》（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古典文獻組碩士論文，2013年）。

⁶³范成大於此書序中，也自言「瑣碎」。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廣校注：《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頁1。

志果最多，有五十七則。⁶⁴關於此作的為書動機與用意，范成大於〈序〉中有頗詳盡的交代：



始余自紫薇垣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為戚。余取唐人詩考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至，以湘南江山勝於驂鸞仙去。則宦遊之適，寧有逾於此者乎？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既至郡，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而巖岫之奇絕，習俗之醇古，府治之雄勝，又有過所聞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侮。歲比稔，幕府少文書，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詔徙鎮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別，民觴客於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航瀟湘，絕洞庭，溯澗瀨，馳驅兩川，半年達於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遊，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載者，萃為一書。蠻陬絕僥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土訓之圖。噫！錦城以名都樂國聞天下，余幸得至焉。然且滯滯於桂林，至為之綴緝，瑣碎如此。蓋以信余之不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名都樂國，而猶弗忘之也。淳熙二年長至日，吳郡范成大至能書。⁶⁵

在這段序言中，有兩點值得注意：

其一，范成大對於桂林印象的改變，可分為三個階段。在最早時期，范成大對於西南的印象，來自於親友「以炎荒風土為戚」。而後，其取唐代詩人白居易、杜甫、韓愈之詩作對讀，發現在詩人的筆下，幫地「宜人」且「無瘴」，應是宦

⁶⁴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廣校注：《桂海虞衡志輯佚校》，頁 50-52、123-149。

⁶⁵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廣校注：《桂海虞衡志輯佚校》，頁 1。

遊之樂境。而到了桂林，發現山水盛景、乃至於土人風俗純樸，更較文字紀錄為勝，「又有過所聞者」。在此，范成大將記憶裡的詩歌「文本經驗」，轉而符應「現實經驗」，而形塑出桂林「風氣清淑」、令他難以忘懷的樣貌。

其二，是其撰作此書的動機，乃是「念昔遊」，「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此一方面是通過地景與風物的記述，補足「凡方志所未載」之闕；然另一方面，也來自於「念」的驅動，將遊歷桂林的記憶，銘刻於地景風物之中。在此意義上，《桂海虞衡志》便不只具有地志廣博知識、記錄沿革的功能，更透顯出范成大的追懷與遷移心境，而帶有抒情的成分。對此，《四庫提要》對此書的觀察頗為精當，引述如下：

成大《石湖詩集》，凡經歷之地，山川風土，多記以詩。其中第十四卷，自註皆桂林作，而詠花惟有《紅豆蔻》一首，詠果惟有《盧橘》一首，至詠遊覽，惟有《棲霞洞》一首，《佛子巖》一首。其見於詩註者，亦僅蠻茶、老酒、蚺蛇皮腰鼓、象皮兜鍪四事，不及他處之詳。疑以此志已具，故不更記以詩也。⁶⁶

館臣點出了相較於其他游宦之地，范成大《石湖詩集》關於桂林的詩歌相對稀少，或許緣於已有此志，「故不更記以詩也」。換言之，《桂海虞衡志》於范成大的意義，或可看作「以志輔詩」，甚至「以志代詩」了。

綜觀全書，我們可以輕易發現范成大對於桂林的讚賞與偏愛，在其記述中屢番呈顯。例如在〈雜誌類〉中，便通過天候及地理現象，以「獨」與「惟」字，勾勒出桂林的特質：

⁶⁶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二十六卷地理類三（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896。

雪：南州多無雪霜，草木皆不改柯易葉。獨桂林歲歲得雪，或臘中三白，然終不及北州之多。靈川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巖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送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⁶⁷



風：廣東南海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桂林多風，秋冬大甚，拔木飛瓦，晝夜不息，俗傳「朝作一日止，暮七日，夜半則彌旬」。去海猶千餘里，非颶也。土人自不知其說，余試論之。桂林地勢視長沙、番禺，在千丈之上，高而多風，理固然也。⁶⁸

瘴：二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薰之所為也。其中人如瘡狀，治法雖多，常以附子為急須，不換金正氣散為通用。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毒。⁶⁹

而全書的開篇〈敘巖洞〉，更以長篇幅敘及桂林之山「天下第一」：

余嘗評桂山之奇，宜為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閑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撫幽薊，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嶽、廬阜皆崇高雄厚，雖有諸峰之名政爾魁然大山峰云者，蓋強名之，其最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雁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峰而止耳，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

⁶⁷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廣校注：《桂海虞衡志輯佚校》，頁 167。

⁶⁸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廣校注：《桂海虞衡志輯佚校》，頁 168。

⁶⁹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廣校注：《桂海虞衡志輯佚校》，頁 169。

必因重岡復嶺之勢，盤互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筍瑤簪，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為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宗元《訾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黃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平池蒼玉忽嵯峨。」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頃嘗圖其真形，寄吳中故人，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中空，故峰下多佳巖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遍至，今推其尤者，記其略。⁷⁰

欲言天下第一，必得與其他盛景相比。范成大通過自己的出身背景，乃至於宦途遊歷的經驗，指出桂林山勢之奇，在於「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筍瑤簪，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為天下第一」。從現實的地理經驗著眼，而後又拉引韓愈和黃庭堅之詩，以及柳宗元《訾家洲記》的句子，說明「桂山之奇」。此與〈序〉中的敘事方式相類似，皆通過詩人的文句，與自身的經驗加以混合；彷彿桂林之「奇」不只在於眼前，更縱貫古今士人之心。此不只將山水與詩歌相互比附，而是直接通過地景的銘刻，提煉出桂林詩意的質素：山即是詩，而詩即是山——此呼應著《提要》的觀察：《桂海虞衡志》正是范成大通過地志，取代詩歌之作。

（二）詩的風土：張鳴鳳的《桂勝》與《桂故》

相較於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人張鳴鳳的《桂勝》與《桂故》顯然更系統化的將桂林形塑為一方「詩的風土」。此書的作者張鳴鳳甚有詩才，然其散文著述的成就與價值更高。在《桂勝》、《桂故》之前，張

⁷⁰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廣校注：《桂海虞衡志輯佚校》，頁167。

氏已著有《漕書》、《西遷注》二書。前者講述漕運主張，文學價值不大；後者則寫作者自利州(今四川廣元市)還京，沿途五十餘日的見聞。其中除了地方風物、習俗的描摹，更不時拉引典故，豐富其著作的內涵和趣味性。⁷¹而《桂勝》、《桂故》則成於明萬曆年間，是張鳴鳳應友人劉繼文邀約而作。根據學者的考察，《桂勝》、《桂故》雖有先後之別，實當互補，合為一書。⁷²《桂勝》、《桂故》共二十四卷。前十六卷為《桂勝》，後八卷為《桂故》。

《桂勝》與《桂故》合為一集，所記內容頗有差異，依劉繼文序中所言：「前十六卷為《桂勝》，志勝概也；後八卷為《桂故》，志故實也。」⁷³考察二者，會發現《桂勝》是以桂林名山為主要座標，並旁涉江、溪、渠、洲等勝景，而後繫以詩人佚事以及相關的詩作和題記。而在每一則最後，張鳴鳳皆會標註「灘山人曰」，對其景其人加以評述補充。

《桂勝》書前有凡例五條，張鳴鳳說明此作的編排方式及撰作動機。張鳴鳳言：「詩文而外具書題名，以前賢用意在焉，蓋流光易邁，盛名難延，不假名山，何可長也？識其意，故重其事。」⁷⁴又言：「諸山文字堇載唐宋，以年代漸遠，壁鏤多滅，故亟取志之。」⁷⁵由這兩條凡例，可以看出張鳴鳳皆意識到了「時光易邁，盛名難延」、「年代漸遠，壁鏤多滅」的問題。在此，他將詩人、詩文與諸

⁷¹關於張鳴鳳的著述及簡介，參杜海軍、閻春：〈張鳴鳳及其桂勝與桂故〉，收錄於明·張鳴鳳著，杜海軍、閻春點校：《桂勝桂故》（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1-9。

⁷²關於張鳴鳳的著述及簡介，參杜海軍、閻春：〈張鳴鳳及其桂勝與桂故〉，收錄於明·張鳴鳳著，杜海軍、閻春點校：《桂勝桂故》，頁10。今所見諸版本之《桂故》相對完整，而《桂勝》在流傳的過程中則屢有殘缺。直至閻春2012年赴日訪學，方得見定稿本，並證實是明代抄本。故此書的完整點校版本，直到2016年才出版，故關注的學者仍然不多。關於文獻與版本問題，詳見杜海軍、閻春：〈《桂勝》《桂故》定稿本的發現及意義〉，《文獻季刊》第三期（2012年7月），頁27-36。

⁷³明·劉繼文：〈桂勝序〉，收錄於明·張鳴鳳著，杜海軍、閻春點校：《桂勝桂故》《桂勝桂故》，頁4。

⁷⁴明·張鳴鳳著，杜海軍、閻春點校：《桂勝桂故》，頁10。

⁷⁵明·張鳴鳳著，杜海軍、閻春點校：《桂勝桂故》，頁10。

山繫連，甚至認為對於諸山文字的記錄，更較地景優先。其透顯出對於消失、抹滅的恐懼——那竟意味著「桂林」的消失。換言之，張鳴鳳所記述的桂林，從一開始就不只是對現實地景的保存，更重要的是，其收納著那些與地景無法分離獨存的文字。而張鳴鳳在〈書桂勝後〉，亦再次發出相似的宣言，指出：「抑山雖神，不能自言；文無脛，不能自至，余何由得寓目哉？」⁷⁶換言之，張鳴鳳認為桂林的地景與文人題記、詩跡，永遠是相互依存的。

而《桂故》則以地方沿革與故舊的記述為主。除了前二卷「郡國」、「官名」交代桂林地方與官制的沿革，其後六卷，寫的皆是桂林故舊人物。而收錄人物的標準為何呢？在卷三〈故政上〉中的「灑山人曰」中，張鳴鳳有如下表述：

唐諸先政，若王暉、裴懷古、韓欣三四公，或愛利著於屯田，或信順格於黠賊，功庸茂矣，乃棄不露，顧歆李、元之經營，任、吳之序記者何？曰此志《桂勝》，非循吏傳也。夫隱山、南溪顯於西南，疊綵、寶積光於東北，繫二公是賴哉？⁷⁷

由這一段話，可以看出張鳴鳳決定人物收錄與否，並不只在其人的政教得失（直言此書「非循吏傳」），而更關乎人物的其他表現——質言之，指的顯然就是對於桂林的文化建設或文學才華。查看此前記載，張鳴鳳所言李、元，分別指的是李渤和元晦，而任、吳指涉的則是任華與吳武陵。根據《桂故》所述，李渤「開隱山，疏南溪」，並有南溪詩及序；而吳武陵是李渤下屬，著有〈新開隱山記〉等作。元晦在疊綵、寶積山上分別建築亭院，並有詩作。而張鳴鳳對任華的評價則是「其詩尚奇」。⁷⁸張鳴鳳再次扣合《桂勝》「抑山雖神，不能自言；文無脛，不能自至，余何由得寓目哉」之意，強調出隱山、南溪、疊綵山、寶積山等地景之

⁷⁶明·張鳴鳳著，杜海軍、閻春點校：《桂勝桂故》，頁 251。

⁷⁷明·張鳴鳳著，杜海軍、閻春點校：《桂勝桂故》，頁 279。

⁷⁸明·張鳴鳳著，杜海軍、閻春點校：《桂勝桂故》，頁 272-279。

光顯，正有賴於這些文人的記述。文與景，不只相輔相成，更是同死共生。

若與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比觀，可以明顯看出張鳴鳳《桂勝》和《桂故》受其影響之處。在《桂勝》中，張鳴鳳多次引用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明言者蓋十八處，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者則有十五處，且二者大抵重疊，包括獨秀山、灘山、伏波山、七星山（棲霞洞）、疊綵山、虞山、堯山、訾家洲等。而在《桂故》中，雖未逐條注解來處，卻在卷三〈先政上〉中載錄了莫休符。除了引《桂林風土記》的序言交代莫休符的官職，更闡明「以《桂勝》多引其書，故附之傳末。」⁷⁹此外，其在《桂故》中引述的唐代人物事蹟，亦多承襲《桂林風土記》的記載。除了上述的李渤、元晦、吳武陵等，尚有盧匡、楊漢公、張固等，且皆強調其人詩才及與地景的關聯。

綜而觀之，張鳴鳳的《桂勝》和《桂故》，不只承繼了《桂林風土記》記載的內容，亦承接著莫休符形塑桂林的書寫模式。《桂勝》中，以山川勝景為記述中心，並特別標舉詩跡、題記與文人遊蹤，強調出「山」與「文」的相互定義與宣揚；而《桂故》則從故舊人物的角度，帶出了桂林的文化景觀與詩歌記憶。若回頭審視范成大《桂海虞衡記》，則我們可以指出，「詩」顯然是文人們掌握桂林風土的重要關鍵。而此在《桂林風土記》中已然發軔，莫休符形塑了桂林的「文學風景」，並持續影響著後人對於桂林的想像。

⁷⁹明·張鳴鳳著，杜海軍、閻春點校：《桂勝桂故》，頁 278-279。

第六節、小結

《桂林風土記》撰成的許多年後，南宋詩人王正功在桂林的獨秀山，留下「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句。⁸⁰《桂林風土記》中，亦列有「獨秀山」條目，稱此山「直聳五百餘尺，周回一里餘」，並記述顏延之曾在此讀書，留下「未若獨秀者，嵯峨郭邑開」的詩句。若與桂林地景結合來看，則「桂林山水甲天下」不僅與山名「獨秀」互涉，更拉連出人們對於桂林山水的記憶和想像。桂林作為一座「譽滿中外的山水城市」，⁸¹固然與其自然景觀有關，然而其「經典化」，卻必是在歷史洪流中緩慢形塑而成的。

本章並不意圖對「桂林」的形象或歷史發展，做出完整的描述考察。一方面是篇幅有限，另一方面，這樣的民族史、地方史沿革的研究工作，已有相對豐富的成果。⁸²本文之所以聚焦莫休符的《桂林風土記》，最重要的目的，與其說是探勘「桂林何以成為今日之桂林」，不如說是以其為個案，通過細讀的方式，抉發唐方南人對於「南方」的想像與形塑的不同面向。相較於前兩章談述的《北戶錄》、《蠻書》，這樣站在中土和官方立場的北人著作，《桂林風土記》所呈現的，是從「內部觀點」展示的「南方」。此間的辯證性，更透顯出所謂的《北戶錄》或《蠻書》等命名，乃至其羅列的風物知識，並非天生如此，而是通過作者的視野（涉及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通過文字的編排逐漸形塑而成。

曾有學者討論《桂林風土記》時，指認其與唐代其他風土作品，如《北戶錄》、《嶺表錄異》等相似，「明顯地承繼了漢魏六朝以來志異志怪一派地志的傳統。」⁸³此固然有其判斷的依據，然卻只是看見了文本表面的相似之處。確實，《桂林

⁸⁰林京海主編：《桂林文物古迹覽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桂林獨秀峰摩崖石刻〉，頁297-298

⁸¹張益桂：《桂林名勝古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

⁸²鍾文典主編：《桂林通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張益桂、張家璠著：《桂林史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

⁸³辛德勇：《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頁286-288。

風土記》亦有志怪獵奇的成分，然若細加考察，還是可以窺見《桂林風土記》與前朝著作很大的不同之處。最重要的差別，便在於作者的書寫立場，並不是採取偏見或獵奇的視角，而是根據南人的「內在觀點」來形塑桂林，此是必須標舉分辨的。

緣此，睽諸《桂林風土記》，可以發現莫休符固然述及桂林的自然風物、山川水文，然明顯更著重於人文事蹟。通過與前代作者周處《風土記》的比較，可以發現「居處」和「人物」兩類，是《桂林風土記》主要描寫的內容。前者包括廟觀、祠堂、墳塚、亭臺、渠道、宅邸等人造建築，而後者則涉及文人創作、文化活動、官員佚事、歷史事蹟等等。相對於《北戶錄》承接的「異物」系統，或者《蠻書》那樣帶有官方色彩的治理與劫餘之書，《桂林風土記》更透顯出中晚唐文人，著眼於日常生活的閒散與巧思。⁸⁴《桂林風土記》與前代、乃至於中晚唐大量出現的南方「異物志」不同，而更接近中土地區常見的「耆老傳」、「耆舊記」的傳統。⁸⁵莫休符不僅通過詩句來印證其所記述的風土，也藉由詩作去形塑風土。此外，作者顯然有意遮蔽流寓西南之苦，而更強調士人的文化活動與閒適色彩。莫休符通過詩跡、史跡與神跡的記述，翻轉了人們對於「西南」的普遍想像；「桂林」不再是「化外之地」，而是舜帝曾經南巡、富有歷史文化之文明所在。

⁸⁴宇文所安指出，中唐以後，文人的寫作興趣有朝「個人化」與「發現日常」發展之傾向。見[美]宇文所安著，陳引馳等譯：《中國「中世紀」的終結》，頁 1-90。

⁸⁵最著名如東晉史家、文學家習鑿齒的《襄陽耆舊傳》，其所記載的人物，多以文學、政事著稱。參見東晉·習鑿齒著，王惠賢校補：《校補襄陽耆舊記》（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87年）。

附錄一、《桂林風土記》所錄詩作



條目	作者	詩名	詩句
桂林	張衡	四愁詩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
東觀	盧順之	重陽東觀席上贈侍郎張固	渡江旌旆動魚龍，令節開筵上碧峰。 翡翠巢低巖桂小，茱萸房溼露香濃。 白雲郊外無塵事，黃菊筵中盡醉容。 好是謝公高興處，夕陽歸騎出疏松。
東觀	張固 盧順之	重陽宴東觀山亭和從事	亂山青翠郡城東，爽節憑高一望通。 交友會時絲管合，羽觴飛處笑言同。 金英耀彩晴雲外，玉樹凝霜暮雨中。 高詠已勞潘岳思，醉歡慚道白車公。
東觀	張叢	游東觀山	巖岫碧孱顏，靈蹤若可攀。 樓臺煙靄外，松竹翠微間。 玉液寒深洞，秋光秀遠山。 憑君指歸路，何處是人寰。
越亭	元晦	除浙東留題桂郡林亭	紫泥遠自金鑾降，朱旆翻馳鏡水頭。 陶令風光偏畏夜，子牟衰鬢暗驚秋。 西鄰月色何時見，南國春光豈再游。 莫遣豔歌催客醉，不堪回首翠娥愁。
越亭	路貫	和元常侍除浙東留題	謝安致理逾三載，黃霸清聲徹九重。 猶輟珮環歸鳳闕，且將仁政到稽峯。 林間立馬羅千騎，池上開筵醉一鍾。 共喜甘棠有新詠，獨慚霜鬢又攀龍。
越亭	元晦	越亭二十韻	乏才叨八使，徇祿非三顧。

			南服頒詔條，東鄰證迷誤。 未聞述職效，已見脫煩趣。 顥氣爽衣巾，嵐颺輕杖履。
巖光亭	元晦	巖光亭五十韻	石靜如開鏡，山高若聳蓮。 筍竿抽玉管，花蔓綴金鈿。
訾家洲	楊漢公	訾州宴游	桂林雲物畫漫漫，雨裏花開雨裏殘。 惟有今朝好風景，櫻桃含笑柳眉攢。
訾家洲	陸弘休	和訾州宴	新春蕊綻訾家洲，信是南方最勝遊。 酒滿百分殊不怕，人添一歲更堪愁。 鶯聲暗逐歌聲艷，花態還隨舞態羞。 莫惜今朝同酩酊，任他龜鶴與蜉蝣。
碧潯亭	韋瓘	留題桂州碧潯亭	半年領郡固無勞，一日為心素所操。 輪奐未成繩墨在，規模已壯閶闔高。 理人雖切才長短，薄宦都緣命不遭。 從此歸耕洛川上，大千江路任風濤。
歐陽都 護冢	歐陽臈		舊業分明桂水頭，人閑業盡水空流。 春風日暮江頭立，不及漁翁有釣舟。
隱仙亭	李渤	嘆雁 ⁸⁶	三朝四黜倦遐征，往復皆愁萬里程。 爾解分飛卻回去，我方從此向南行。 又題隱山詩二首，常嘆源泉去不回。 我今自去更難來，欲知一一留心處， 手種巖花次第開。隨雲不厭蒼梧遠， 似雁逢春又北飛。惟表隱山溪上月， 他時相望兩依依。

⁸⁶特別標出詩題，而《全唐詩》中作〈桂林歎雁〉。

<p>李給事 長歌</p>	<p>李渤</p>	<p>喜弟淑再至為長歌</p>	<p>前年別時秋九月，白露為霜金吹烈。 離鴻一別影初分，淚袖雙揮心哽咽。 別來幾度得音書，南嶽知□□□□。 廬山峨峨依天碧，捧排空岸千萬尺。 社榜長題高士名，食堂每記雲山跡。 我本開雲此山住，偶為名利相索誤。 自負心機四十年，羞聞社客山中篇。 憂時魂夢憶門路，覺來疑在林中眠。 昨日亭前烏鵲喜，果得今朝爾來此。 我吟行路五十篇，盡說江南數千里。 自憐兄弟今五人，共索儒素家尚貧。 雖然稟氣各不一，就中總免拘常倫。 長兄年少曾落拓，拔劍沙場隨衛霍。 口裏雖譚周孔文，懷中不舍孫吳略。 次兄一生能苦節，夏聚流螢冬映雪。 非論惡疾誌如霜，更覺臨泉心似鐵。 第三之兄更奇異，昂昂獨負青雲誌。 下看金玉不如泥，肯道王侯身可貴。 卻愁清逸不幹時，高蹤大器無人知。 倘逢感激許然諾，必能萬古留清規。 念爾年來方二十，夙夜孜孜能獨立。 卷中筆落星漢搖，峒裏丹靈鬼神泣。 嗟余流浪心最狂，十年學劍逢時康。 心中不解事拘束，世間談笑多相妨。 廣海青山殊未足，逢著高樓還醉宿。</p>
-------------------	-----------	-----------------	---

			朝走安公櫪上駒，暮偷陶令籬邊菊。 近來詩思殊無況，苦被時流不相放。 雲騰浪走勢未衰，鶴膝蜂腰豈能障。 送爾為文殊不識，貴從一一傳胸臆。 若到湖南見紫霄，會須待我同攀陟。
獨秀山	顏延之	獨秀山書	未若獨秀者，嵯峨郭邑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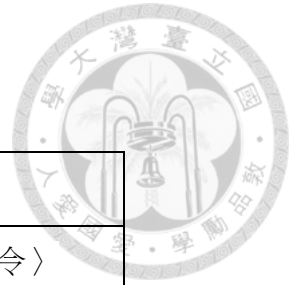
附錄二、《桂林風土記》載述文士⁸⁷

(一) 貶謫文人

抵粵年份	姓名	書中官稱	入桂任職	條目
宋光祿	顏延之	名儒	不詳。	〈獨秀山〉 〈顏特進〉
元和	柳宗元	大儒 員外	柳州刺史	〈訾家洲〉
顯慶	褚遂良	中書令	桂林都督	〈開元寺震井〉 〈褚中令〉
開元	張鷟	學士	遷於嶺表（廣東）司門員外郎。	〈張鷟〉
元和	皇甫湜	學士	不詳。	〈隱仙亭〉

⁸⁷本表單所謂「文士」，即在《桂林風土記》中進行文化活動，如題記、賦詩、寫文、撰碑的士人。而以下「貶謫文人」、「宦遊文人」、「幕僚文人」、「本土文人」之分類，參考鍾乃元：《唐宋粵西地域文化與詩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五章〈唐宋粵西詩人分類研究〉，頁284-397。

(二) 宦遊文人



抵粵年份	姓名	書中官稱	入桂任職	條目
開元	張九齡	中書令 文學進士	任桂州刺史兼 嶺南按察使	〈張中令〉
寶曆	李渤	給事 太學博士	為桂管觀察使	〈隱山〉 〈米蘭美績〉 〈李給事長歌〉
會昌	元晦	常侍	為桂管觀察使	〈越亭〉 〈巖光亭〉 〈灘山〉
大中	韋瓘	舍人	為桂管觀察使	〈碧潯亭〉
大中	張固	侍郎	為桂管觀察使	〈東觀〉
咸通	張叢	從事	為桂管觀察使	〈東觀〉
元和	裴行立	大夫	為桂州都督	〈訾家洲〉
咸通	盧匡	尚書	為桂管觀察使	〈拜表亭〉
光啓	陳可環 (或作陳 環)	太保	為桂州都督	〈夾城〉 〈海陽山〉

(三) 幕僚文人

抵粵年份	姓名	書中官稱	入桂任職	條目
貞元	令狐楚	宰相	入桂管觀察史 王拱幕。後相憲	〈開元寺震井〉

			宗、穆宗。	
會昌	陸貫（或 作陸單）	副使	入桂管觀察史 齊映幕。	〈越亭〉
開成	陸宏休	從事	為桂管觀察副 使，府主為元 晦。	〈訾家洲〉
大中	盧順之	從事	為桂管觀察使 張固從事。	〈東觀〉
寶曆	吳武陵	副使 名儒	為桂管觀察使 副使。	〈隱山〉 〈米蘭美績〉

（四）本土文人

抵粵年份	姓名	事蹟	條目
乾寧	趙觀文	狀頭及第	〈遷鶯坊〉
大中	曹鄴	進士及第	〈遷鶯坊〉
晚唐（確切 時間不明）	歐陽臈	本地文士	〈歐陽都護塚〉

第五章、結論



本文選取段公路《北戶錄》、樊綽《蠻書》與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三部地記作為主要個案，探討中晚唐時期的「南方」書寫。

過往學界對於唐代「南方」書寫的研究，大多聚焦於貶謫或宦遊士人的創作，探析其文學作品在不同於中原的異地所展示出的空間構設與流寓心境。舉例來說，韓愈和柳宗元南貶時期的詩歌與散文創作，經過歷代學者的努力，研究成果誠然豐碩。本文肯認韓柳等文士的貶謫書寫，對於後人理解唐代「南方」是一支重要的線索，卻也反思其權威與經典性，是否同時掩蓋了其他觀看「南方」的方式？我們是否有不同於傳統文學正典以外的觀察對象？而那之中是否有值得進一步闡釋的文化意涵？本文選擇以三部南方地記為主要研究對象，便是試圖探勘這一批歷來或被忽略，或被單純視為地志史料的著作。一方面，是為了補足學界對於唐代「南方」書寫研究的不足之處，並試圖另闢蹊徑，展開新的研究向度。另一方面，則是持續思索身處於「華夏邊緣」的書寫者，如何觀看、描述乃至於建構其眼前的「南方」。

唐代的文教中心長期位於關隴地區，故「南方」始終夾帶著野蠻而偏荒的色彩。在此意義上，「南方」便不只是地理空間，更同時帶著文化上的知識建構與分界想像。以安史亂事為界，由於北方政要的摧毀、邊藩擾境頻仍，唐代的經濟重心與人口逐漸向南方移動。「南方」不再只是存在於文獻中、遙不可及的異域，而是必須理解並且掌握的「國境之南」。此時，中晚唐「南方」地記作品的大量湧現，就頗堪思索與玩味。這些著作雖然以地方風物的記述為中心，卻有別於官方主流「圖經」，而更展示出對於地方風俗、人物、遺跡等歷史文化面向的關注。而若將這批「南方」地記放入安史亂後、帝國走向衰頹的時代背景，則往「南方」移動便不同於一般的行旅，更帶有一層離散的政治隱喻。

「南方」知識的建構，是這批地記著作有別於詩歌、散文等書寫文類的重要關鍵。「地記」載述地方風物，主要目的並非寫景抒情，更是為了將所見所聞的

個人經驗，轉化並形塑為可以供他人（尤其是北方人）能夠理解的知識。於此，地記的實用意義便被彰顯。然而，此並不意味著這批地記，便是「科學的」、「客觀的」，只能被當作單純的史料或工具書來看待。在考察三部「南方」的地記過程中，筆者努力考察並指認的正是作者的主觀意志、敘事策略，乃至於其中隱藏的誤解與偏見。進一步說，這批看似深具博物色彩的地記著作，實可能藉由風物知識的羅列與編排，隱藏著某些寓意、寄託、乃至於時代精神。通過「敘事」的角度來閱讀這批作品，更能掌握其中隱晦的作者觀點、敘事聲音以及著重面向。

段公路《北戶錄》的命名，就顯示了來自北方的文人，如何看待「南方」地域和族裔的視角。「北戶」一詞，源於《爾雅·釋地》「四荒」之說，指稱的是「四方昏荒之國」（郭璞注），又是「貪而無厭，狠而好亂」的兇德荒裔（令狐德棻《周書·異域》語）。段公路通過「北戶」典故作為論述框架，使眼前的「南方」不只是物理空間，更充滿了歷史記憶與文化符碼。筆者爬梳了段公路的家學淵源，從中歸結出《北戶錄》的可能養分。一方面，是段家與「南方」千絲萬縷的關聯，包括祖父段文昌立功於蜀地、南詔等「南方」蠻區的顯赫武功，乃至於段成式《西陽雜俎》中透顯的荊楚文化內容。另一方面，則是《西陽雜俎》中博物體例與異地的連結，或也提供了《北戶錄》書寫的樣式和觀看的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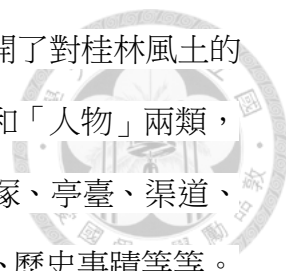
而段公路《北戶錄》的書寫較其他博物作品特異之處，主要有兩點。其一是段公路一再於文中「現身」，閃滅著行旅者的眼光，也使此書附上一層遊歷的「行記」色彩。段公路使靜態的「博物志」，成為動態的「遊覽記」；其不只比對傳聞的真假，也通過實際的觸碰、採集、豢養，證實或辨駁這些異事的存在。其二，則是對於文獻典籍與歷史典故的大量援引，將眼前的異境，編入一套由文本構成的、巨大的知識資料庫中。

而樊綽《蠻書》作為一部地記著作，固然是對雲南當地風土、風物、山河、城市的記載。然若將此書放入樊綽成書時，南詔勢力大起、交趾城破的時代脈絡，實不能忽略其中隱晦的「劫餘」紀事——也就是，在城市覆滅的災難以後，對於

「已然失去」的故地的回眸與記憶。值得注意的是，《蠻書》的作者樊綽，並未親身到過雲南，此書的內容，主要參考的是袁滋的《雲南行記》以及南詔史臣的檔案編纂而成。換句話說，《蠻書》中呈現的雲南，並非親眼所見、現實的雲南，大部分是文獻裡、記憶裡「過去」的雲南，甚至是想像中的雲南。

因此，本文從「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的角度切入，從戰爭、風物知識與歷史記憶的三個面向，去探勘《蠻書》隱而未顯的書寫動機與文化意義。首先，筆者從《蠻書》的書名爭議談起，指出本書的性質，並不只是地志文獻，更隱含著作者的為書之意，包括站在統治者立場，以及蘊含頗深的民族偏見。大量的「蠻」字使用，意味著樊綽觀看雲南的視域，牽引著一系列「蠻」字的譬喻，通過對於蠻族驍勇善戰和大量的武器記述，透顯出「戰爭」的時代背景。而後，筆者聚焦於《蠻書》對於風物知識的形塑，指出樊綽常會以一系列的蠻荒詞彙、異地物象去形塑地方，例如「瘴氣」、「毒物」、「異獸」等，營塑出雲南地區的偏遠與野蠻。此間不僅是對於蠻地知識的建構，更透顯出華人如何想像蠻夷，乃至於是兩造文化間的衝突與對話。最後，本文進一步考察了樊綽如何通過歷史記憶，在「劫餘」之後，重新呼喚華夏帝國的圖像。筆者以「馬援銅柱」、「諸葛石碑」、「南詔德化碑」等故地記憶，去檢視樊綽如何通過挪用與再製，召回華夏民族征服南詔的歷史。而最後，藉著討論樊綽對異牟尋「誓文」尋回與補入，乃至於一再重返「貞元十年」的帝國光榮時刻，指出其對「唐臣」異牟尋（而非「蠻王」異牟尋）的聚焦與刻劃。我們閱讀《蠻書》時，不能只是將其視為一部客觀的觀察紀錄，更該探索其寫作策略。其中指涉著「蠻」所牽連的視域，歷史記憶與地方知識的交纏，乃至於帝國想像與政治情勢。在《蠻書》中，所謂的「蠻」並不只是靜態的、被觀察的靜物，也不是歷史文獻中，抽象的「華夷之辨」，而是實際存在的「惘惘威脅」，並與整個帝國的盛衰興亡息息相關。

相對於這些短暫過客的書寫，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則呈現出與《北戶錄》和《蠻書》截然不同的「南方」園林圖像。莫休符為越人後裔，長期居住於嶺南



地區，晚年退居桂林，基於「補闕」和「錄見聞」的動機，展開了對桂林風土的記述。本文通過與晉人周處《風土記》的比較，發現「居處」和「人物」兩類，是《桂林風土記》主要描寫的內容。前者包括廟觀、祠堂、墳塚、亭臺、渠道、宅邸等人造建築，而後者則涉及文人創作、文化活動、官員佚事、歷史事蹟等等。相對於《北戶錄》承接著的博物或異物系統，或者《蠻書》對於「蠻地」、「蠻族」的華夷之辨，《桂林風土記》更透顯出中晚唐文人，著眼於日常生活的閒散與巧思。《桂林風土記》與前代、乃至於中晚唐大量出現的南方「異物志」不同，其對桂林文人事跡的關注，毋寧更接近中土地區常見「耆老傳」與「耆舊傳」的傳統。莫休符不僅通過詩句印證其所記述的風土，也藉由詩作去形塑風土，而營造出帶有濃厚文人氣息的「文本風景」。此外，作者顯然有意遮蔽流寓西南之苦，而更強調士人的文化活動與閒適歡遊。莫休符通過詩跡、史跡與神跡的記述，翻轉了人們對於「西南」的普遍想像：「桂林」不再是「化外之地」，而是舜帝曾經南巡、富有歷史文化之文明所在。

唐代士人與文人的南向移動，一方面帶來了文化的傳播，另一方面，亦塑造著其遷居之所的文學地理。經過本文的研究，唐代「南方」地記顯然不只是「如實」、「客觀」的記述，而更必須關注寫作主體對地方的認知與想像。進一步說，這些「南方」地記絕不只是地方的文獻史料，而更透顯著人們對於華夷的辨證，地方的理解，乃至於自我的定位。從段公路《北戶錄》的個案，我們看見了「北戶」視野下，嶺南的奇花異草、怪禽異獸，如何被收納進文獻和歷史記憶的編碼，成為可供理解、掌握的「國境之南」。而樊綽在南詔叛亂、甚至交趾城破的時代背景中，為其未曾涉足的雲南寫下《蠻書》。樊綽一再回返失去的「故地」，召喚馬援、諸葛亮等大漢英雄，使此書便不只是山川城邑的紀錄，更是一部帶有戰爭陰影和悼念意味的劫餘之書。而《桂林風土記》則展示了西南邊陲的不同面目。莫休符通過桂林詩跡、史跡與神跡的銘刻，不只鋪排了桂林的山水勝景，更勾連出一幅文人視野下的園林圖像。綜而言之，這些遠離中心的異地書寫，不只讓我

們重新發現未曾注目的「他者」，更可藉此回頭審視並辯證中心的內涵。於此意義上，「地記」的知識建構，固然有其地理史料價值，然更重要的是，其直接展示了唐人對於南方的觀看角度與認知框架。

本文所強調的「疆界」，關鍵便在此：「南方」所透顯的，不只是空間的距離，亦是族群、文化，乃至於主體認同的「疆界」。在這批地記書寫中，疆界顯然不是如此不辯自明。例如《北戶錄》記述嶺南孔雀，不只藉由《山海經》、《博物志》等地理博物志佐證，更通過《莊子》、《毛詩義疏》、《周書》等文獻典籍的拉引，將眼前的異物安置於一套可供掌握的符號編碼之中。而《蠻書》除了記述雲南桃花人「雖拘於蠻，心皆向唐化」的曖昧認同，亦通過「南詔德化碑」的挪用，反覆銘刻著蠻王異牟尋對唐朝效忠的時刻。而《桂林風土記》更毋庸多言，莫休符通過大量文人活動和詩跡的記述，將中原的文明景框移植到了位處偏荒的桂林，鬆動了刻板的南北印象。

如果說，《北戶錄》、《蠻書》和《桂林風土記》是對於唐代「南方」風物秩序的盤整與建構，則本文所做的工作，無非也是對唐代「南方」書寫的探勘與釐清。筆者認為，地記書寫是學界較少關注，卻有豐富議題和研究價值的園地。本文不妄菲薄，以南方「地記」為研究對象，便是在揭示這些過往被視為史料文獻的著作，實夾藏著作者的敘事策略和為文用心；而若更宏觀來看，則這批中晚唐「南方」地記的湧現，顯然有不可忽視的時代背景與文化意義，值得學界更深入的探勘與研究。

徵引書目



一、 傳統文獻

西漢·張衡著，張震澤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西漢·司馬遷著，瀧川龜太郎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86年10月）。

東漢·楊孚：《異物志（及其他一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12月）。

東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晉·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晉·干寶：《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月）。

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正義：《爾雅注疏》（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1年）。

晉·習鑿齒著，王惠賢校補：《校補襄陽耆舊記》（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87年）。

南朝梁·蕭統編選，李善注：《文選》（香港：商務印書館，1960年）。

唐·樊綽著，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唐·樊綽著，趙呂甫校釋《雲南志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唐·樊綽著；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唐·劉知幾著，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

唐·高適著，劉開陽箋註：《高適詩集編年箋註》（北京：中華書局，1984）。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詮》（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 唐·韓愈著，《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
-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唐·李嶠《雜詠百二首》，收錄於《謝宣城詩集（及其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唐·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唐·李延壽：《南史·顏延之傳》，中研院史語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元大德本。
-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錄於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8冊。
- 唐·魏徵等著：《隋書》，錄於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9冊。
-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 北齊·魏收：《魏書》，錄於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62冊。
- 宋·歐陽脩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宋·李昉：《太平御覽》，錄於清·紀昀等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01冊。
- 宋·李石著：《續博物志》，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南方草木狀（及其他三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北宋·計有功著，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
- 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收錄於韋力編：《古書題跋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
- 宋·李昉編撰：《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
- 南宋·阮閱編撰：《詩話總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南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廣校注：《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
-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收錄於《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5 年)。

北宋·樂史著，王文楚等校注：《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明·倪輅輯，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訂，木芹會證：《南詔野史會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明·張鳴鳳著，杜海軍、閻春點校：《桂勝桂故》（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上海：國學整理社，1937 年）。

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

清·王國維：《觀堂集林》（臺北：印文印書館，1956 年）。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清·沈三曾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清·董誥《欽定全唐文》（台南：經緯書局，1965 年）。

二、 近人專著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馮良方編著：《雲南古代漢文學文獻》（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方國瑜：《方國瑜文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丁如明等校點：《全唐五代筆記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于賡哲：《唐代疾病、醫療史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王叔武輯著：《雲南古佚書鈔》（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8 年）。

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主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朱大銀：《唐代論詩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15年）。
-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
- 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李斌城主編：《唐代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 李傳軍：《漢唐風土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 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林淑貞：《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
- 何光岳：《南蠻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辛德勇：《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張仁福：《中國南北文化的反差：韓愈與歐陽修的文化透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 吳永章：《中國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題解》（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
- 陳泳超：《堯舜傳說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 鍾乃元：《唐宋粵西地域文化與詩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
- 吳永章：《中國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題解》（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
-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
- 張清華等主編：《韓愈與嶺南文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

聯經出版社，2016年。

鄧敏文：《中國南方民族文學關係史·隋唐十國兩宋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倉修良：《倉修良探方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鍾乃元：《唐宋粵西地域文化與詩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

殷祝勝《唐代文士與粵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龔玉蘭著：《貶謫時期的柳宗元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

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

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羅欣：《漢唐博物雜記類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張鄉里：《唐前博物類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李旭旦主編：《人文地理學概說》（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年）。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全新增訂版）》（臺北：麥田出版，2015年）。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

顧立誠：《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北向南的移民及其影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



- 
- 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
-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
- 陳斌、張躍：《雲南少數民族盟誓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
- 張益桂：《桂林名勝古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張益桂、張家璠著：《桂林史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 劉苑如主編：《生活園林：中國園林書寫與日常生活》（臺北：中研院文康韻梅：
《六朝小說變形觀之探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
- 趙鴻章：《南詔編年史稿》（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哲所，2013年）。
- 劉景毛等點校：《新纂雲南通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 倉修良：《方志學通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 鍾文典主編：《桂林通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 林京海主編：《桂林文物古迹覽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 鍾文典主編：《桂林通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三、 外文著作

- [日]桑原隲藏著，黃約瑟譯：〈歷史上所見的南北中國〉，收錄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日]和辻哲郎著，陳力衛譯：《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岡天千穗譯：《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美]薛愛華著，程章燦、葉蕾蕾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英]Pual cloke 等編著，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概論·導論》（台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

[英]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2003年）。

[法]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著，莫偉民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12月），頁8。

[美]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

[美]萊迪斯·巴特勒著，何磊譯：《戰爭的框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

[美]查爾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譯：《南詔國與唐代西南邊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美]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中國「中世紀」的終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四、學位論文

鍾無未：《北戶錄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江永紅：《六朝地志之物類記述及其文學價值研究》（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4年5月）。

鄭啓暉：《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4年）。

邱詩倫：《范成大《吳郡志》研究》（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古典文獻組碩士論文，2013年）



五、期刊論文

王叔武：〈《南詔德化碑》作者考〉，《思想戰線》2期（1978年）。

王宏道：〈《南詔德化碑》碑文作者為王蠻盛質疑〉《雲南社會科學》五期（1985年）

王晶波〈從地理博物雜記到志怪傳奇——《異物志》的生成演變過程及其古小說的關係〉，《西北師大學報》三十四卷四期（1997年7月）

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S1期（2000年）

王文進：〈南朝「山水詩」中的「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察〉，《東華人文學報》第一期（1999年7月）

王效鋒：〈唐德宗「奉天之難」探析〉，《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四十卷六期（2011年11月）

甘懷真：〈從《唐律》化外人規定看唐代國籍制度〉，《早期中國史研究》三卷二期（2011年12月）


范玉春：〈馬援崇拜的地理分布：以伏波廟為視角〉，《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十三卷第三期（2007年6月）。

張孝南：〈秦鑿靈渠新證〉，《廣西水利水電》第十期（2010年）。

孫軍輝：〈唐代社會祈雨活動探析〉，《湖北社會科學》第十期（2009年）。

康韻梅：〈唐代載錄詩事小說的敘事探究——以《本事詩》、《雲溪友議》為考察中心〉，《漢學研究》二十六卷四期（2008年12月）

杜海軍、閻春：〈《桂勝》《桂故》定稿本的發現及意義〉，《文獻季刊》第三期（2012年7月），

- 
- 吳夏平：〈論唐代筆記小說的史學淵源〉，《新亞論叢》總十四期（2013年）
- 廖棟樑：〈試論孟榮《本事詩》〉，《中外文學》二十三卷四期（1994年9月）
- 陳柏言：〈匡諫·鑑戒·禮典：論《大唐新語》的政教意旨〉，《思辨集》十九期（2016年3月）
- 董靈超：〈《桂林風土記》三考〉，《柳州師專學報》第三十卷五期（2015年10月）。
- 鄭鐵巨：〈《桂林風土記》校讀記〉總三十一期（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
- 趙心愚：〈《南詔德化碑》立碑目的試探〉，《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143期（2014年2月）。
- 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二十四卷四期（2013年12月）
- 張軻風：〈從「瘴」到「障」：「瘴氣」說生成的地理空間基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二十四卷二期（2009年4月）
- 李銀兵、黃治國：〈《蠻書》及其史料價值〉，《大理學院學報》七卷三期（2008年3月）
- 李德輝：〈漢魏六朝行記三類兩體敘論〉，《東華漢學》十四期（2011年12月）
- 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二十四卷四期（2013年12月）
- 陳凱：〈舊方志文獻分類芻議〉，《廣西地方志》第四期（2010年）
- 周振鶴：〈唐代安史之亂和北方人民的南遷〉，《中華文史論叢》第二、三期合刊。
- 施鐵靖：〈馬援在廣西〉，《河池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二十三卷第三期（2003年9月）
- 鮑遠航：〈羅含《湘中記》考——《水經注》徵引文獻研究之一〉，《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八卷二期（2006年3月）
- 張蜀蕙：〈馴化與觀看——唐、宋文人南方經驗中的疾病經驗與國族論述〉，《東

華人文學報》第七期（2005年7月）

張蜀蕙：〈流動的生命經驗與空間對話——從白居易、蘇軾「歷杭」作品看其南方意識的形成〉《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二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張蜀蕙：〈開闢與安頓——唐代文人南方經驗中的宗教經驗與國族論述〉，《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三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蜀蕙：〈唐代南貶文人的水域書寫〉，《嶺南學》第六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年）

張蜀蕙：〈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的南方——柳宗元貶謫作品中的疆界空間〉，《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一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張蜀蕙：〈唐代南貶文人的物候與敘述〉，汪維輝主編：《中文學術前沿》第九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

范宜如：〈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象〉，《國文學報》四十二期（2007年12月）

范宜如：〈地景·光影·文化記憶：論王士性紀遊書寫中的江南敘述〉，《東華中文學報》三期（2009年12月）

范宜如：〈謝肇淛《滇略》的書寫視域及文化意蘊〉，《國文學報》五十五期（2014年6月）

范宜如：〈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以謝肇淛、徐燾、徐（火勃）為考察對象〉，《國文學報》五十九期（2016年6月）

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第118期（2015年2月）

王元林、吳力勇：〈馬援銅柱與國家象徵意義探索〉，《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三十一卷二期（2011年3月）

李埏：〈馬援安寧立銅柱辨〉，原刊載於《思想戰線》三期（1990年）

向文斌、覃山權：〈諸葛亮南征對雲南的影響〉，《樂山師範學院學報》二十五卷七期（2010年7月）

郭漢林：〈雲南諸葛亮的傳說及其崇拜現象〉，《雲南民族學院學報》第三期（1992年）。

